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季刊）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2019年第3期（总第141期）

主管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编辑出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

发行单位：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029-88493140

电子邮箱：shekexuebao@nwpu.edu.cn

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印刷：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52-187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2447

国内统一刊号：CN 61-1352/C

定价：8.00元

## 编辑委员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战军 邬大光 刘献君  
杨叔子 潘懋元

主任 杨益新

副主任 尹晓煌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社教 万小朋 车阿大  
尹晓煌 边燕杰 任宗哲  
刘晨光 刘第红 李 辉  
杨云霞 杨益新 张近乐  
殷小玮

主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丹 陆风 刘怡  
田锦 王鹏 程凯丽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9年9月

## 目 录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新时代的伟大飞跃

田克勤 1

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虞崇胜 闫明明 8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

万美容 谢莉勤 18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监督论析

全家悦 郭昭 张旭 25

### 高等教育研究

优先保障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若干重要参数探讨

管培俊 33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 刘宝存 彭婵娟	40	
中世纪传统大学之衰落：一个学术资本化的分析视角		
/ 胡钦晓	50	
创新能力建设：大学治理的新挑战		
/ 王建华 黄文武	57	

## “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

文化归谁所有？——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式中餐馆		
/ 刘海铭 王晓丹	65	
当前中美关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林宏宇	71	
从边缘到主流：美国的越裔文学		
/ 张龙海 张英雪	79	
新时代高校美育的规律特点与实施路径		
——杜卫教授访谈		
/ 杜 卫 李 制 郑 欣	90	

## 法律与经济前沿论坛

欧盟版权法改革中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问题研究		
/ 司 晓 曹建峰	95	
智能算法专利保护的制度探索		
/ 蔡 琳	103	

# CONTEN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and the Great Leap in the New Era

/ *Tian Keqin* 1

To Build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 *Yu Chongsheng Yan Mingming* 8

On the Essence and Core Issues of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 *Wan Meirong Xie Liqin* 18

On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Supervision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 *Quan Jiayue Guo Zhao Zhang Xu* 25

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 *Guan Peijun* 33

Review and Prospect of Overseas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Liu Baocun Peng Chanjuan* 40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Capitalization

/ *Hu Qinxiao* 50

Innovation Ability Building: A New Challenge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 *Wang Jianhua Huang Wenwu* 57

Who Owns the Culture? —— Chinese Restaurants in America in the Global Context

/ *Liu Haiming Wang Xiaodan* 65

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hip and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 *Lin Hongyu* 71

Origin and Trend of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 *Zhang Longhai Zhang Yingxue* 79

The Regular Features and Actualizing Ways of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in New Er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u Wei

/ *Du Wei Li Zhi Zheng Xin* 90

Study of Big Data and AI Issues in EU Copyright Reform

/ *Si Xiao Cao Jianfeng* 95

The Legal Exploration of Patent Protection Method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ai Lin* 103

# 新中国成立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新时代的伟大飞跃

田克勤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主要标志，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不懈努力和接力探索，党在带领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实现伟大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迎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新中国70年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使之与新的实践紧密衔接起来，揭示其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历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拥抱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胜利。

**关键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01-7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sup>[1]</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主要标志，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接力探索，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迎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立足于新时代，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为基本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展示其根本成就，总结其基本经验，分析其内在逻辑，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成功推进与“第二次结合”的初启及曲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成功推进、“第二次结合”的初步启动及其曲折转向的历史时期，大体经过了30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后所进行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然取得了不少独创性的成果。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研究”（16CKS020）

作者简介：田克勤，男，吉林九台人，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底，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基础上，以正确认识和把握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为主要依据，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本遵循，经过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使我国社会顺利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存在着诸多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据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基本要求，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新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政治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镇压反革命，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通过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促进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前提；文化上，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思想残余，改造旧有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引导和教育人民成为共同建设国家的社会力量。在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操纵联合国组成“联合国军”对朝鲜发动侵略、入侵台湾海峡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又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理论和实践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及俄国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宝贵的经验启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又是同党对我国当

时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认识分不开的，是适应中国实际作出的战略抉择。从1952年9月到1953年2月，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完成了从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将来“一举过渡”，到现在即开始“逐步过渡”的变化。1953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做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同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又对总路线作出了系统阐述，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个过渡时期，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来说，总路线的实质是要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 （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从1953年到1956年，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一化三改”的过程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由于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提高，加上国家对农业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和支援，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落后、分散、狭小、力量薄弱等特点，农民在发展生产中又遇到了不少困难。面对这一形势，党坚持从中国农业、农村实际和农民的现实需要出发，利用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对于个体手工业改造同样立足于中国实际，采取了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相同的步骤。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运用和平“赎买”方式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实现了以和平方式来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保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

一战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诸如：必须坚持将“一化”“三改”同时并举，采用由初级向高级过渡的合作化形式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改造，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注重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在此期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总体上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结构，以及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基本经济政策，从而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宪法根据。

我国在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使我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被彻底推翻，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推进我国最终确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三）“第二次结合”的提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57年8月以前，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要求。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间不长，但成果十分显著。其中，党的八大报告、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集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推进“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良好的开端。正如邓小平指出，“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sup>[2]</sup>，这些思想无疑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从1957年8月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此期间，党的工作发生过严重失误，而党对错误的纠正，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得到较大发展，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成果集中表现在：一是提

出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要求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设想。二是提出了要完成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过去的政治革命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转变的要求。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应该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同社会主义建成加以区别，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sup>[3]</sup>。四是提出了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要求。要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引领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打破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包括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等等。上述一系列思想的贯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重要条件。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发生了严重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使毛泽东最初形成的以发展经济和文化、进行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的革命的思想，被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替代。“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整体而言，党在这一时期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尽管当时尚未实现质的突破，一些正确的思想后来也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但它毕竟是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对这些成果采取轻率的态度，而应加以珍惜。正如学者指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想理论遗产，“这些遗产，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仍然是我们遵循的治党治国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仍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sup>[4]</sup>。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启、历史性飞跃及持续推进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新开启、实现突破及持续推进阶段。这一阶段的时间大体上也是30年，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理论体系的形成、制度的确立，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拨乱反正、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重新启动的主要标志。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到党的六中全会对1949年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总结，党成功实现了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以及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从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sup>[5]</sup>的命题，到党的十三大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发生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判断，系统阐述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与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不断拓展阶段；从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坚守，到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重大思想，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系统形成。

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突出强调了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进行了创新性阐述。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初步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必须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一国两制”来推进祖国统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四是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强调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力量的源泉，人民军队是人民事业的坚强柱石，党是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三个方面的力量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意志和利益，是推进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根本动力。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深入揭示了这一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邓小平理论深刻体现了在传统社会主义向当代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巨大的生机活力，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奠定了基础。

### （二）“第二次结合”的推进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前，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江泽民在2000年2月视察广东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sup>[6]</sup>。此后，他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等讲话中，对这一思想的内涵和要求作出了科学阐释。“三个代表”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深刻反映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基本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不断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体现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

党的十六大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地位，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了党章，从而把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同党和国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紧密衔接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以鲜明的时代特征。

### （三）“第二次结合”的持续推进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等重要思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对其内涵作出了概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3年8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首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10月，他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sup>[7]</sup>，对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2007年6月，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前，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还对这一思想的内涵及其基本要求作出了全面阐释。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要求发展经济既不能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又不能忽视其他领域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即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国内与对外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对后代的发展造成损害，又要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生态保护、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发展观”，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揭示了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重大意义，将这一思想写入了党章，进一步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就系统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反映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整体而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的30年，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取得了重大进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理论和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深刻体现了改革开放这一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与时俱进这一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快速发展这一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

##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当今世情、党情和国情的深刻变化，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与时俱进地认识和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从世情来看，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但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上升，影响世界发展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日益增多；从国情来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从党情来看，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各方面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的挑战依然存在，党执政面临的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在理论上始终保持高度清醒，立足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正是基于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的精准把握，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从党的十八大后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是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聚焦点，对“中国梦”战略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阶段，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深刻认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集中阐述的阶段；从庆祝“建党95周年”讲话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四个自信”，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系统阐述的阶段；直到党的十九大宣告进入“新时代”，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归纳和概括，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不断深入、系统展开的过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用“8个明确”和“14个坚持”概括了其核心内容，具有十分科学严谨的内在逻辑。一是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总

任务”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8]</sup>这就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确认了党和人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二是围绕“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五位一体”是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强调坚定“四个自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要求，阐释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等其他工作的具体要求。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引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基本战略方针。三是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制度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这就深刻揭示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主体作用。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进行系统归纳和概括的同时，还将这一思想写进了党章，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深刻体现了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

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不断发展并显示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精神实质。同时，又始终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于我国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以具有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这一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它集中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根本政治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创造性、人民性的新论断，解答了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在“坚持什

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展现出了强大的真理穿透力、实践引领力、文化自信力、价值感召力，为党和国家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

这一思想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共产党既是为我国人民谋幸福的党，又是为人类发展进步而奋斗的党。这一思想坚持以关乎人类命运为基点，凸显了坚持中华文明主体性与彰显我国现代化实践性的统一，把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积极探索和宝贵经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构建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中国文化独特优势，又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为实现全球治理和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立足于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并使之与新的实践紧密衔接起来，揭示其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历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而且有助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更好地拥抱未来，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胜利。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1.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96.
- [3]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116.
- [4] 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41-42.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
- [6]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2.
- [7]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04.
- [8]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15-16.

#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and the Great Leap in the New Era

Tian Keqi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ag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s gone through an unusual road. With the convent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has entered into a new era and opened a new journey on the basis of a series of great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 changes, through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two 30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ut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70-year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to research and making it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new practice, revealing the inherent logic of its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will not only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tory deeply and bear in mind the Party's initi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but also help us embrace the future better, take the long march of a new era, and strive for greater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ew china; marxism; sinicization; the new era

# 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虞崇胜 闫明明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多样化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可以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美好蓝图。人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是困扰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人对事关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的初步回答。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方案，它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对人类新文明的追求，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质、人类境遇、人类现状、人类前途的一种价值追寻，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找人类的理想和归宿问题。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从人类新文明——类文明角度去全面审视，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价值共同体与行为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统一起来，以期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讨论提供一种全新视角，进而促进这场讨论能够沿着更为理性、更为务实的方向深入发展。

**关键词：**类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08-10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多样化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可以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美好蓝图。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不同制度下生存的人们有着十分不同的文明理念，这就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依靠什么文明理念来支撑的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sup>[1]</sup>由此可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只是一个外交策略问题，抑或只是一个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原则。它实际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质、人类境遇、人类前途的一种价值追寻，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找人类的理想归宿问题。

因此，本文拟从人类新文明（类文明）角度，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构建问题，以期能够为十分火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讨论提供一种新视角，进而促进这场讨论能够沿着更为理性、更为务实的方向深入发展。

## 一、类文明：一种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

正如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一样，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浪潮正在按照自身的运行逻辑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向我们扑来。面对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所能做和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充分认识这场大变局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人类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方式去应对这场大变局。

最近十年来，我徜徉在世界文明殿堂中，经常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大课题“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8VSJ025）

**作者简介：**虞崇胜，男，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中国政府与政治；闫明明，女，山东滨州人，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

思考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交往虽然较之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紧密了，但是人类文明似乎越来越多样化了，如何将这种人类交往的密切性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结合起来呢？经过反复思索和比较分析，我沿着全球化发展的轨迹，尝试着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这就是类文明。

关于什么是文明，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我偏向于将文明理解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包括静态的进步成果和动态的进化过程”<sup>[2]</sup>。类文明中的“类”，也有多种含义。我们这里取其中最具典型的三种含义：“一是类别、种类；二是集合、归类；三是相似、同类。”从这三种含义中，可以分离出“类”的三种特质：“一、类是区别的，而不是同一的；二、类是交互的，是相互依存的；三、类是类似的，是可以融合的。”<sup>[3]</sup>

由此可见，类文明不是什么单一的文明形态，而是人类文明的综合形态。“类”就是人类，就是共同体，或者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类文明就是不同文明融合而成的共识文明，是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关于类文明的概念和特征，我在《类文明：全球化时代中国式民主的应然走向》（载《学术界》2012年第11期）、《类文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价值共识》（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8期）、《科学认识中国式民主的已然性和应然性》（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5期）、《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背景下类文明发展的中国预判》（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7期）、《多元文化澳门范式形成的类文明机理》（载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2018年第1期）已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在上述文章中，我将类文明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共同性而不是单一性；其二，交互性而不是同一性；其三，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其四，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其五，互惠性而不是自利性。

需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的是，“类文明的本质不是同一性、狭隘性、封闭性、自利性，而是多样性、交互性、开放性、包容性。它不是一国的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一种共识文明。”“类文明不是独打太极拳，

也不是独打保龄球，而是大家（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在一起踢足球、打篮球。它所展示的不是单一文明的独特性、奇异性、封闭性、疏离性，而是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依存性、互动性、互惠性、互赢性。”<sup>[4]</sup>类文明的远景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晚年所讲的“文化自觉”，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共识性的统一，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人类大同”的理想境界。

其实，我们提出类文明理念，绝不是什么突发奇想的主观臆造，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时代需求。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资源和需求促成了类文明理念的生成：

其一，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和“公天下”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我国古代先贤都曾以“天下”观念指称大千世界。在中国古代，“天下”是一个文化、文明的概念，而非完全的种族、民族的概念。《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意思是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必须为大家所共有，只有实现天下为公，彻底铲除私天下带来的社会弊端，才能使社会充满光明，百姓幸福安宁。后来，孙中山将“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把它升华为革命事业的指导思想，一生都在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努力奋斗着。他在《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中说：“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等的。”<sup>[5]</sup>孙中山将中国农民的平等思想、西方各国的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赋予了“天下为公”这样一个更加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概念。按照孙中山的想法，未来国家的主人是全体人民，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在人民手中，幸福生活的主动权也在人民手中。而且，要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平等的生活，尽量减少贫富差距，避免富人欺负穷人的事情发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孙中山晚年，为实现自己天下为公的理想，系统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学说，用来实践天下为公中所说的大同世界。

如果从学术史来看，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天下”是对文明世界的代指，虽然在历史语境里，对

文明的类型有一系列序列性划分，但都没有把政治敌意和武力维护附加于“天下”秩序上。儒家有深厚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追求和谐的价值观的倾向，这是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足以可供未来人类文化借鉴的思想资源。近代以降，国将不国，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因救亡图存的急切而放弃对世界整体命运的思考。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发挥公羊学理论，结合儒学固有之“公天下”理念，提出著名的“大同”说。“以‘仁’字为唯一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sup>[6]</sup>提倡一种富有人道主义的、互相关爱的、“天下一家”的国际关系。康有为当年的设计，虽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也能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相呼应，足以印证人类追求和谐国际关系的普遍期望。

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人类共同命运而产生的科学真理，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最美好社会制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其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人和人类发展，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sup>[7]</sup>

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人和人类发展问题时，曾使用过“类存在物”“类本质”“类生活”“类特性”“类解放”等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sup>[8]</sup>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亦即人类共同的本质，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以及它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简单来说，人的类本质在人的活动中表现出自由自觉性、主动创造性和自我意识性。因此，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由自觉”

是人之为人的“类特征”“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sup>[9]</sup>

而所谓人的类解放，不同于个人解放和个性解放，是指人类的彻底解放，即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类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推翻剥削制度，经过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人的类解放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实现“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10]</sup>从而使人类“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sup>[11]</sup>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讨论和预设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必须严格依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人类发展的理论，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从类文明这个全新视角，从人的类存在、类本质、类命运、类境遇、类现状、类解放去构建人类社会发展愿景，推进人类社会永续和平发展。

其三，是对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类命运的现实关照。

同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样，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浪潮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全球化是自15世纪新航路开通以来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经过二战后的风雷激荡，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已然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进入21世纪，全球化在经历了物资的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后，进而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全球化趋势。

信息化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计算机的普遍使用是其代表性象征。随着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衰落，人类社会急剧地向信息时代过渡（形成所谓“第三次浪潮”），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也正在由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再以体能和机械能为主，而是以知识和智能为主。于是，智能化就成为信息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智能化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势，在网络、

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智能化具有能动地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基本属性。智能化的深度发展，不仅可以使企业大幅度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提高效率，而且还会使人类的工作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乃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前景。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的逻辑”曾经促使人们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狭隘限制，使“民族历史”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活动的时空进一步被压缩了，世界越来越“小”，已然成为一个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地球村”。另一方面，人类的眼界似乎又越来越“大”了，人类生活和实践环境以及所面临问题的相关性、全球化，已然突破了过去人们的狭隘视野、地方意识和封闭情结，要求更多地从不同主体之间的共同目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考虑问题。于是，如何发扬人类文化精神中的“类意识”和合作精神，既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又突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就成为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课题。

西方近现代社会对不同文明的差异虽然存在诸多误读和偏见，但思想文化界一些有识之士仍旧能超越东西之别，对未来世界提出过一些美好设想。西欧启蒙运动时期，虽然民族主义盛行，但伏尔泰、卢梭、康德、边沁等都展现出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情怀。二战后，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倡建立一种世界政治共同体，以避免文明冲突。在当代，西方人文学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存在的问题，试图加以克服和扬弃，而在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和政界人士中，进行文明对话以相互借鉴的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实践中，联合国的成立和运行遵循其本身的宪章、原则，在培育各国的崇尚和平、共同发展的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时下由中国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继承发展，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以化解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由于文明差异而带来的文明冲突，促进人类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那么，在全球化时代，提出和研究类文明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相当复杂。在这里，我们试以钱钟书先生所写的《围城》的主题，聊以说明提出和研究类文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许多人都读过钱钟书先生写的《围城》，但对于《围城》的主题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过。通常来说，一部书的主题就是该书的红线，是贯穿该书始终的灵魂。关于《围城》的主题，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钱钟书先生于1946年《围城》初版“序”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也就是说，《围城》的主题实际是要透过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来揭示人类共同的“基本根性”。

《围城》是在写人，而且写了各色各样的人，但其目的是要研究人类的“基本根性”。那么，什么是人类“基本根性”呢？人类的“基本根性”，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生理体质特征（即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人的社会性，包括几乎全部社会科学及人文、哲学的领域。钱钟书先生在解释为什么要写人时说：“我立意写的是人，不单单是中国人，更不是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我一再说，我是在写人，大一点说是写世界人类的困苦。”<sup>[12]</sup>

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世界人类的困苦”，类似于我们提出的“世界人类的文明”或“世界人类的命运”。关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研究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这就很自然地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文明形态——类文明。而类文明的提出和研究，因其追寻的是人类的“基本根性”和人作为类的特征，这就自然地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勾连了起来。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本原和本质的追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对事关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的初步回答。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有关，但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有着不同的旨趣，从终极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追求和文明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原特别是人类本质的一种追寻。

### （一）人的本质是生物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统一体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的本质是什么？自古以来，这些被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吸引了无数思想家去破解。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发出过“人啊！认识你自己”的号召。当时也有“人是万物尺度”的主张，强调了人之于世界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人是天生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的著名论断。文艺复兴以后，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论断，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本质在于理性。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对“人是什么”没有正面回答，但也提出过“人是伦理的生物”的重要思想。

费尔巴哈是运用唯物主义研究人的本原和本质的第一人。他通过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次使用了“类”的概念，突出了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类”和“类本质”的发现激发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因此，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多次出现过“类存在物”“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等提法。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的局限性基础上，认为人有两种本质——即本体论本质和社会本质。

人的本体论本质（即人的生物本质）是指人的需要和享受，或享受的需要。人，只要是有生命体的人，他的所思所为都是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劳动，创造财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劳动和创造财富就是人的本体论本质（生物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sup>[13]</sup>

人的社会本质即人的社会属性。人不是单一个人的鲁宾逊，人总是在一定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脱离与他人联系的人，不是野蛮就是神祇，绝不是现实的人。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4]</sup>

马克思关于人的两种本质的理论，为揭开人类真正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指南。它告诉人们，人与包括动物在内的其他事物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于人的生物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毫无疑问，人是由动物变化而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属性。然而，人的这些自然属性（包括吃、喝、拉、撒、性行为，等等），虽然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这些自然属性并不能使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也难以反映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特殊性。因此，那种认为人的生物属性就是人的本质的观点，由于缺乏人的社会属性的内容，往往容易把人和动物混同起来，从而使“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失去了它特定的含义。

关于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恩格斯曾经做过经典的论述。他指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顶多只能采集，而人类则能生产。”<sup>[15]</sup>这也就是说，能够进行生产，能够通过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联系，这样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动物所没有的属性——人的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就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sup>[16]</sup>。这就是说，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活动，而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社会活动；要进行生产，人们之间就会发生一种新的关系——即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只有反映人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即人类特有的社会属性，才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中，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关于人的两种本质的认识，多数都是片面的，要么只强调人的生物本质，忽视人的社

会存在；要么只讲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的生存需要。这种割裂人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理论和思想曾经给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视角，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人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强调人既然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同时也是只有在社会中存在社会群体，是生物本质（自然属性）与社会本质（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这样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基础的本体论前提——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寻找什么空中楼阁，而是寻找人类的本质和本原，寻找人类的现实所在，寻找人类未来的走向，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会成为只是人们谈论美好前程或愿景的一个画饼。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寻找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

由于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人类需要不断地寻找两种存在方式：一是生存方式；二是共处方式。生存方式是人类生物本质的内在要求，共处方式是人类社会本质的内在要求。生存方式解决的是人类生命延续问题，共处方式解决的是人类优化发展问题。

在前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人群基本可以在自己狭小的生存空间内过着“明月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生活，无论生存方式或是共处方式都是“纯自然”的，似乎不需要与他人发生关系。

而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自15至16世纪新航路开通后，从欧洲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起来。商业的迅速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锤炼了欧洲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发展路径，把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连在一起，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和范围，打破了过去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互相隔绝和孤立发展的局面。

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和普遍的政治化，此时，和平共处就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学会文明地对待由于利益和社会认同的多元化而产生的冲突，这是关

系到人类社会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共处就成为各社会和各文化内部以及各社会和各文化之间实现文明相处的核心要求。这个问题原本是欧洲面临的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为了寻找共处的新方式，人类社会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17世纪以来，在欧洲率先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力，从而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卷入了世界市场。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先是英、法等国开拓了美洲新大陆，后是欧美强国联合或分别对东方发起了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最后是在20世纪上半期世界强国间连续上演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宁静，整个世界都变得骚动不安了，原本不同国情、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国家都在为了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居所而相互争夺着。

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启迪人们，人类不能以战争和相残的方式共处，必须以和平和互利的方式求得新的发展。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印度等国的积极倡导下产生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人类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寻找共处方式的有益探索，也是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早萌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世界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人类关系越来越密切，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之为“地球村”。

当今世界，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同时，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网络攻击、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世界上的人类，不论你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生死攸关、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

正是在这种世界的大变局中，中国领导人审

时度势，及时而敏锐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中指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sup>[17]</sup>2015年9月28日，他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sup>[18]</sup>2017年1月18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演中正式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19]</sup>

中国国家领导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表述，得到世界各国学界和政界的普遍认同。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决议。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同时重申“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7年11月召开的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决议。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义是什么？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sup>[20]</sup>从本质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指涉的根本问题，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系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从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换句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沿着人类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有益尝试和积极谋划。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或主要是价值共同体

必须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关涉人类生存和发展，但它基本上是一种价值目标，是对于人类未来愿景的一种谋划，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或主要是价值共同体，是人类在新历史条件下寻找最佳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长远发展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sup>[21]</sup>显而易见，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政治实体，或一种实体共同体，而是关于全人类休戚与共认识的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民族等实体共同体不一样，它其实是一种相互关系模式——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处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既然人类都在地球上活动，全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具有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价值共识为纽带，通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本的价值前提。

阿克顿勋爵在解释世界史时说过：“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虽然它将根据诸民族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程度来讲述它们的故事，但不是为了诸民族本身，而是与一个更高级的系统有关，且服从于这一系统。”<sup>[22]</sup>

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更高级的系统”，其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更高级的系统”“将照亮人们的灵魂”。如果把“更高级的系统”置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而不是要建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但这种原则必须是大家都可接受的价值原则，因为它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

而关涉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原则。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有人类全体即“类”的概念，要从人类整体上去解释和理解它，特别是要从人类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高度去理解它，进而用“类文明”之光去照亮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前程和愿景。

### 三、从类文明角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sup>[23]</sup>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也就是从类文明角度，从类的命运、类的境遇、类的现状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将关涉人类命运的三重关系统一起来。

#### （一）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

作为自然属性的人类，首先是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因此，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抓住发展这一要务。

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必须找到新的人类共处方式，体现人类社会属性的要求。当下的世界，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到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人类生存的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地球村里，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于共同体之外。在现代化发展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sup>[24]</sup>。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就是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和相互砥砺，找到人类生存和共处的新方式，实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sup>[25]</sup>。

到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所有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都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就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它其实是对人类所有关系而言，包括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

人本来就是类动物，也是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的动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定要运用到一国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命运共同体意识十分重要，没有命运共同体意识，或者没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自觉，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随时都有被践踏的可能，甚至有被夺去生命的可能。这在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例中都得到了印证。

稍远的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要开除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党籍，只有陈少敏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殊不知，正是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无命运共同体意识，结果导致了长达十年的政治灾难。最近的以2018年10月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透过这个事件可以发现，共同体意识对于共同体中每个人生命的重要意义。由于公交车上全车的人都缺乏共同体意识，即缺乏生死与共、同舟共济的基本意识，所以才有女乘客不顾全车人生命安全厮打掌握方向盘的司机，也才有司机罔顾全车人生命安全而放弃方向盘与女乘客厮打，也才有车上乘客无一人上前制止和劝阻女乘客与司机厮打。结果悲剧发生了，由于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导致了共同体内所有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上述事例告诉人们：人是类动物，总是生存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因此，共同体意识对于人类来说具有性命攸关的意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如果只有个别人缺乏共同体意识，可能不会导致重大灾难，如果全体人都缺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可能会灾难临头。

#### （二）将价值共同体与行为共同体统一起来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相互砥砺中达成共识，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才有可能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主要是价值共同体而不是实体共同体，但是价值共同体的实现并非不需要人类的共同行动。恰恰相反，任何价值共同体都需要人类共同谋划和协同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束之高阁的空洞价值，而是需要人类共襄的时代伟

业。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sup>[26]</sup>

实际上，自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来，已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在已经取得基本共识前提下，必须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人类发展议程，使之成为人类谋求自身良性发展的实际行动。

### （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将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起来，既突出了人的生物属性，克服了唯心主义忽视人的物质需求的缺陷，又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避免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忽视人的社会关系的窠臼。由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性基础，而且在人的双重属性基础上，依循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人类社会组合的未来愿景——自由人的联合体。

当我们将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者的提出虽然相隔将近170年，但其旨趣却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无论从理论基点抑或理论指向看，自由人的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走向和目标与“自由人联合体”高度契合，二者都凝结着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根据现阶段世界发展状况提出的社会理想和具体目标，但从长远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营造未来社会建设发展的基础，是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壁垒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预演。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需要的是共享发展理念。而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接续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出发，在此基础上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类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

总之，“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拥有相同的价值旨趣，都是从人类的类本质出

发，将人类的生物本质与社会本质结合起来，顺应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类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从而使人类“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sup>[27]</sup>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7.
- [2] 虞崇胜.政治文明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51.
- [3] 曾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国际研讨会综述[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7-140.
- [4] 虞崇胜.科学认识中国式民主的已然性和应然性——兼与高民政、蒋德海教授相唱和[J].探索与争鸣,2014(5):33-38.
- [5]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83.
- [6]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M]//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88.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
- [12] 范业强.读懂《围城》读懂钱钟书[N].光明日报,2018-04-04(16).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26,514.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 [15]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M].刘瀟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336.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 [17]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03-25.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22.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48.
- [20]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17-12-02.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22.
- [22]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M]. 吴象婴, 等.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2.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1.
- [2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58.
- [2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40.
- [26]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EB/OL]. (2017-12-01).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01/c\\_1122045658.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01/c_1122045658.htm).
- [2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60.

## To Build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Yu Chongsheng Yan Mingming**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provides a beautiful blueprint for the diverse world to be able to rest and live together. Where do people come from, where are they now, where are they going? This is a basic problem that plagues human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is the initial answ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the basic issues concer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proposing and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not only a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a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 It is also a pursuit of value and the pursuit of a new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actually a human life, a human nature, and a human condition. The pursuit of humanity, the future of mankind, and the pursuit of humanity are the ideals and destinations of human being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we must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ew civilization-human civilization, and unite human natural attributes with social attributes, value community and behavioral community,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and free-human union.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very hot discuss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which in tur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ussion in a more rational and pragmatic direction.

**keywords:** human civilization;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value community; free man union

#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

万美容 谢莉勤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体现无产阶级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科学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教育。通过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有效的教育方式，使人们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来认识、理解和信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核心问题。着力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及其人格感染力，坚持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教育相统一的基本理念，善于与人们的信仰需求相结合，注重发挥情感因素和情感动力的作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核心问题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信仰教育；马克思主义信仰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18-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sup>[1]</sup>。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和核心问题，有效引领人们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质上是信仰教育

马克思主义在正确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揭示和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基本规律，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回答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前景。马克思主

义“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sup>[2]</sup>，既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也是反映无产阶级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科学信仰体系。

信仰是指人们“对世界（宇宙、社会）和人类的本质、前途以及个人命运的坚定的信念，是对科学、主义或宗教的极其信服、尊重和崇敬的态度，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sup>[3]</sup>人之所以需要信仰，缘于人有限的生命、能力和现实条件与追求美好愿景和纯美理想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简言之，信仰就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的悖论和困境之中所面临的精神超越问题而构建起来的一个“精神寓所”。人的信仰基于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产生。以前种种非科学的信仰或者借助于宗教或者借助于某种神灵等这些非现实、超自然的“精神寓所”来寄托人类对这种精神超越的向往，它们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

**基金项目：**教育部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长效机制研究”(18JDSZK008)；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研究领域”类资助项目“我国当代青少年精神生活现代化问题研究”(CCNU16Z02001)

**作者简介：**万美容，男，湖北石首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学者”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谢莉勤，女，云南大理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观之上而根本无法实现，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这一生命哲学的难题。

与它们不同，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精神寓所”建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建构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论证的：一是论证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可以克服的，其永恒与不朽奠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性之上。对于个人短暂的人生而言，它就是一个超越有限人生的无限过程，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即是人生永恒的时代条件与历史见证；二是进一步把这种体现“生命不朽”的“精神寓所”与终极关怀归结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全人类的解放，为生命的不朽与永恒开拓了一个屹立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终极性目标与价值追求。这就打破了非科学的信仰只能借助于非现实、超自然力量的藩篱，从而把个体生命所追求的永恒建立在与社会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现实可能之上。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同样反映的是“对世界与人生价值的一种总体性的精神探索与意义追寻”，是一个伟大的信仰体系，而且是超越了以往建构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所有信仰体系的科学信仰体系！作为一种体现无产阶级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科学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指明了一种远大理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建成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在人们精神领域建立起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关怀。这一关怀不同于某些思想家主观设定的某种应然状态与道德诉求，也不同于某些宗教给予人们的虚无缥缈的未来承诺与现世安慰。它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客观需求基础之上，在历史主体“自觉”展开的现实运动与合目的、合规律的积极创造中最终将变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广大劳动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为了发挥这种思想武器的作用，就必须不断地对广大无产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武装、信仰传播。如同列宁所指出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sup>[4]</sup>一样，任何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仅靠自发与自觉意识都是无法在人们

的思维意识中实现体系化与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共产主义信仰，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又是一种体现无产阶级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科学信仰体系。因此，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必须具备某种意义上的超越性质，不能仅仅在传统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性的理论体系来进行传授，只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知”的问题，而必须深入到它最根本的性质和最核心的意义——即信仰层面来进行认识和把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富于终极性关怀的价值体系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坚定的信念与崇高的信仰，成为引导人们追求未来生活与理想的价值坐标和精神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是理论教育又是信仰教育，本质上是信仰教育。

作为信仰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当努力达到如下两个目标：一是帮助人们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性或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赖与信仰。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具备一定的价值性，或者说是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不例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性或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赖与执着信守，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作为人们的信仰对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把人类所具有的生存尺度和发展本性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与终极性的价值旨归，使得人类能够从其所处的各种复杂关系中，探寻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内涵，确立必然与应然的发展道路。二是帮助人们确立对共产主义（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信赖与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信赖与信仰）是马克思主义赋予人类实践的最伟大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内容。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sup>[5]</sup>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质上是信仰教育。作为信仰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引领人们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来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达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与信仰。

信仰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真理和价值，任何信仰都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要想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与精神世界中建构起一种坚定的信仰，就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努力：首先是真理的建构，其目的是向人们阐明它本身是一个真理性的存在，从而让人们在内心把它当作一种无可置疑（可信）的真理来接受并信赖（不管是唯物主义的信仰还是唯心主义的信仰、科学的信仰还是非科学的信仰，概莫能外）；其次是价值的建构，其目的是向人们阐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具备了何种价值与意义，从而能够在精神层面满足人们的某种价值期待与价值追求，让信仰它的人能够始终做到坚定地信赖和执著地信守。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建构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并达到相互统一状态时，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信仰才能够巍然耸立。由此来看，如若一个社会出现信仰危机，其原因必定是信仰的真理建构或者价值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与失误，其具体表现必定是信仰失真（真理性缺失的信仰危机）、信仰贬值（价值性缺失的信仰危机）或者信仰失落（真理性与价值性双重缺失的信仰危机）。

作为一种科学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必定建筑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在引导人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双重角度来进行思考与建构，从而避免马克思主义信仰失真、贬值或者失落现象的发生。那么，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来建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呢？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当而且可以

承担这种功能和作用！这一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科学阐释和充分说明，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归真”和“回值”，从而使人们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来认识、理解和信赖、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能帮助人们顺利完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理建构与价值建构，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失真、贬值抑或失落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信仰危机必定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现实当中，我们看到，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能够做到坚持以科学认识和价值认识相统一的基本态度来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因而出现了两种值得高度警惕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知识体系、真理体系，只主张对其进行所谓的“学术性”研究、“深刻的”理解或“正确的”认识；另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只可崇敬、崇拜的纯粹的信仰体系。

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科学理论知识来进行教育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三种偏向：一是把思想政治理论性极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般性的文化知识来进行讲授；二是在教育中过于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与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学科体系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教学体系的转化问题，致使教育内容过分抽象化和理论化，而忽视了其应有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三是没能很好地发掘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课程、教学的信仰魅力与精神感染力，片面迎合现实需要，使其成为一种热衷于讲小道理、讲实惠的庸俗化的东西。上述偏向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纯粹理论化、工具化、实用化了，以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以致真理“失真”，马克思主义变得不再可信。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仅仅从真理观层面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只认识到了其一般目的，只注重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的问题，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应具有的价值性与信仰特征。如此这般的教育，失去了信仰价值导向的蕴含，不能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相信、确信、

坚信的问题，这就等于自觉自愿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真正的铸魂育人功能和目的，从而丧失其信仰教育的根本和灵魂。要想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的这一实践缺陷，就必须在关注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同时，努力弘扬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对某一科学性、真理性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的认知问题，而是更为重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认同与信仰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既是科学理论又是科学信仰。

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信仰体系来进行教育的时候，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陷阱与理论桎梏，用“终极化”或者“世俗化”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所谓“终极化”就是只把共产主义设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遥远的终极状态，而没有看到它同样是一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步展开和实现的历史运动过程，是一种可以通过人的生存方式逐步改善和人的存在价值逐步提升而逐步接近并最终实现的现实图景；而“世俗化”则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现实性运动，以为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具有“共产主义”性。“终极化”与“世俗化”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崇高性消解其现实性，或者反过来，用现实性消解其崇高性，其结果只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解陷入二律背反的困顿与迷惑。上述错误倾向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没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而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作为科学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以致其价值“贬值”。

毫无疑问，不是建立在真学、真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根基是不稳定、不牢固的，往往经不起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社会现象的干扰、迷惑、引诱而使其信仰遭受挫折甚至坍塌。实际上，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教育的时候，并不是要求人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或者唯心主义的迷信、宗教，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来理解和对待，而是要通过科学的理论教育使这种兼具真理性与价值性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一种价值追求和精神

支柱，进而引导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信仰而坚定信赖和执着信守。

综上所述，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论是在真理观层面还是在价值观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失误和不足，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失真、贬值、失落的种种现象可能正是这些失误和不足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信仰教育本质，发挥其坚定理想信念、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功能，关键在于如何帮助人们在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和坚定信仰。

### 三、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关于科学信仰的研究证明：信仰不是物质的强制力量可以实现和达到的。一种理论或者学说能否成为人们的信仰，不仅取决于这种理论或者学说是否具备真理性与价值性，以及这种真理性与价值性是否符合人们内在的意识结构、能否满足人们的主体需求，从而激发人们对这一理论或者学说的信仰需要，同时还取决于信仰的传授者自身素质及其人格感染力的影响。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遵循人们信仰形成、发展和确立的客观规律与要求，并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念革新和方法创新，始终把培养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在政治性和学理性、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有效的教育方式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难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第一，着力提高教育者自身素质及其人格感染力。

马克思认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sup>[6]</sup>这里所提到的“本质力量”以及“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主体的素质与能力等，而这种素质与能力

的高低则决定着主体能否以正确的态度与方式理解和认识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和手段来帮助人们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育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及其人格感染力的强弱必定会对人们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发挥重要影响作用。

如果教育者本身在思想政治素质、理论修养、学术能力或者人格感染力等方面存在不足，无疑会削弱其实施有效教育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能否取得实效，发挥信仰教育的作用，与教育者本身是否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学术能力和人格感染力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能否取得实效的一个前置性的关键因素。现实的情况也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正是由于某些理论教育工作者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这样那样的错误认识与偏向——或者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持着某种怀疑的态度，或者在思想与行动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无法做到表与里、言与行的统一，造成了思想理论教育中的偏差与失误进而导致教育的实效性不强。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作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sup>[7]</sup>。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只有自身先受教育，使自己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学术能力与人格感染力，做到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才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由于理论的精通而达致信仰的坚定，进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充满激情与感染力，以身示范，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受教育者才能“亲其师、信其道”，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之途上目的更加明确，意志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因此作用更加强大，成效更加明显。

第二，在教育过程中坚持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教育相统一的理念。

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统一，是信仰的特性。这一特性表明：真正的信仰离不开科学的理论解释，它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基

础的信仰只能是迷信或者宗教。现实的情况也告诉我们，如果把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教育割裂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会偏离其信仰教育本质，也就难以帮助人们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信仰教育本质，有效解决其核心问题，就必须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坚持真理性教育和价值性教育相统一的理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及其历史、现实、理论逻辑，即向人们阐述清楚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强调真理性教育，要求克服以往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纯粹理论化、工具化、实用化等偏差和失误，纠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等错误倾向，帮助人们廓清缠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的种种迷雾，有效地向人们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价值性教育则主要回答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为了什么的种种疑问，其目的是要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撒播科学的终极性关怀的种子，为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确立一个安身立命的价值指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强调价值性教育，要求人们用现实运动和终极理想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而不是以唯心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对待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

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教育构成培养和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两翼，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只有坚持真理性教育与价值性教育相统一的理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取得实效，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扎根在人们内心，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仰。

第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人的信仰需求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sup>[8]</sup>实际上，信仰作为人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反映了作为主体的人对人生发展的终极性价值需求。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单独的生命个体，其生命是有限的，但人又往往不能满足于有限，而是不断地力求完美，追求无限。在

这种有限与无限的悖论和困境中，人们会将这一矛盾的解决寄托于特定的理想对象上，而这种对象或者是神，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某种理论等。这正是作为主体的人需要信仰的奥秘所在。因而，信仰作为终极性的价值关怀，是人自身所需要的，这是信仰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人们精神领域所要建立的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指向是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为人们解决生命中有限与无限这一不可逾越的悖论与困境提供了一个科学而有效的治本之方。因而，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本质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应当在教育过程中以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对于某种信仰的心理需求（只是有些人意识不到罢了）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够满足人们信仰需求的这一客观事实为基础，以培养和满足人的这种主体需求为根本，不断激发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需要，让人们明确地意识到这种信仰对于主体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而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觉追求和热情向往。

第四，注重发挥情感因素和情感动力在培养马克思主义信仰中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认为，把世界理解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或“有意义的宏大秩序”，是人的一种需要，一种“内在冲动”。这种“内在冲动”就是人的情感因素与情感动力，而把世界理解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就是一种“相信自己和世界有意义和价值”的信仰。可以说，信仰是由人的知、情、意等各种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复合作用而形成的“合金”，它蕴含着人们对自己和世界及其关系的认知和体悟，情感因素和情感动力在人的信仰生成与维系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宗教信仰在“知”的方面虽然并不具备坚实的科学理论根基，但信仰它的人却能够做到坚定地持有和笃定地信守，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情感因素与情感动力在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支配着他们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这种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之下。”<sup>[9]</sup>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情感体验在宗教信仰中的意义。

这就告诉我们，不论何种信仰，如果不能为相信它的人们提供情感上的满足和慰藉，就会沦为干瘪的信条或者低级的说教，而不能激起人们对它向往和追求的热情，从而导致其失去应有的慑服人心的力量。因而，信仰在一定意义上是依赖于人的情感而存在和发展的，情感因素和情感动力可以激发起主体追求与实践信仰的热情，强化主体意志，坚定主体的信心和毅力，从而使主体在奔向信仰的大道上充分拓展其潜能和价值。

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不能只依靠单纯的理论分析和理论灌输来引领人们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必须渗透和强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培养。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以个体的情感体验为纽带，把情感培养和情感激发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从而引导人们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信仰的坚定追求之中。以情感力量激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够得以真正确立、持续坚定。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15.
-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8.
- [3] 陈志尚.人学原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347.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17.
- [5]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15.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91.
- [7] 张炼.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 2019-03-19(1).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286.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704.

## On the Essence and Core Issues of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Wan Meirong Xie Liqin**

**Abstract:** Marxism is a scientific belief system reflecting the lofty ideal and value pursuit of the proletariat. Therefore,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belief education in essence. It is the core issue of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rust and believe in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the unity of truth and value through scientific educational ideas and effective educational method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solving the core problems of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include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ors and their personality appeal, adhering to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truth education and value education, combining well with belief needs of people, and emphasizing the function of emotional factors and motivations.

**keywords:** marxism theoretical education; belief education; marxism belief

#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监督论析

全家悦 郭昭 张旭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是依据党章党规对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党员采取有效监督方式，围绕政治权力运行进行监督，以确保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从监督目标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监督内容看，不同时期任务不同监督重点不同，体现了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从监督对象看，始终围绕对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现了重点监督和普遍监督的统一；从监督方式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方式，体现了创新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新时代党的政治监督要围绕监督目标，紧扣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围绕监督内容，紧扣“两个维护”，推进党的政治监督具体化、规范化、精准化、常态化；围绕监督对象，抓住“关键少数”，紧扣对“一把手”的政治监督，推进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落实；围绕监督方式，紧扣体制机制的完善，推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

**关键词：**党的政治监督；内涵；内在逻辑；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25-08

党的政治监督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将其置于首位，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政治监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深化政治巡视，强化政治监督，着力发现和纠正政治偏差”。这彰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为新时代党的政治监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学理上深入研究阐述新时代党的政治监督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对于深化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一、党的政治监督的内涵

一个国家的政治监督，是整个国家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环节。其中，这里的“政治监督”概念，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国家层面的政治监督和政党自身层面的政治监督。我们把政党层面上的政治监督，称为“党的政治监督”。这两个层面上的“政治监督”，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根本的区别，也有各自特定的指向。

在国家层面，我国的政治监督突出表现在人民对人民代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人民代表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监督，上级国家机关对下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国家机关中上级对下级的

**基金项目：**工信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高校加强党的政治监督研究”（19GZY2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共进》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9YJC710057）

**作者简介：**全家悦，女，陕西宝鸡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郭昭，男，陕西咸阳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张旭，男，河南原阳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监督。其主要包括人大监督、执政党监督、司法监督、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等国家性质的体制内监督和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非国家性质的社会监督体制。

在治党层面，党的政治监督属于党的自身建设的范畴。“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sup>[1]</sup>从西方政党的起源来看，政党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斗争的产物。最早的英国“托利”党是旧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被称为爱尔兰歹徒；“辉格”党是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表，被称作英格兰盗马贼。这两个党的名称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贬义，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政党的基本看法。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不仅认识到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还认识到必须加强对政党活动的监督、管理和引导，才能防止权力滥用。政党天然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政治监督，才能实现自我革新，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世界其他国家政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监督。英国设有“督导员”制度，监督制约方面的法规制度比较完善。<sup>[2]</sup>英国保守党将议员党团、中央总部和全国联合会合并为“保守党管理委员会”，督导员改由党的领袖直接任命，实现监督力量的集中统一。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强调严格党的组织纪律，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发挥议会党团的独立监督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设有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委员不得担任党的其他领导机构的职务，并规定党员遵守纪律不分八小时内外。法国社会党仲裁委员会由各级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享有独立的裁判权，诉讼程序仿照国家司法体制，以此体现“依法治党”。巴西劳工党于2009年出台《劳工党道德和纪律条例》，要求对违反党纪的党员必须给予处分，若涉嫌犯罪，必须支持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处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于2012年底成立廉政委员会，凡是挑战党的权威、违背党的决议、违纪违法的党员可立即开除党籍。<sup>[3]</sup>可见，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比较注重党内监督，一些政党也在实践中形成了较好的做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对党内监督的探索性实践，形成

了无产阶级政党党内监督的基本思想，使党内政治监督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便萌芽了党内监督的思想，在其章程第42条中规定“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sup>[4]</sup>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党员一律平等的思想，提倡党内思想交锋，通过民主讨论和批评达到党内监督的目的。列宁更加重视党内政治监督的实践，苏共1917年就建立了中央检查委员会，1920年成立了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等现象做斗争。”<sup>[5]</sup>列宁还提出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对领袖、中央委员会及领导机关进行监察，认识到了重点监督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其将近100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把加强党内监督作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政治优势来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基础上，站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战略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鲜明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重大命题，提出了“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积极探索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强化政治监督，着力发现和纠正政治偏差”等重要要求，形成了关于党的政治监督的基本认识。

总体上讲，党的政治监督是拥有政治监督权力的主体依据政党的基本准则和规定，采取一定的方式对其组织及成员进行有效监督，规范其政治权力运行，使其在一定规则内活动，从而保证政党政治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以下简称党的政治监督）是依据党章党规党纪对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行使职权、履行义务等情况采取的党内监督行为，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和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党的政治监督通常采取巡视巡察、督查、检查等多种方式，对党的决策部署落实情况、政

治权力运行情况、党的纪律执行情况、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情况等进行综合监督或专项监督。

##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监督的内在逻辑分析

（一）从监督目标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政治监督的目标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相一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全部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发展”时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论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时要求，“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论及“全面从严治党”时强调：“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从监督目标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自身所掌握的权力的人民性，即更好地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监督和其他政党政治监督本质的区别。“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政治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监督内在自觉性的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只要我们党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就一定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sup>[5]</sup>。围绕这一根本价值目标，党的政治监督的重要价值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强党的政治监督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需要。

要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行为等方面与党的性质、宗旨保持一致，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加强党的政治监督。第二，加强党的政治监督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保障。党的政治监督是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实施的重要内容，要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作为监督的主要内容。第三，加强党的政治监督是推动党内民主的有效手段。党内监督与党内民主是一体两面，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民主政治离不开有效的政治监督。第四，党的政治监督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有力抓手。政治生态反映着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的总体面貌，外部表现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内在的却是党性的反映。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让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监督、体检，增强政治免疫力。

（二）从监督内容看，不同时期任务不同监督重点不同，体现了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监督的重点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我们党致力于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政治监督的重点是思想、政治信仰，即坚定理想信念情况。党的一大制定了第一个纲领，明确了党的理想信念，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确定了党的纪律规矩，坚定了组织基础。1926年共产党员数量急剧增加，良莠不齐，在革命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有些党员政治立场不坚定，出现变节投敌情况。在此背景下，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重点职责就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向农村，面临农村新的环境，毛泽东在部队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醒大家，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不能忘记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延安时期，面对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1949年，针对

党执政后可能出现脱离群众、骄傲自满的危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号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面临执政后出现纪律松弛、腐化堕落的情况，政治监督的重点逐渐转向了政治纪律。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等重要论断。新中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1954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都是从政治上监督的重要举措。1956年党的八大，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确定了“双重领导体制”，1962年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扩大了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规定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不通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检举党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党内政治监督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组织基础。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重新恢复了“党的纪律检察机关”的规定，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产生办法、设置、职权、任务等都做出了新的规定。十四大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政治监督的重点转向了是否遵守廉洁纪律等情况。面对市场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党中央突出强调“讲政治”，要求高级干部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要有坚定的政治纪律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同时加强了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03年12月，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从历史维度看，党的政治监督渗透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不同时期党的建设的任务不同，监督的重点、重心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既遵循监督的整体要求，又体现出对党在不同时期监督重心的把握，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在监督

内容上体现了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 （三）从监督对象看，始终围绕对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现了重点监督和普遍监督的统一

党的政治监督不同于经济监督、人大监督，它监督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尤其是“一把手”。“一把手”是最具腐败机会的群体，根源在于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关键在于能不能对政治权力运行的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深刻揭示了权力与腐败的内在联系，提出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成为绝对必要。腐败的根源在于对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对腐败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政治权力具有权威性、支配性、强制性、扩张性和排他性，党的政治监督的核心是规范党内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即监督和制约权力，而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关键是要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断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权力运行就是权力主体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计划、组织、用人、指挥、执行、监督和反馈等一系列具体行为。权力运行由权力运行主体、权力运行的控制，以及权力运行的环境与保障体系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从权力运行行使主体的角度看，廉政风险表现为思想道德风险，主要监督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权力运行的制度机制角度看，廉政风险表现为制度机制风险，主要监督权力运行的流程设计是否合理，流程是否规范；从权力运行的具体内容角度看，廉政风险表现为岗位职责风险，主要监督落实党建和党风廉政、意识形态、失职追责等责任情况；从权力运行的外部环境看，廉政风险表现为外部环境风险，主要监督是否遵守廉洁纪律情况。加强党的政治监督，是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是建设廉洁政党的客观要求，具体需要通过完善政治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对政治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进权力

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达到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既牢牢盯住“关键少数”，又坚持放眼“绝大多数”，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提出更高政治标准，对“一把手”进行更严格的政治监督，充分体现了重点监督和普遍监督的有机统一，形成了震慑，既凝聚了党心，又赢得了民心。

#### （四）从监督方式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方式，体现了创新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政治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对自我宗旨、使命的深刻认识，是不断检视问题，自我革命，改进提升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在政治监督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诸如巡视巡察，督查、检查、派驻监督，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等多种有效的监督方式。比如，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就开始探索建立巡视制度，改革开放后逐步提出并建立巡视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从横向到纵向上，实现了中央和省区市党委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从纵向上，形成了从中央巡视、省级巡视再到市县巡察的严密监督网，巡视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改进，巡视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巡视巡察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战略地位和利剑作用充分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全局，强化了执纪监督问责，推进派驻监督全覆盖，完善了体制机制，进一步提高了监督的实效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党内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刀刃向内”不仅是一种品质、一种

境界，更见证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党性的光芒与情怀。在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史册中，正是因为无数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这种“刀刃向内”的谦虚姿态和精神，敢于把问题拿到桌面上，不断审视自我、解剖自我、改造自我，中华民族才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要教育党员干部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广泛听取意见，认真检视反思，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sup>[7]</sup>。实践表明，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发挥好党的政治监督的特点和优势，才能抓好党的政治建设，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政治监督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方式，体现出创新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总之，党的政治监督由监督目标、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等基本要素构成。党的政治监督既是过程又是体系，既是一个动态循环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闭合的回路体系，其中每个因素的有效性都会影响整体监督的效能。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党的政治监督的概念、性质、内涵，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监督目标上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政治监督的具体内容随时发展而变化，不同时期任务不同，监督重点不同，在监督内容上体现出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始终围绕对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在监督对象上体现出重点监督和普遍监督的统一；在政治监督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方式，体现出创新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 三、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监督的路径分析

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提出新挑战新要求。党面临的“四大考验”的

长期性、复杂性，“四大危险”的尖锐性、严峻性，客观上要求加强党的政治监督，保持政治定力，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保证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的实现，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新征程做好充分的政治准备。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监督，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监督目标、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紧扣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紧扣“两个维护”、紧扣对“一把手”的政治监督、紧扣体制机制的完善来构建体系、创新方式方法。

#### （一）围绕监督目标，紧扣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党的政治监督落脚点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中最重要的纪律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sup>[8]</sup>党员领导干部一要强化自我约束，加强党性修养，恪守政治纪律和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的成为极少数；发挥纪律威慑，起到红线、底线的保证作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防止问题由小变大，由量变演化为质变。

#### （二）围绕监督内容，紧扣“两个维护”，推进党的政治监督具体化、规范化、精准化、常态化

党的政治监督不是空泛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新时代党的政治监督，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这个“纲”和“魂”。在监督内容上，聚焦监督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情况；聚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重对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研判分析，着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发现整治，着力对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进行监督，推进党的政治监督具体化；在监督程序上，党的政治监督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要恪守法律法规规范工作程序，紧扣监督工作规范化建设，推进依规依纪依法要求贯穿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党的政治监督规范化，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在监督重点上，要及时跟进监督，突出政治属性，党中央部署什么就着力关注什么，要结合各单位各部门实际，聚焦痛点难点，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精准有效监督；在监督范围上，要实现有效覆盖，努力做到党内监督无禁区，防止“灯下黑”，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构建长效机制。

#### （三）围绕监督对象，抓住“关键少数”，紧扣对“一把手”的政治监督，推进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一把手”则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党的政治监督要抓住“关键少数”，紧扣对“一把手”的政治监督。一要扎牢制度之笼，通过制度完善划定权力边界，厘清职责权责，明确底线红线，让政治权力在制度轨道上运行。推进“一把手”监督工作常态化，建立健全“一把手”问题预警机制，力求尽早发现问题，规范和约束“一把手”的行为，防止出现某个人在一个单位“只手遮天”“唯我独尊”的局面。二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结合，重点是抓住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形成“头雁效应”，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sup>[9]</sup>重点监督其政治立场、加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执行党的决议，公道正派选用人，责任担当，廉洁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情况。三要推进落实整改主体责任。科学配权、限权，建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压实监督整改主体责任，加强对整改情况督促检查，把监督整改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将日常监督做实做深做细，推动形成整改长效机制。针对不同问题，对症下药、精准施策、靶向治疗，以清单明责任、以督查严责任、以考核促责任、以问责罚失责。四要用好问责利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改进督促指导和检查考核各项工作，加大问责力度，进一步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纪检组织的监督责任。问责必须坚持依规依纪、实事求是，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

#### （四）围绕监督方式，紧扣体制机制的完善，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

党内监督不是“左手监督右手”，推动党内政治监督必须加大党内监督体制机制的发展和完善。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围绕民主集中制这一核心，夯实党内民主基础，筑牢制度笼子，健全追责问责，抓住关键和重点，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与其他监督相协调，推动监督无禁区、全覆盖。二要深化纪检体制改革，深化巡视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信访、巡视巡察等协作配合机制，构建科学、严密、有效的监督网，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

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促进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民主监督有机结合，促进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有效贯通，促进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协调衔接，形成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让公权力在严密监督下运行，确保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三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创新方式方法、建立大数据监督平台，推动党务公开，拓宽政治监督渠道，加强舆论监督和引导，发挥警示作用。四要探索建立上下联动机制，结合各单位实际情况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监督质量，使上下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五要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自觉接受监督和监督他人。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政治监督环境，坚决处理党员因履行民主权利和监督职责而遭到阻力和遭受打击报复等问题。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J].求是, 2019(14).
- [2] 张亚娟.当代西方执政党党内监督的主要经验及启示[J].理论导刊, 2005(5):61-64.
- [3] 冉刚.世界反腐败机构基本概况之四:各国政党如何执纪监督[N].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4-05-12.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576.
- [5] 中央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70.
- [6]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J].求是, 2019(15).
- [7]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 2019(13).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766, 131-132, 766.
- [9]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J].求是, 2019(15).

## On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Supervision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Quan Jiayue Guo Zhao Zhang Xu

**Abstract:** The political supervi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o supervise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party members, cadres and party memb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to supervise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go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ervi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and embodies the unity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ervision, different tasks have different monitoring prior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flecting the unity of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 of supervisio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has always been carried out, embodying the unity of key supervision and universal super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ervi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ed a series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methods, reflecting the unity of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 The political supervis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should focus on the supervision objectives, closely follow the party's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rules, and use the "four forms" of supervision and discipline; around the supervision content, closely follow the "two maintenance" and promote the party's political supervision. Focusing on the object of supervision, grasping the "key minority", closely following the political supervision of the "number one",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and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y; focusing on the supervision method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Promote integration with other supervisors to form a joint force of supervision and improve supervision effectiveness.

**keywords:** political supervision of the CPC; connotation; internal logic; path

# 优先保障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若干重要参数探讨

管培俊

**摘要:** 大学的中心和主体是“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是“人”，“双一流”建设和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关键在“人”。对于“人的投入”和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现代化和新时代大学建设发展的重大课题，应进一步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议程。优先保障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高度关注教师资源配置的四个重要参数，即生师比、人员经费比重、教职员比例以及薪酬水平。

**关键词:**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优先保障；重要参数

**中图分类号:** G647.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3-0033-0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做好三项基础工作：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考虑大学师资队伍的素质要求、人员构成、培训体系等。”<sup>[1]</sup>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师工作置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支持战略领域，优先谋划教师工作，优先保障教师工作投入，优先满足教师队伍建设需要。”<sup>[2]</sup>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指出：“创新能力对一国全球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才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才资本主义’<sup>[3]</sup>时代。”<sup>[3]</sup>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人才资本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大学中对于人的投入与教师队伍建设，是新时代大学建设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应该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战略的优先议程。重新思考和准确把握这一重大议题，应该紧扣三个关键点：

第一，大学的中心和主体是“人”。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特别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而“谁在培养人”，则关系这个首要问题。大学文化的精髓就是以文化人。我们讲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环境留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的环境也是人。正所谓“近者悦，远者来”。所以，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学生为本、教师为本。育人以学生为本，办学以教师为本。

第二，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人”。大学教学科研活动高度依赖个人创造性和教学科研组织的活力。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世界范围大学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无论我们在总体上如何看待和评价大学排名，但我们无法否认，世界上每一个大学排行榜，都无一例外地高度关注教师素质、师资配置和学术绩效。“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意见》）。大学的第一资源和核心竞争力是“人”。

第三，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是“人”。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快速迈向普及化阶段，总体上已达到中上等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课题“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人才战略”

**作者简介:** 管培俊，男，山西五寨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研究方向为教师政策、教育人力资源管理。

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位次逐步提升。<sup>[4]</sup>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sup>[5]</sup>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高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无疑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教育总体格局当中，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发展是否实现同步发展，师资资源配置是否达到中上水平？用人机制是否达到中上水平？师资质量是否达到中上水平？社会需求在变，国家的战略需求在变，国际竞争的格局在变。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我们无法回避教师队伍建设“不均衡、不充分、不适应”的问题。

第四，“双一流”建设和内涵发展关键在“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昭示了新时代中国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决心和方向。教育现代化，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年一个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一个十年，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以大规模、高速度、低成本为显著特征；第二个十年，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为标志，快速迈向普及化；第三个十年，将进入全面普及化和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双一流’建设和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根本保障、核心要素是制度与人，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sup>[6]</sup>国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的五项建设任务中，首要任务就是“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sup>[7]</sup>。把教师工作置于重点支持战略领域，落实教师队伍建设的三个优先，当务之急就是要增加“人的投入”。因此，必须高度关注、着力改善教师资源配置的四个重要参数，即生师比、人员经费比重、教职员比例以及薪酬水平。

## 一、生师比

生师比历来被教育系统内外特别关注，高的时候饱受诟病，低的时候也饱受诟病。实际上，当量生师比是个双重意义的指标，既是反映高校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高校教师资源配置状况和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生师比的应用要特别注意时空概念。在时间序列上，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意义；在空间上，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学校有不同的要求。归根结底，当量生师比的确定实际上是质量效益、投入产出的权衡。过高的生师比制约教育质量，过低的生师比则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师资因素与生师比权重历来是备受重视的指标因素。良好的生师比是世界顶尖大学的一项基本标准或重要标志。比如，THE世界大学排名的13个具体指标中，95%涉及教师因素，其中生师比的权重为5%。QS世界大学排名的6项指标中，85%涉及教师因素，其中生师比的权重高达20%。US NEWS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中，100%涉及教师因素。其中，美国国内大学排行榜7项指标，其中教师资源占20%，生师比为5%。

我国高校生师比变化经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高等教育扩招这个阶段，生师比过低，饱受诟病。那一阶段的确如此。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高校的生师比急剧膨胀，高峰时达到19：1，之后进入到平稳回落期，2017年为17.52：1。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略有差别。这样的生师比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的生师比远高于世界一流大学，中西部高校尤其突出，特别是教师人才分布不尽合理，区域差异较大。最近20年来，我国大学在校生规模增长了6倍，高校教师增长不到2倍，大学教师增长未能跟上学生规模的增长。教育学有一个重要概念，叫“教育的关照度”。生师比是直接反映师生交流频率、体现对学生关怀程度的关键指标。拥有更低生师比的大学，更有条件创建有利于师生互动交流的教育教学环境，这是不言而喻，也是无可争议的。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最优生师比100所大学排名（2016—2017）中，生师比排名前100的大学都在世界大学排名前600，生师比均低于或等于9：1，这个比例非常重要。生师比排名前800的大学平均生师比均低于16.5：1。拥有低生师比的大学，有小型高校，比如加州理工学院、巴黎高师等，也有巨型大学，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低生师比大学居多，但也有不发达国家，比如拥有62000人在校生规模的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其生师比却与加州理工学院相近，是在生师比排名前100的大学中巨型大学之最。《2018中国大学评价》关于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生师比的排行呈现这样一种情况：758所普通本科生师比排行，生师比不合格的有554所，占73%，其中最高生师比为32.75：1。其中，41所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高校，有15所生师比不合格，1所生师比为限制招生，不合格比例占到39%，最高生师比22.52：1。93所一流学科重点建设高校，有49所生师比不合格，17所生师比为限制招生，合计66所，占到70%，最高生师比是25.34：1。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所谓合格，依据的只是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的标准。顾名思义，这只是一个最低标准、底线要求，已然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当然，由于各国国情、指标口径有所不同，比例也会有所不同，但是降低生师比是大趋势。因此，要把大幅度降低我国高校的生师比，作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显性指标。总体而言，降低高校生师比，加强师资配备，扩大教师编制，必须与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发展目标相适应。不同层次、类型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目标要求和选择。首先，着力降低重点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生师比，将此作为双一流建设的基本条件，使得我们的大学在可比领域的重要指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到2022年，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师比应该降到10：1以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平均生师比要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即14~15以下）；到2030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师比至少达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即15~16），将其作为教育现代化指标之一。203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60%，在学规模达到4500万人。据此测算，今后10~15年，全国高校专任教师预期增加100万，达到260万以上。同时，教师队伍结构要更加优化、配置更加合理、素质进一步提高。

众所周知，我国高校生师比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一是预算约束。降低生师比意味用人成本提高，经费预算是瓶颈。二是编制控制。长期以来我

国高校治事用人方面最大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就是僵化的编制管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对学校管得还是多，还是细，活力出不来，该政府出面为学校排忧解难的服务又不到位。对学校人财物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有些是延续多年的老政策、老办法，这个问题要系统解决。值得说明的是，高校人员编制需求，地方性大学最为紧迫。当前，国务院总的要求是总量控制。但不能理解为所有系统、所有单位一个都不增加，不是这个概念。因此，高校生师比的降低，一方面要调整预算结构，另一方面要改革编制管理方式。高校依法具备用人自主权，自主决定机构、岗位、人员聘用、职务聘任、收入分配等。同时，政府要加以监管。高校编制管理改革要采取渐进的策略，第一步是政府总量控制，学校自主管理。第二步是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学校自主管理。对于高校的编制用人，由前置审批改为事后备案。媒体一度炒作所谓高校“去编制化”，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对学校和公众都是误导。编制与编制管理是客观存在。高等教育是准公共服务，教师学术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政府举办的高校，不会完全推向市场；学校自主决定用人，也要有编制管理。

## 二、人员经费比重

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教师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才的竞争，由国家的范围到区域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高端人才的集聚效应日益显著。人才的价值指标日益复杂。竞争也进一步推高了人才资源的成本。教育的本体是人，教育投入结构要从注重“物”的投入转向对“人”的投资。人员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既反映教育经费充裕程度，反映教师薪酬水平高低，又反映教师专业发展的条件，也反映教育经费配置状况。一般来说，降低生师比，意味着用人成本的提高。增加教职员、提高薪酬水平、支持教师发展，都需要增加人员经费投入保障。

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高速增长的同时，高校人员经费支出比例却一直相对稳定。据统计，

1995年以来，我国全部高校人员经费比例大体上在33%~35%之间，地方高校大体上在30%~35%之间。1999年以来，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人员支出占比都比较稳定，多集中于60%~70%左右。<sup>[8]</sup>另外，根据中美高校工资福利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比较可以看出（见表1），美国几所顶尖大学人员经费约占总支出的1/2或2/3，而我国几所顶尖大学人员经费仅占总经费的1/3，甚至不足1/4。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校薪酬占比明显过低。可以明

确，我国人员经费比例长期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大体只有国际均值的一半左右，相应地资本性投入的比例偏高。这与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基本建设规模一度较大这个阶段性特点有关系。另外，部分有关养老保险的项目未被列入人员经费，有些科研项目收入未能统计为人员支出，高校拨款项目经费比例过高等也都与人员支出比例偏低有关系。但我国高校人员经费支出比例偏低的主要因素，在于生师比较高、教职工薪酬占比相对较低。

表1 中美高校工资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美国大学	2013—2014财年 (%)	中国大学	2014财年 (%)
哈佛大学	49.26	A大学	23
斯坦福大学	61.97	B大学	21.5
密西根大学	65.05	C大学	29.30
耶鲁大学	62.25	D大学	32.38
麻省理工学院	50.40	E大学	34.36

数据来源：美国高校数据来源于各大学网站

百年老店同仁堂有句古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人才培养更是如此，投入参数与产出质量成正比。因此，中央《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改革拨款方式，扩大高等学校经费使用管理权，完善高等学校预算拨款制度，优化拨款结构，加大基本支出投入力度。其中，基本支出投入力度就包括人员经费。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落实教师队伍建设的“三个优先”，首先要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大幅增加人员经费比重。增加的人员经费主要用于提高薪酬水平，促进教师发展。这一重大举措符合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特征，毕竟产出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高素质人才的投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相关举措必须及时跟进。国务院已决定出台一系列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政策，如增加间接费用比重；用于人员激励的绩效支出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比例，最高可从原来的5%提高到20%；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及聘用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均

可按规定标准开支劳务费。大幅度提高科研院所与高校的人员经费比例，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政策效应。

### 三、教职员比例

在高校管理中，对于“教职员比例”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解。比如，许多人认为我国高校的问题是专任教师比例过低，非教学人员比例过大；有的学校通过压缩职员数量，调整生师比；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学校硬性要求停止补充非专职教师；有的地方以教学与科研人员的比例比较大学实力；有的甚至将减少职员与“去行政化”相联系等。我们知道，结构决定功能，高等学校作为一个高等学术机构当然要以教学科研人员为主体，但是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也需要一个强大的保障体系。长期以来，各地普遍反映高校教师负担过重，提出为教师和科研人员减负，解放学术生产力，合理调整教职员比例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国外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和访谈证明，科研人

员希望所在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辅助支持来分担行政事务，以使他们集中精力提高科研效率（Iqbal, 2011; McGill, 2012）。国内学者研究了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辅助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对下一年国际发表论文数和

国内发表论文数均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sup>[9]</sup>另外，据美英澳一流大学生师比、师职比的比较可以看出（见表2），美国私立一流大学师职比为0.5:1，公立大学为0.3:1，英国一流大学为1.1:1，澳大利亚一流大学为0.3:1。

表2 美英澳一流大学师比、师职比

大学	生师比	师职比
美国私立一流大学	4.3:1	0.5:1
美国公立一流大学	11.9:1	0.3:1
英国一流大学	7.6:1	1.1:1
澳大利亚一流大学	14.2:1	0.3:1

数据主要来源：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因此，要合理配置我国高校教职员比例，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员队伍。一是提高职员比例。合理配置学校职员队伍，提倡为教授配备秘书、文员，将教师从烦琐的庶务中解放出来，解放学术生产力。当然，提高职员比例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大学中所有职员都是为师生服务，为教学科研第一线服务，而不是自我服务的。二是全面实行职员制。按照专业化、职业化标准，深化职员聘用、考核、评价、激励机制改革，不断提高职员队伍建设水平。2000年教育部研究制定了职员制改革的方案，在武汉大学等5所直属高校试点，取得良好效果，有些学校到现在还在坚持。三是强化职业化导向。大学治理越来越走向专业化。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现在不仅是职业化校长，而且是经理人团队。“双肩挑”在过去是一条经验，现在大学中“双肩挑”的比例普遍过高，既当学科带头人，又从事繁重的党政管理工作，已然力不从心，还有诸多利益冲突。改革的方向，是强化职业化导向，鼓励大学校长和管理骨干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同时也可以弱化利益冲突机制。四是要强化职业化保障。实现大学管理的职业化、专业化需要条件。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创造条件，比如职员队伍的职业上升空间、任期制、待遇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等。

#### 四、薪酬水平

《意见》强调，“推进高等学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建立体现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sup>[10]</sup>。总体来说，在国民经济19个行业当中，高校教师薪酬水平在逐年提升，而且现在已经居于前列，但是高校薪酬激励仍然需要高度关注。我们不担心没人从事大学的教育工作，而是“什么人从事大学教育工作”，这是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来说，高校教师薪酬水平对于优秀人才仍然缺乏足够的竞争力。纵向与横向比较不一样、总体感觉与各个院校感觉不一样、舆论的感觉与自身的感觉也不一样，特别是青年教师面临更多的实际困难。在此有一个参照系的问题：从社会参照系出发，与国内一般劳动力市场相比，高校教师薪酬无疑居较高水平；但教师的参照系是高新技术行业、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高端人才的稀缺性不断推高了人才成本。从结构性来看，表面上高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比较高，而且逐年在提高，但仔细分析学校的薪酬方案，总体上激励水平较差。绩效工资中非绩效部分普遍过大。许多学校过度多元化的工资结构，弱化了激励功能，形成了高水平的大锅饭。这样的分配格局一旦形成，想要调整很难，要下很大决心。还有平均数之下 的问题。所以我们主张，高校的薪酬不要说平均数，

要说中位数，中位数比平均数更能准确地反映薪酬水平。

因此，我国高校要进一步调整薪酬结构，改革薪酬制度，提高薪酬水平。一是高校自主决定收入分配。国家“放管服”改革要加快步伐。在工资总额管理的前提下，主管部门核定工资总量、主要领导工资，学校内部的收入分配由学校自主决定。二是调整高校的薪酬结构，增强激励功能。组织行为学理论认为“人们获得报酬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工作行为，进而影响一个组织能否取得成功”。<sup>[1]</sup>三是建立具有外部竞争力的学校薪酬制度。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收入水平的定位应该改变现行以公务员工资水平为基准的参考体系。整体提高高校薪酬水平，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完善高层次人才薪酬激励政策，实行以年薪制为主体的薪酬制度。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等。四是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政策导向。中央一系列政策，包括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合理收入，股权激励、期权激励、分红激励等。五是在校内建立体现正确导向的薪酬激励制度。要理顺高校收入分配关系，体现正确的政策导向，比如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师与管理人员的关系。要强化激励机制，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向重点领域、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优秀骨干倾斜。六是重视非工资待遇。教师的继续教育、职业发展等。尤其是高校青年教师住房困难、支付能力较弱、子女上学困难等问题，都应在薪酬改革当中加以充分考虑。同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2014年10月1日起，高校所有人员纳入社保统筹，打破了能进不能出的藩篱，这是高校实质性人事改革的分水岭。

## 注释

- ①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特别强调“人才资本对竞争力的增强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N]. 人民日报, 2018-05-03(1).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02-01(1).
- [3] 陈颐, 徐惠喜. “创新+人才”成提升竞争力动力[N]. 经济日报, 2017-09-28(8).
- [4]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 (2019-07-0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1\\_1673407.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1_1673407.html).
- [5] 习近平. 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N]. 人民日报, 2018-05-03(1).
- [6] 管培俊.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关键在深化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11):6-8.
- [7]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 (2015-11-05)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11/t20151105\\_217823.html](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11/t20151105_217823.html).
- [8] 袁连生, 廖枝枝, 李振宇, 等. 我国高校人员支出比例为何严重偏低?[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26-37.
- [9] 哈巍, 于佳鑫. 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以中国科学院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1):88-99+173.
-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02-01(1).
- [11] 管培俊. 一流大学建设的两个关键要素: 制度与人[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5):4-9.

## **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Guan Peijun**

**Abstract:** The investment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re the basic work of the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should be further promoted as the priority agenda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Accurately grasping this issue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to three key points: the center and main body of the university are “people”, the shortcoming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people”, and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p-class universities” construction is “peopl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teachers' resourc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four aspects: reducing the ratio of students to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college personnel, rationally arranging the propor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rationally adjusting the salary level.

**keywords:** cultiv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priority guarantee; important parameters

#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刘宝存 彭婵娟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历经初步确立时期、恢复探索时期、规范调整时期和提升完善时期的变迁，取得了巨大进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层次人才。我国确立了规模、质量和效益并重的留学方针，国家战略需要、单位发展需要和个人发展需要相补充的多元化目标，“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留学战略，形成了公派留学为引领和自费留学为主体的留学格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存在出国留学教育结构失衡、政府奖学金的引领作用有待提升、留学管理与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为此，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必须加强统筹规划，集中公派留学资源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优化出国留学管理与服务，加强对自费留学生的服务、管理和资助，健全留学生归国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出国留学；回顾与前瞻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40-10

1950年，我国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五个东欧国家派出25名留学生，掀开了新中国出国留学教育的序幕。历经近七十年的发展，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形成了国家公派留学、单位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等多形式并举的留学模式，出国留学服务与管理体系趋向于规范化和法制化，出国留学和留学归国规模愈来愈趋向于平衡。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求“充分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培养我国急需人才”，意味着我国将开创出国留学工作新局面。因此，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1949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 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出国留学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展，经历了初步确立时期（1949—1978）、恢复探索时期（1978—1992）、规范调整时期（1992—2010）和提升完善时期（2010至今）。

### （一）初步确立时期（1949—1978）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这近三十年间，我国的出国留学教育历经了一个初步确立的时期，具体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1949—1966）、停滞阶段（1966—1972）和恢复阶段（1972—1978）。这一时期我国出国留学教育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极大受限于当时国内外政治和外交局势。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扩大来华留学政策研究”（17JJD880005）

**作者简介：**刘宝存，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高等教育、教育政策与领导研究；彭婵娟，女，浙江台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政策，在此背景下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根据1950年《派往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交换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1952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规定》《关于1953年选拔留苏预备生的指示》等政策，我国开始往东欧和苏联派遣留学生。这一阶段，我国出国留学的派遣方式单一，仅限国家公派的选派方式；留学人员选派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各基层单位以及个人缺乏自主权；选派资格重视政治审查；派往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1950—1966年我国先后向29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0678人，<sup>[1]</sup>其中前往苏联的留学生达到8213人，<sup>[2]</sup>占派出人员总数的76.9%；留学人员归国的比例较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受极左思潮的波及，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导致苏联政府“暂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的学习”，内忧外患下我国留学教育工作陷入一个短暂的停滞期。直至1972年，我国才开始恢复向国外派遣出国留学人员。1972年至1978年底，我国向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548人，其中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1451人，占93.7%，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97人，占6.3%。<sup>[3]</sup>

## （二）恢复探索时期（1978—1992）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针对留学生派遣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来个。这是五年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搞个计划，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这一讲话标志着出国留学教育开始步入探索发展时期。

为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扩大留学生派遣数量的重要指示，我国确立了“保证质量、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总方针。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每年派出大学生、进修生和研究生3000人的计划。1978年8月4日，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这

一目标，掀开了中国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序幕。1986年12月1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关于出国留学工作的法规性文件，文件确定了新的留学方针，即“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sup>[4]</sup>据教育部相关数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9年底，我国共派出9.6万余人出国留学，其中国家公派留学约3万人，占比31.2%；单位公派留学约4.3万人，占比45.2%。<sup>[5]</sup>

为贯彻对外开放政策，这一时期我国作出开放自费出国留学通道的决定。1981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留学的暂行规定》，承认“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允许具有高中或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员申请自费出国留学。之后的政策对“在读及毕业两年内大学生是否可以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这一问题摇摆不定。例如1982年《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指出“高校在校本专科生、研究生（包括在职研究生）以及高校毕业生在接受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后的两年内均不得申请自费出国留学”。1984年12月26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又指出自费出国留学可以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1990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补充规定》强调公费本专科以上学历人员应当完成服务期年限后方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从1978年到1989年底，我国共派出2.2万名自费留学生，占总出国留学人数的23.6%。<sup>[6]</sup>

这一时期随着出国留学规模的扩大，出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日趋严重，对此我国积极创造条件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服务。198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通知》，强调留学人员在预定学习期满后，必须按期回国，为国家建设发挥作用。1983年我国颁布《毕业留学生分配派遣暂行办法》，依据学用一致、量才录用的原则，为各类别留学生建立起工作分配派遣制度。但实际上留学生滞留不归现象依旧严重，1978年至1984年6月，我国公派出国人数26000余人，自费留学人数7000余人，同期国家公派留学者归国人数仅有8000多人，而自费留学归国者更是寥寥数百人。<sup>[7]</sup>

1985年，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教委、国家科委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争取留学博士毕业生早日回国工作的请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6年5月4日下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努力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国后学以致用，心情舒畅地发挥作用，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1986年公派出国留学开始实行“签约派出”制度，尽可能保证公派留学人员如期回国服务。1987年12月国家教委、司法部发布《关于签订（出国留学协议书）的通知》。在相应政策的引导下，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工作取得一定效果，但成效依然不显著。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1年底我国共派出各类留学生约15万名，但同期回国的只有5万人左右。<sup>[8]</sup>

### （三）规范调整时期（1992—2010）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进一步加快，出国留学教育延续“改进公派留学选派与管理制度、建立自费留学服务与保障体系与完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体系”的三大主线规范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公派留学开始实现规范化大发展。国家教委在1995年2月提出《改革国家公费出国留学选派管理办法的方案》，确定“公开选拔、平等竞争、专家评审、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派出方针。1996年6月20日中编办正式批准设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标志着国家公派留学管理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2004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思路进一步确定为“提高层次，扩大规模，保证重点，增强效果”。在此基础上，教育部于2005年提出了“三个一流”的选派原则，即“选拔一流的人员，派到（国外）一流的学科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进一步强调国家公派留学的质量。经国务院批准，2007年教育部设立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计划从2007年至2011年每年选派5000名博士研究生赴国外深造，进一步提高了国家公派留学的层次和规模。据教育部统计，1992—2000年间，我国每年公派留学人数在1905—2888人之间，波动幅度不大；2001—2006年间，我国每年公派留学人数均超过3000人；2007年开始，我国公派留学人数开始迅猛

增加，2007年、2008年分别派遣留学生8853名和1.14万名。

这一时期我国自费留学政策走向成熟，自费留学队伍也飞速壮大。1993年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补充规定》，取消高校各类毕业生服务期满才能留学的限制，“大专以上的公费在校学生和公费培养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在国内服务一定年限或偿还高等教育费以后，均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为落实对服务贸易作出的相关承诺，教育部办公厅于2003年颁发了《关于简化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审批手续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自2002年11月1日起，不再向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以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但尚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各类人员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反映出国家以更大的力度鼓励和支持自费出国。为了奖励优秀自费留学生和鼓励他们回国工作和服务，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设立了“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项目，每年有500人左右的自费留学生获得资助。此外，1999年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和《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试行）》，以规范自费留学市场的秩序，保障自费出国人员的合法权益。2003年以来，教育部依托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公布了万余所外国高等学校的名单、披露具备统一资格认定证书的中介服务机构。2004年教育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委托合同（示范文本）》。这一时期，自费出国留学人数飞速增长，以1992年度、2000年度和2010年度数据为例，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分别为13480人、32293人和262461人，分别占当年度出国留学总人数的60.05%、82.83%和92.20%。<sup>[9]</sup>

这一时期我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政策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指出：“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在上述精神的领导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重要方针，

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与计划，开创了大批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新时代。例如，1995年国家公派留学选派程序中新增了“违约赔偿”的补充规定。1996年教育部正式设立“春晖计划”。1998年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专项高层次人才计划）。2001年《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和2002年《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的颁布，明确了国家给予留学归国人员经费支持、产权保护、创业服务、出入境便利、生活保障等优惠政策。之后，《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200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2007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2008年）等政策相继出台。在相应政策的引导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派出的数千名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按期回归率达到92.8%，少数未归人员也均按预订协议追究违约责任，履约率100%。<sup>[10]</sup>2000年以来，留学人员回国数量持续攀升，由2000年的9121人增长为2007年的4.4万人，再急剧猛增为2008年的6.93万人，当年回国增幅也一跃超过出国增幅。<sup>[11]</sup>

#### （四）提升完善时期（2010至今）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资助和奖励力度。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提高对留学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标志着我国出国留学教育进入提升完善的新时期。

首先，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依旧是这一时期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重点。2013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印发《出国留学经费管理办法》，提出规范出国留学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具体举措。《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强调“在稳步扩大公派出国留学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公派出国留学服务于国家战略和重要行业发展的能力”。2016年教育部牵头制定的《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教育行动》指明出国留学目的国的优先发展战略方向，“以国家公派留学为引领，推动更多中国学生到沿线国家留学。未来3年，中国每年面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2500人”。2017年教育部数据显示，当年出国留学人数达60.84万人，其中“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新的增长点，当年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人数为6.61万人，比上年增长15.7%，超过整体出国留学人员增速。其中国家公派3679人，涉及3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sup>[12]</sup>

其次，这一时期我国继续加强对出国留学人员的管理与服务。2011年教育部、外交部印发了《教育部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外留学人员工作的意见》（简称“出国留学二十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全面指导在外留学人员工作的政策文件。《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指出要完善自费出国留学监管体系，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服务与引导，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的资助力度。2016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通过完善‘选、派、管、回、用’工作机制，规范留学服务市场，完善全链条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优化出国留学服务”。2016年《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强调“完善全链条的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保障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成功留学”。2018年数据显示，最近10年来教育部推出的出国留学行前培训达到87万余人次，基本实现了对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全覆盖，并逐步扩大对自费留学人员的覆盖率，使“平安留学”的理念深入人心，<sup>[13]</sup>我国还通过在全国21个省市建立的36家“教育部出国留学培训和研究中心”，举办出国留学行前系列培训、集训和实景演练。调查显示，参加培训的留学人员对培训满意度平均超过80%。<sup>[14]</sup>

最后，这一时期我国继续优化留学人员归国服务体系。201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成为目前全国人才工作的指导性文件。2010年12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批准通过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决定自2011年开始，每年引进400名左右海外优秀青年人才。《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强调“留学人员回国工

作和创新创业环境明显改善。保持公派出国留学回国率98%以上。延揽百万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创新创业”。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在原有十二字方针的基础上强调“发挥作用”。据教育部统计，2010—2016年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为296.59万人，累计留学回国人数215.39万人，回流率为72.62%。<sup>[15]</sup>

## 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在政策和实践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方针、格局、目的和战略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特征。作为“后发型”国家，我国在出国留学教育领域也存在不少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 （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70年的变迁与发展，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在方针、格局、目的和战略的变革上呈现出以下几方面关键经验：

首先，确立了规模、质量和效益并重的留学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政治、外交方面的局限，以及我国在出国留学教育方面经验不足，出于谨慎性原则，1950—1953年我国实行的是“严格选拔，宁少毋滥”的方针。之后，1954—1956年，我国开始实行“严格审核，争取多派，理科为主，兼顾全面”的留学生选派方针；1957—1959年我国的选派方针是“保证质量，争取多派”；1961年我国实行“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sup>[16]</sup>1978年我国实行的是“保证质量、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总方针；1980年我国又提出“积极主动，择优选拔，保证质量，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方针。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始终沿袭的是质量优先、规模次之的理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自费留学通道的打开及限制一步步放宽，出国留学规模有所扩大，同时带来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在

此背景下，1986年我国建立起“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方针，标志着出国留学教育开始改变以往质量优先、规模次之的小而精发展模式，向规模、质量和效益并举的方向发展。

其次，形成了公派留学为引领和自费留学为主体的留学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我国仅存在公派留学的单一形式；政府在出国留学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留学人员的选派资格、选派人数和派遣国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留学人员的选派目标是服务国家建设需要，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出国留学教育具有极大的政治依附性和不稳定性。1981年我国开始打开自费留学通道，提出在政治上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一视同仁。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逐渐放开对自费留学的限制以及取消向申请自费留学的大学生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呈现出井喷式增长，在出国留学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以1990年、1995年和2001年数据为例，自费出国留学人数所占据的比例分别达到58.57%、66.08%和90.57%。<sup>[17]</sup>至此，我国完成了从国家主导到市场自由化的转变，形成了公派留学为引领和自费留学为主体的留学工作格局。

再次，出国留学教育的目标走向了多元化。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尚未开放自费留学通道，公派出国留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建设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国留学派遣国以苏联和东欧为主，改革开放后则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专业结构方面，除“文革”期间以外，出国留学专业主要以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为主。1953—1963年的7832名归国留学生中，理科和工科专业人才分别为1082和4226名，占比13.8%和54.1%。<sup>[18]</sup>自1978年9月底至1981年底，我国教育部派出留学人员7456名，其中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的6039人，占比81%。<sup>[19]</sup>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发展出国留学教育的驱动力主要是政治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自费出国留学人数的急剧扩大并逐渐在出国留学总人数中占据绝对比例，政治因素不再是出国留学教育的唯一驱动因素，我国出国留学教育的目标开始走向多元化。对

国家而言，公派出国留学教育的目标依旧是在我国转型和发展阶段为国家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特别是紧缺型和急需型人才；对单位而言，派遣留学生有助于高校和机构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强新兴学科和急需学科建设，更有利于建设高水平的学科梯队和促进学术带头人的快速成长；对个人而言，出国留学教育有利于弥补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有助于留学人员提升综合能力和实现个人价值。

最后，形成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留学战略。从20世纪50年代的“争取多派”方针到20世纪70、80年代的“广开渠道、力争多派”方针，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几乎始终坚持“走出去”的战略，一以贯之地拓宽渠道、争取名额，扩大出国留学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在留学队伍迅速膨胀和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学成不回国的现象已十分严重。正因为此，我国于1992年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标志着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开始转变战略倾向，从单一重视“走出去”到同时重视“引进来”，从注重留学人员派遣到同时注重留学人才引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根据现阶段形势对1992年十二字方针作出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十六字方针。这体现了现阶段我国“以用为本”的人才发展方针，即鼓励留学人才回国参与祖国建设工作的同时，倡导海外人才积极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报效祖国，真正“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

## （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其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回流率迅速提升，管理与服务体系已经建立并完善，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出国留学教育结构失衡，包括区域、国别与专业分布的不均衡。其一，出国留学区域分布失衡。这主要体现在公派留学名额的分配上，目前我国公派出国留学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一流高校的学生和教师，对中西部、东北等欠发达地

区的地域性倾斜政策比较少，对地方高校师资培养的支持力度不足，少数民族公派留学生比例有待提高。<sup>[20]</sup>其二，出国留学目的国相对集中。以2016年度数据为例，我国有逾九成的人员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十个热门国家留学，其中赴英语国家留学人员的比例达到77.91%。2017年教育部数据显示，当年出国留学的60.84万人中，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的人数有6.61万人，占比10.86%。可见当前“一带一路”国家虽已经成为留学教育新的增长点，但相应比例有待提升，多数出国留学人员仍前往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求学。其三，出国留学专业分布相对集中。2010年“工商管理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是我国本科毕业生留学的四大热门专业类，占比分别为45.1%、13.5%、6.2%和6.0%，<sup>[21]</sup>在总留学人数中占据的比例超过七成。2016年本科毕业生选择工商管理作为留学专业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仍为最热门专业，占比31.4%。<sup>[22]</sup>

其次，政府奖学金的引领作用有待提升。我国公派留学项目稳步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奖学金资源紧缺背景下，如何提升政府奖学金引领作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奖学金优先资助学科上看，我国在优先派遣国家发展建设急需的理、工、农、医等学科人才上还有待加强，对信息、能源、资源、环境、农业等关键领域及人工智能、空间生命科学、海洋科学、纳米新材料等战略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从奖学金资助国别上看，我国应当加大力度资助学生到“一带一路”等沿线国家去留学，引领更多的人到一些相对冷门但非常重要的国家去学习和交流。从奖学金资助的对象上看，与公派留学项目相比，我国目前针对自费留学生的资助政策尚不完善，且在吸引自费留学人才回国服务方面没有成体系的奖励政策，这对我国吸引优秀自费留学人才形成了巨大障碍。

再次，出国留学管理与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一方面，目前我国公派留学管理工作具有重心在前的特点，虽在留学生选派上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工作体系，但对在外留学生的管理、联系和评估工作很不到位。留学人员每季度向驻外使领馆提交的研究进展情况及工作小结流于形式，派出单位对

留学人员在外情况更是知之甚少，导致公派留学生长期失联、滞留不归或人才流失的现象较为普遍。另外，我国公派管理工作千头万绪，申请与审批程序复杂，各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差，导致留学人员的体验感欠佳。另一方面，2003年以来，国家虽逐步开始重视对自费留学市场的规范与引导，但与公派留学项目相比，我国对自费留学人员的管理与服务仍不到位。我国虽已经通过合同范例的发布、中介资格的披露等途径规范中介机构的有序发展，但是逐利倾向仍然驱使一些非法和质量低下的中介机构违反市场秩序损害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利益，坑蒙拐骗、发布虚假信息、伪造材料、乱收费等现象依旧存在。另外，国外留学环境复杂多变，而自费出国留学群体又具有低龄化和缺乏安全意识的趋势，在管理和服务体系缺位的背景下，自费留学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难以保障。

最后，人才流失十分严重。教育部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201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585.71万人，在已经完成学业的432.32万人中，有365.14万人选择学成后回国就业和服务，占比84.46%，可见回流率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大幅提升。但是由于留学人员总体基数大，以及高层次、高素质留学人才流失严重，我国出国留学教育依然面临着严峻的人才流失问题。人才流失的原因很多。从机制上看，我国缺乏相关机制妥善安置留学归国人员。从配套措施上看，目前对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资助力度与实际需求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引导留学人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区、单位和行业工作的政策措施尚不完全配套。目前鼓励回国服务、为国服务的方针，还难以适应那些已经取得其他国家国籍但仍愿意为我国服务的留学生的需要，国民待遇问题仍是制约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的瓶颈。<sup>[23]</sup>此外，我国所提出的一系列吸引留学人才的政策关注的大多是资金待遇、科研设备、子女入学等硬件条件，对于国内的学术氛围、留学回国人员的心理冲突和情感需求等几乎没有关注。这很可能导致一大批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后无法适应国内学术话语体系和无法满足心理需求又再次流失海外。

### 三、进一步发展我国出国留学教育的政策建议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我国要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优化出国留学服务。针对当前我国在出国留学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 （一）加强统筹规划

针对当前出国留学教育领域存在的结构失衡问题，未来我国应该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规划，促进出国留学结构的均衡化，使得出国留学结构更为合理、分布更为广泛。具体来看，国家的统筹规划职能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促进公派留学的区域性平衡。具体来看，公派留学要加强人员选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我国要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的特别项目和地方合作项目，开发并维持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专项计划，使这些地区有更多人员派出，更重要的是使这些人员能够回相关地区参加工作。此外，我国还应加大对地方高校的扶持力度，为弱势群体以及少数民族制定并实施倾斜性政策。

二是促进出国留学目的国分布的均衡化。针对目前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相对集中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现象，未来我国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能力，努力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加大力度派遣人员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以适应国家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和国别区域研究人才的需要。

三是促进出国留学专业分布的均衡化。我国要继续优先派遣国家发展建设急需的理、工、农、医等学科人才，重点发展通信与信息技术、农业高新技术、生命科学与人口健康、材料科学与新材料、能源与环境、工程科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等重点资助学科和专业领域，同时适当增加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等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留学人才的派遣。

#### （二）集中公派留学资源培养国家急需人才

未来，我国要充分有效地发挥公派留学的调控补给作用，集中公派留学资源全方位培养国家发

展建设急需的拔尖人才，必须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选派机制，真正依据国家战略需要选拔最优秀的人员出国留学，提升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益。其中包括：

公派留学人员的选派要继续坚持“按需派出”“效益优先”的原则，紧密根据国家需要选派留学生，主要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薄弱、空白、关键的领域，重点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新领域，真正培养我国转型发展所紧缺的顶尖创新人才、领军人才和大师级人才；继续坚持“三个一流”的选派路径，派遣优秀的学生赴海外一流高校师从知名导师学习，确保公派出国留学的高水平和高标准；充分发挥政府奖学金的引领作用，加大择优资助扶持力度，支持更多的学生去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有组织、成批量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派出实习生，加快非通用语种人才、国别与区域问题研究人才和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

### （三）优化出国留学管理与服务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优化出国留学服务”。此前，2016年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也强调当前我国的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我国出国留学服务体系基本健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强调“提高对留学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可见，优化出国留学管理与服务是未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领域的一大重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出国留学服务与管理过程中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服务意识。在留学工作中体现以人为本，就是在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以留学生群体的切身利益和需求为本，充分考虑留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与生活需要，使之真正受到留学生的欢迎。突出服务意识就是要适应留学工作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推进政府相关职能转变，切实提高政府及学校在出国留学各个环节的服务水平。<sup>[24]</sup>

二是加强对公派留学人员的管理与服务，健全全链条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具体表现为：构

建多层次多主体快捷高效的公派留学人员管理和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留学基金委、留学人员国内推选单位、驻外使（领）馆教育（文化）处（组）、国内外导师在留学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密切与在外留学人员的联系；建立和完善公派留学人员目标考核评估机制，开展多途径、多种形式的评估活动，加强对留学过程和成效的动态监控，确保公派留学达到预期的目标；简化和规范出国留学审批程序，优化网上报名申请程序，全面提升留学生服务管理水平。

三是完善出国留学电子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包括：继续优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中国留学网、中国留学英才网和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网站等信息平台建设，提高选派、管理、就业等信息的实时性和可获得性；加强教育涉外监管网的宣传和维护，实时更新外国留学政策新变化，及时发布留学预警，及时披露违规留学中介活动情况，不断更新和完善具备资质的国外院校名单，使其覆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建立与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加大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团队的引进力度和效率。

### （四）加强对自费留学生的服务、管理和资助

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精神，加强对自费留学生的管理、服务和资助将是未来我国出国留学教育领域的工作重点之一。

首先，进一步加强对自费留学生的服务。相关部门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对自费留学人员的服务，特别是要在观念上、政策上给予自费留学生与公费留学生同样的重视，为自费留学人员提供信息服务、完善配套措施、改善服务机制、健全市场监管等。<sup>[25]</sup>我国还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源，增加与自费留学人员的联系，为自费留学人员在国外的学习、生活提供便捷的咨询和投诉渠道。此外，针对海归们面临的对国内就业信息掌握不足、毕业季错过国内校招季以及不适应国内大环境和面临文化冲突等困难，我国需要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建立海归就业指导中心和举办海归人才专场招聘会，帮助归国的自费留学人才实现顺利就业。

其次，进一步加强对自费留学生的管理。针对留学中介市场紊乱的情况，我国应当完善自费出国留学监管体系，加强教育、工商、公安和行业协会等多部门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市场的协调和监管，及时有效对投诉案件进行查处，对非法中介机构进行披露。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自费留学行业自律机制，推动自费留学行业诚信建设，建立自费留学机构信用评价机制，保障自费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此外，我国还要继续提升出国留学行前培训在自费留学生群体中的覆盖率，保障平安留学。

最后，进一步加大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资助力度。包括：完善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择优资助政策，扩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资助和奖励的范围与力度；增设对优秀自费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后的专项资助计划，为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回国服务的自费留学人员提供在外留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全额或部分补助；完善对自费留学生就业创业的资助政策，加大对自费留学生就业创业资金扶持力度，通过设立创业基金、就业专项资金和就业奖励资金等方式，吸引重点建设项目和自主创新方面的自费留学人才在国内就业创业。

#### （五）健全留学生归国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要“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的优惠政策，以及科学的激励机制，对回国人才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制度性保护，是实现其长期发展的必要保证。<sup>[26]</sup>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要鼓励和引导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需要做到：

第一，健全留学生归国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具体包括，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政策和体系运行机制，保障及落实留学回国人员在薪酬、户籍、社会保障、住房安置、子女入学、科研设备、科研经费等待遇及配套设施方面的要求。此外，针对当前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多面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现象，未来我国应扩大政策的受惠范围，将不同类别和不同就业需求的归国留学生都纳入国家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体系中。

第二，营造更为包容、积极和开放的文化氛围。包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选拔与评价机制，畅通优秀人才在国内外和“体制内外”的发展渠道；<sup>[27]</sup>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平等竞争的学术环境和团结协作、和谐愉快的工作环境，避免官僚主义、行政权力过多干涉学术研究；<sup>[28]</sup>创造宽容的人才发展环境，切实了解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在工作、生活以及心理层面的实际需求，帮助他们回国后更加适应国内学术话语体系和生活环境，以长期吸引和留住优秀留学人才。

第三，加强海外留学人才引进和成果转化。在各地建设的创新创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尤其需要通过创新人才制度吸引海归就业创业，通过各地财政、工商、人社等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向海归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渠道。<sup>[29]</sup>同时加大对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园和孵化基地的建设工作，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高层次留学人才从事高新技术转化活动，促进海外留学人才的成果转化。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666.
- [2] 北京高教学会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 出国留学工作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3:137.
- [3]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667.
- [4]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2009[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418.
- [5] 李滔. 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691-692.
- [6] 李滔. 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691-692.
- [7] 冉春. 留学教育管理的嬗变[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240-241.
- [8] 冉春. 留学教育管理的嬗变[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247.
- [9] 苗丹国. 我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的持续性发展与趋势研究 [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6):1-12.

- [10] 冉春. 留学教育管理的嬗变[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 255.
- [11] 冉春. 留学教育管理的嬗变[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 260.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7年出国留学、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EB/OL]. (2018-03-30) [2019-09-0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803/t20180329\\_331771.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803/t20180329_331771.html).
- [13] 刘晓晶. 教育部留学行前培训达87万人次 系列宣传活动在沪举行[EB/OL]. (2018-04-01) [2019-09-07]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6546478003357445&wfr=spider&for=pc>.
- [14]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教育部公布2016出国54.45万人 来华留学44万人[EB/OL]. (2017-03-01) [2019-09-06] <http://www.jsj.edu.cn/n2/7001/12107/946.shtml>.
- [15] 王辉耀.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
- [16] 苗丹国, 程希. 1949—2009:中国留学政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上)[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1-7.
- [17] 苗丹国. 我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的持续性发展与趋势研究[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6):1-12.
- [18] 苗丹国. 出国留学六十年[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131.
- [19]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668.
- [20]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2009[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23-24.
- [21] 王辉耀.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17.
- [22] 王辉耀.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54.
- [23]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2009[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24.
- [24]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2009[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27.
- [25]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2009[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27.
- [26] “出国留学财政政策研究”课题组. 我国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资助政策现状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6):154-166.
- [27] 王辉耀, 苗绿.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28] 甄艳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政策的演变及对策思考[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7.
- [29] 李强, 孙亚梅. 对于中国大学生出国留学四个趋势的认识与思考[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8(5):93-100.

## Review and Prospect of Overseas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u Baocun Peng Chanjua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China's overseas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periods of initial establishment, explor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improvement, and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and trained millions of high-level talents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lthough we have accumulated abundant experience,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unbalanced structure of overseas education, the weak role of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the poor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ystem, and the serious brain drain.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abroad, we must strengthen overall planning, concentrate public resources to cultivate urgently needed talents,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studying abroad, strengthen the service,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self-funded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preferential employment of returned students.

**Keywords:** the founding of PRC; study abroad; historical evolution; future trend

# 中世纪传统大学之衰落：一个学术资本化的分析视角

胡钦晓

**摘要：**中世纪后期，巴黎、博洛尼亚等欧洲传统大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衰落，步入了发展的“冰河期”。探寻中世纪传统大学走向衰落的原因，不但可以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而且也可以对当下大学发展提供启示。从学术资本化的视角来看，中世纪传统大学的学术资本已经金钱化，知识被金钱所遮蔽，逐渐成为贵族的特权；学术资本已经关系化，知识被利益或姻亲关系所遮蔽，甚至是被绑架；学术资本已经政治化，大学或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纷争，教师热衷于追逐政治权力；学术资本已经去道德化，教师职业道德整体滑坡，大学教学和学位授予普遍存在道德缺失。中世纪大学后期所产生的学术资本化现象，为当下大学的学术资本主义倾向敲响了警钟。

**关键词：**中世纪传统大学；衰落；学术资本化；学术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50-07

中世纪大学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大学生成的原点，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欧洲传统大学，共同创造了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然而，及至中世纪后期，这些传统大学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衰落，部分大学甚至自行消弭或被强行取缔。这段时期，也被学者称之为传统大学发展的“冰河期”。探寻中世纪传统大学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原因，不但可以寻找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而且也可以对当下大学之发展提供启示。大学是从事高深知识的机构，学术资本<sup>①</sup>是其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sup>[1]</sup>但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其他资本形式相似，学术资本的发展同样存在边界。学术资本一旦逾越边界而衍生为学术资本化，必然会对大学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说中世纪大学中前期，师生间的知识交换还存在公正、公平的逻辑，还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那么，及至中世纪后期，大学内外部的知识交换逻辑发生了质的转变。高深知识的过度商品化，使知识被金钱所蒙蔽，被利益关系所隐蔽，被政治权力所遮蔽，知识

与道德渐行渐远。学术资本不再以学术为鹄的，其目的在于攫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关系利益和权力利益，学术资本化最终导致中世纪传统大学的衰落。

## 一、学术资本的金钱化

雅克·勒戈夫认为，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学成员尽管拿着教会的圣俸或世俗的薪金，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从现有工作中获得报酬。不仅如此，在这个大饥荒和大瘟疫相伴，各种战争频仍的艰难时世里，他们顽强地抓住这点不多的收益。他们越来越贪婪地要求大学生为听课付钱。他们增加关于赠礼的规定，这些赠礼是大学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送给教师的。他们对大学里所有可能增加他们负担的开支都作了限制。可以无偿听课和攻读学位的穷大学生的数量，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一再予以消减。教师们已经成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此外他们还仿效其他富人的榜样，热衷于投机事业。他们变成放高利贷者。他们主要把钱借给急需的大学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BIA140104)

**作者简介：**胡钦晓，男，山东巨野人，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青年长江学者，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历史与比较研究。

作为押金，他们收取价值比借款高两倍的抵押物：书籍。<sup>[2]</sup>据韦尔热考证，15世纪，大学越来越排除贫穷学生。在帕多瓦大学，在博洛尼亚大学，每个学院都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贫困学生。授课证书和博士学位收取的考试费用，本来已经相当可观，此时更高，甚至出现由于货币价值波动而采取考试费用的浮动等级。征收考试费用的严厉状况，极少有免除和缓缴的现象。新博士必须举办学位典礼（宴会、舞会、比赛），并邀请大学全体成员和社会名流出席。所有这些可观的花销，对于富裕的学生都可能要负债，对于其他学生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sup>[3]</sup>中世纪大学产生时期那种托钵游走、沿街乞讨，争相奔赴大学学习的活跃景象已成过往云烟；中世纪早期大学那些因贫困，只能住在极其简陋被称之为“鸟窝”的阁楼上，学习时只能是在号称“麦秸街”（Straw Street）的简陋教室内的学生也已近乎绝迹。

众所皆知，考试是大学教师控制学生的重要关口，而学位授予则是学生获得从业证书的最后一个环节。中世纪末期大学在这两个方面对盈利的热衷近乎疯狂。与考试不相关的花费，诸如葡萄酒、蜡烛等一一罗列，学位授予中的装束则极尽奢华，譬如丝绸手套、山羊皮手套、绵羊皮手套、金戒指等应有尽有。这些与知识能力不相关的花费，从1427年帕多瓦大学的考生费用（包括个人考试的花费、集会和博士授予仪式的花费）中便可见一斑。<sup>[4]</sup>

表1 1427年帕多瓦大学个人考试的花费

支付款项	支付金额
12名学院教师	12杜卡托 (duc.)
大学校长	2杜卡托
主教的代理	1杜卡托
教授会会长	1杜卡托
主教的主事	3杜卡托
考试团	3杜卡托
大学的人	7里弗尔 (libr.)
教授会	1里弗尔
普通勤杂工	1里弗尔
学院公证员	1里弗尔
大学公证员	1里弗尔
专门勤杂工	3里弗尔
敲钟和鼓	1里弗尔
板凳	12苏 (solid.)
5本忏悔书	3里弗尔10苏
8瓶酒和30支蜡	14苏
5瓶白葡萄酒	2里弗尔12苏
4瓶山区葡萄酒	16苏
短笛和小号	1杜卡托

表2 1427年帕多瓦大学集会和博士授予仪式的花费

支付款项	支付金额
各位考官	14尺布，或12杜卡托
勤杂工	8尺布和1杜卡托
各位考官的专门杂役	8尺布
12位学院教师	6杜卡托
学院院长	1/2杜卡托
教师团	1里弗尔
学院公证员	1里弗尔
板凳	1里弗尔
5双丝绸手套	7.5里弗尔
5打山羊皮手套	25里弗尔
7打绵羊皮手套	17里弗尔
6枚金戒指	12里弗尔
7顶四角帽	5里弗尔5苏
椅子和钟	2里弗尔16苏
特别费	1杜卡托
羊皮纸、蜡和丝绸	8苏
小号和短笛	1/2杜卡托

所有以上用于考试、集会和学位授予仪式的花费，都是帕多瓦大学章程明确规定的，而且支付费用清单开头第一句是“以耶稣基督之名（Ihesus Christus）”。毫无疑问，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统摄的欧洲中世纪世界里，这样的约束无疑是最为严厉的。知识不但被金钱所遮蔽，信仰也充当了教师窃取金钱的庇护神。与帕多瓦大学相比，15世纪巴黎大学的学生花费毫不逊色。巴黎大学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等高级学院的学生需要在毕业时为所有教师赠送长袍（robes），要为其他出席仪式的显贵赠送方帽（caps）。据雷默斯（Ramus）估算，1562年巴黎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获得者的花费大约在56里弗尔（livres）13苏（sols），医学院的学生要花费881里弗尔5苏，神学院的学生则要花费1002里弗尔。这些仅仅是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花费，尚不包括之前一些小额费用。1452年，贵族内维尔（George Neville）在获得巴黎大学的科艺硕士学位时，第一天的宴会就准备了600人的膳用肉食，第二天又准备了300人参加的宴席。<sup>[5]</sup>尽管很难对巴黎大学学生的学位授予及其后举行的宴会花费进行精确计算，但是从以上数字中不难看出学位仪式和宴会的奢华。如此高额消费，不能不使贫穷学生望而却步。可见，此时的中世纪大学，知识已被金钱所遮蔽，逐渐成为贵族的特权。

## 二、学术资本的关系化

1280年博洛尼亚市政引进教师薪水制度时，教授的遴选仍然掌握在学生手中。这种由政府出资，学生推选教授的做法无疑保障了高水平教师之间的自由竞争。但是，伴随财政拨款不断增加，市政当局介入教师遴选的力度也不断增强。1381年，博洛尼亚受聘的21位法学教授中，仅有一位是学生选举产生的，其余皆由市政当局委托的“学术改革委员会”（Reformatores Studii）任命产生。为弥补学生丢失选举教师的权力，市政当局承诺为6名学生提供薪水教席（salaried Chairs），这些教席可以由学生自主选举产生。但正是这一规定引发了竞争者及其支持者之间街头武斗的严重冲突，大量伪证（infinate perjury）出现，学有不逮（undeserving）甚至目不识丁（illiterate）者被选为薪金教席。最终，抽签（lot）代替了选举，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更为糟糕。从此，学生教席已再无聆听的价值。<sup>[6]</sup>基于知识能力遴选教师，是确保大学学术水准的重要条件，博洛尼亚学生教席的遴选明显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在利益关系驱使下，学生教席遴选最终被武斗和伪证所裹挟。

除学生教席的遴选，在教师教席遴选中，中世纪末期大学同样面临被利益关系、甚至是裙带关系所遮蔽。早在13世纪，著名法学家阿库尔修（Accursius）就已经为博士们的子弟，请求在博洛尼亚大学得到空缺的教师职位的优惠权。但地方当局在1295年、1299年和1304年均予以拒绝。在以后的制度演变中，情况发生了悄然变化。1394年，帕多瓦大学宣布，一个博士，只要他属于某一博士的父系世裔，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学会，即使世系中有一员不是博士也无妨。1409年规定，一名博士的子弟必须被允许免费参加各项考试。这种大学寡头制的形成，导致知识水平大大下降，同时赋予大学人员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sup>[7]</sup>韦尔热同样认为，通过对中世纪末期大学教师名录的研究，可以看到，在许多大学存在子承父业，对于教士，则是侄承叔业。这些现象不但可能导致大学教学水平的降低，而且也转变了教授对于知识和职业的态度。

度。无功利的科学情趣、与他人分享的欲望、对辩论成果价值的确信，以及12和13世纪教师们为之奋斗的思想，所有人都能够并都有权教授的思想，均丧失殆尽。从此，知识被认为是一种占有，是一种财富。如同房屋、土地、书籍，知识成为教授家族遗产的组成部分，它保障着个人地位，从而保障着全部现存的社会秩序。<sup>[8]</sup>在利益关系的驱使下，教师职业演变为可以继承的职业，不管继承者知识水平的高低；教授也从知识的“生产者”，逐渐演变为坐享其成的“食利者”。

中世纪末期，大学教师职业的继承性，绝不仅仅限于意大利大学。为达到教师职业继承的合法性，意大利之外的大学也不断降低教师录用的学术标准。这种学术标准究竟降低到何种程度，主要看申请人（大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知识能力和水平。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认为，15世纪时，学位授予的低标准是导致诸多大学学术生活彻底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曾经一段时间里，牛津大学承认任何一位学院“近亲”（close）或“创办家族”（Founder's kin）成员，有资格获得学院教职（College Tutorship）。当巴黎大学的教师录用已经是一个普通人员都可达到的水平时，其教学必然沦落到比牛津大学还差的水平。更甚者，当贵族（aristocratic）或富人申请巴黎大学教职时，学院的大门则为其破例打开。<sup>[9]</sup>可见，无论是牛津大学，还是巴黎大学，在教职申请过程中，都存在知识被利益关系遮蔽甚至绑架的现象。

## 三、学术资本的政治化

及至中世纪后期，伴随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式微，教会大分裂造成的教皇威严降低，以及众多割据性诸侯王国势力的崛起及相互征伐，往昔“教权”“皇权”“学权”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被渐次打破。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到诸多政治权力牵制，或沦为教会权力的奴仆，或沦为世俗权力的羔羊，知识发展最终被权力斗争所遮蔽。

### （一）大学被动陷入权力纷争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因地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两大势力之间，时常成为两派争夺的对

象。在两派势均力敌的初期，均争相拉拢博洛尼亚大学并给予诸多特权和优惠。但是，及至中世纪末期，伴随帝国权力式微，博洛尼亚市政当局逐渐向教皇势力靠拢，并要求大学教师必须向教皇靠拢，对于不服管治的皇帝派人士进行流放。对于一些流放的教师，即使允许他们返回博洛尼亚从事教学，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皇帝派的政治立场，宣誓皈依到教皇派势力。对于那些不放弃皇帝派立场的教师，即使是能够留在博洛尼亚从事教学，也是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时常受到来自学生和民众中极端分子的骚扰、威胁，甚至是迫害。博洛尼亚市政章程和评议会表决中，不断明确提到：教师绝对不能归属于皇帝党。<sup>[10]</sup>事实上，在意大利其他大学中，教师同样也处于教皇派和皇帝派的政治权力斗争漩涡之中。这种深陷斗争的纷扰，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即大学及其教师的被动卷入。

## （二）大学主动卷入权力纷争

中世纪时期，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重要大学，曾在社会各阶层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教会大分裂期间，巴黎大学还曾经以神学仲裁者的身份参与宗教事务的调停。如果说在14世纪之前，大学与政府和宗教还较少激烈冲突的话，那么在15世纪，由于过度参与政治斗争，巴黎大学不但逐渐失去了教会的信赖和支持，而且还招致法国国王的强烈不满。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37—1453），巴黎大学全体成员宣誓服从《特鲁瓦协定》（1420年），承认英王亨利六世为法国国王。在英国人占领巴黎之际，大学与英国总督贝德福德（Bedford）保持良好关系，并积极宣传有利于英国统治的新制度。1431年，在圣女贞德案的审判中，巴黎大学不但撰写了攻击贞德的檄文，还为审判贞德提供谋划，并裁定以异端和女巫罪判处贞德火刑。1436年，法军收复巴黎，大学成员又旋即与法王查理七世重归于好。不久，巴黎大学又对查理七世的宗教政策强烈不满。最终，查理七世和后继的路易十一，都不信任巴黎大学这个“叛徒”。1437年，国王查理七世撤销巴黎大学的税务特权，并迫使它为收复蒙特里奥而征收的“资助”提供资金。1445年，巴黎大学的法律特权也被撤销，大学被置于议会的管辖之下。1470年，路易十一迫使师生宣誓效忠。1499

年，巴黎大学失去了它的罢课权。<sup>[11]</sup>正如雅克·韦尔热所言，在法兰西即将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之际，巴黎学者只看到两件事情：战争对其特许权和薪俸带来的危险，对信仰本身和他们宣扬信仰的使命的威胁。大学不是提出合理的和平纲领，或做出有效的判决，而是满足于空谈全体信徒团结的必要性，空谈不惜一切代价直接重建和平，空谈战争的邪恶。这些空想置君主的雄心和民众的感受于不顾，几乎无法让人理会。<sup>[12]</sup>巴黎大学主动卷入宗教纷争，在面临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又主动讨好敌国，不但使自己丧失了诸多特权，而且也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 （三）大学教师热衷政治权力

14、15世纪，欧洲各地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波兰、匈牙利、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等纷纷建起了大学。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世俗权力，不断加强对大学的统治，甚至把大学看作政治组织的一部分。薪酬制度实行后，很快遍布南部欧洲大学，14世纪末又发展到北部欧洲大学，尤其是德国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薪酬制度使教师不再依靠学生的学费生活，但其消极方面是，学生们经常抱怨，教师花费过多的时间参与城市、贵族或皇家事务，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教师旷课。大量教师牺牲他们的教学责任，热衷于大学外部事务。他们经常未经学生允许而指定代课者，甚至无故缺席。以至于权威部门不得不出面干预，但是仍然很难阻止教师参与外部事务的热忱。<sup>[13]</sup>毫无疑问，教师的主要职责应当是教学，就像工人的主要职责是做工，农民的主要职责是种田一样。如果教师将大量时间用于政治事务，而影响甚至忽略了教学，本质上就是职责的本末倒置。学者过度热衷于政治，不但对所在大学的教学秩序造成混乱，降低了大学培养质量，损害了大学学术声誉，而且影响到学者自身的知识探索和更新，从知识生产和传授的“自由人”，转变为政治权贵的“奴仆”，最终也为学者自身带来不可挽回的消极影响。

## 四、学术资本的去道德化

道德是知识的守护神，缺失了道德的知识，不

但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且还会败坏整个社会风气；不但使知识人遭受社会的谴责，而且也会使其所在的大学蒙受声誉上的损失。如果说在12世纪的时候，中世纪大学的教师还秉持着职业操守，那么到了中世纪后期，这些操守逐步衰退。

### （一）教师职业道德整体滑坡

中世纪大学成立早期，教师们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理性道德形式，强调追求崇高是人类永远福祉的原始动力。这种道德追求不但为大学学者提供了神学之外的严密哲学，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传统教师理想之外的职业伦理，亦即，知识分子的劳动，作为求知的无私奉献，本身具有其公正性，因为它是自我完善的因素，是力量与智慧的源泉。15世纪，大学教师的这种职业道德在教权和王权的多重诱导、牵制或压服之下，渐渐变得支离破碎。教师的工作已经不再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大学学者的道德也不再是教师职业道德，而是宗教的和政治的道德。在这种道德支配下，大学的自治、教学的自由、思考的自由、教授职业自身尊严的神圣感，都已不复存在。大学的贵族化、教授趋同于贵族的欲望，加重了社会对博士以知识为业思想的失信。博士期盼像贵族那样以食利为生，否认了13世纪形成的行会模式（师徒关系、甚至商人与客户关系），代之以从贵族价值领域借鉴的家长式模式（修道院长与修士的关系、领主与仆从的关系）。关于教师的这种生活方式，巴黎神学院的主要教师之一，让·博佩尔（Jean Beaupère）的职业生涯具有典型意义。在1400年—1420年，作为神学院教师的博佩尔，先后获得巴黎和贝藏松的两份政府薪俸，使其得以悠闲生活。但实际上，教学远非他所关注的主要职业，他不停地旅行和出差：任勃艮第公爵的幕僚，参加圣女贞德的讼案，作为大学代表赴罗马，又去参加巴塞尔主教会。在60多岁时，博佩尔回到贝藏松，在那里于1463年逝世。<sup>[14]</sup>纵观博佩尔的一生，虽为大学教师，但是教师职业道德已经在他的身上荡然无存。此外，如前所述，中世纪后期大学教师向学生发放高利贷，攫取学生的礼品及礼金等，均折射出大学学者职业操守的整体性滑坡。

### （二）大学教学的道德性缺失

如果说在中世纪中期，哲学（理性）与神学

（信仰）相结合产生了经院哲学，促进了大学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到了中世纪末期，经院哲学的理性和信仰开始分道扬镳，在中世纪传统大学中掀起的“反唯智论”，把理性从信仰中驱逐出去，“时人沉浸在宗教教义的研读中，追求天国与来生，希冀提升到‘超自然’（Super-nature）的境界，因此只知道有神而不知其他”。<sup>[15]</sup>大学中的神学一旦与理性脱离，不但造成教学内容的贫乏，而且还带来了方法上的畸形。大学只是部分地学习《警句读本》，而《圣经》讲授重新成为神学教学的基础课程，并日趋僵化。神学院更多依附于教会权威，承担教会所期待的角色：打击异端邪说，加强知识监督，阐释宗教正统。神学与理性的脱离，使中世纪大学的论辩（disputationes）走向了穷途末路。原来的论辩旨在激发师生思维，阐明疑难和知识创新，但是中世纪末期的辩证法已经退化成一种在词语上要小聪明的游戏，而且平庸之极。有一位作者就描述过这样一个例子，论辩的目的是要决定，到底是系着猪的绳子还是牵着绳子的人，把猪拉到了市场。论辩经常蜕变成相互谩骂、粗言恶语乃至侮辱恫吓，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彼此撕咬，最后留下死伤者横在地上。<sup>[16]</sup>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巴黎大学校长约翰·热尔森认为，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这只是精神的空虚、徒劳与窘迫。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将要消失，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中，不会有问你们知道些什么。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sup>[17]</sup>不难看出，即使巴黎大学的校长对于知识都持这种态度，可以想象巴黎大学的教学已经沦落到何种地步。

### （三）学位授予的道德性缺失

到了15世纪，对于传统大学中的考官和申请人来说，买卖学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赚钱的商业行为。因为教师职位有限，而申请人不断增多，所以在学位授予中，行贿或者托关系开始出现。学位授予标准极其宽松，没有记录显示任何一个申请人是因为知识不足而被拒绝的。<sup>[18]</sup>在阿维尼翁，有些学生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周的逗留之后，便从教授手中获得了学士文凭或授课证书，那些教授则极

其幸运地在这些机会中迅速地得到了学生交付的酬金和礼品；在奥朗热，大学在没有进行任何教学的情况下，竟然授予了部分博士学位，这完全属于毫无廉耻地兜售文凭。尽管巴黎法学院的历史较长，也没有特别好的声誉，因为其颁发的文凭也充满着金钱交易。最后，一些教士利用其与教廷的关系，不经任何考试，集体通过教皇通谕，获得了授课证书。<sup>[19]</sup>可见，中世纪大学末期，兜售文凭已绝非个案。如果说，教师增加学生考试和学位授予仪式花费尚可谅解，那么考官置学生知识能力于不顾，肆意进行学位证书买卖，则已近乎达到无耻的地步。买卖证书完全摆脱了知识能力的考量，大学也就不能再称其为大学了。及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社会上普遍要求取消传统大学建制的呼声迭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在中世纪后期，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已不再是高深复杂，而是被宗教信仰所遮蔽；大学进行知识创新的动力，因物质、权力和关系而懈怠；在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打压下，大学进行知识发展的理性捍卫力量已不复存在，唯宗教或政治事务是瞻。学术资本在中世纪大学后期，或发生变异而不能再称其为学术资本，或被经济、政治、关系等利益所淹没而丧失主导地位。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大学不以学术资本积累为主导，就像企业不以经济资本积累为主导、政党不以政治资本积累为主导、中介不以社会资本积累为主导一样，一旦其安身立命的基本职责被削弱或替代，大学必然走向衰落！

## 五、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府对公共事业支出的经费锐减，高等教育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依靠自己寻找资金来源。在大学以及教师寻求外部资金的过程中，学术商业化运作、提高收费标准、热衷校外培训及兼职、忽视本科教学及培养等，也随之相伴而生，学术资本化甚至学术资本主义呈现出蔓延态势。学术资本化，实质上就是学术牟利化；学术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学术商品化。学术是一种资本，但是绝对不应当学术资本化；学术可以作为商品，但绝对不应当学术

商品化。当高深知识被物质金钱所蒙蔽，当高深知识被利益关系所隐蔽，当高深知识被政治权力所遮蔽，当高深知识与道德操守相分离，遭受损失的最终是大学自身。中世纪大学后期所产生的学术资本化现象，为当下大学的学术资本主义倾向敲响了警钟。

环顾当下大学之发展，高等教育遭受诟病之处，与中世纪大学后期的现象何其相似。大学象征性地免除学费或高价收取学费，已经使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少数族裔与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无缘；教师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不惜数据造假、剽窃抄袭，通过学术不端来谋取个人私利；教师热衷于校外兼职、辅导培训等，赚取额外收入是以牺牲教学为代价；私立（民办）高校管理模式中的“夫妻店”“子承父业”现象，与中世纪大学后期的“教师世袭制”如出一辙。凡事有始必有终，有兴必有衰，当今大学如果不能抵制学术资本化蔓延，千里之堤就有可能溃于蚁穴，中世纪传统大学衰落的历史现实还将重演。事实上，中世纪以降，从意大利大学到法国大学，从英国大学到德国大学，再到当今的美国大学，在大学千年的历史演变中，高等教育重镇几经更迭，其背后原因皆可以从学术资本化的视角来寻找端倪。

## 注释

① 所谓学术资本，是指在特定学术场域内（高校或科研院所）的个人或组织，通过所拥有的稀缺性专门知识、技能等高深知识，逐步形成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以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道德标准为约束，通过商品的形式与外界（或在组织内部中）进行交换，进而实现价值增值、提高自身存在和发展竞争力的资源总和。

## 参考文献

- [1] 胡钦晓. 何谓学术资本:一个多元视角的分析[J]. 教育研究, 2017(3):67-74.
- [2] 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张弘,译. 卫茂平,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108.
- [3] 雅克·韦尔热. 中世纪大学[M]. 王晓辉,译. 上海:上海人民

- 出版社, 2007:141.
- [4] 雅克·勒高夫.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M]. 周莽,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195–197.
- [5] Hastings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Volume I :Salerno–Bologna–Paris[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6:475–476.
- [6] Hastings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Volume I :Salerno–Bologna–Paris[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6:213–217.
- [7] 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张弘, 译. 卫茂平, 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110–112.
- [8] 雅克·韦尔热. 中世纪大学[M]. 王晓辉,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46.
- [9] Hastings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Volume I :Salerno–Bologna–Paris[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6:471–472.
- [10] 张磊. 欧洲中世纪大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233–234.
- [11] 雅克·勒高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张弘, 译. 卫茂平, 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125–132.
- [12] 雅克·韦尔热. 中世纪大学[M]. 王晓辉,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28.
- [13] Alan B. Cobban.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M].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0:16–18.
- [14] 雅克·韦尔热. 中世纪大学[M]. 王晓辉,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46–157.
- [15] 林玉体. 西洋教育史[M]. 台北:文景出版社, 1985:155–156.
- [16] 爱弥儿·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M]. 李康, 译. 渠东, 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198.
- [17] 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张弘, 译. 卫茂平, 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121.
- [18] Nathan Schachner. The Mediaeval Universitie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8:134–137.
- [19] 雅克·韦尔热. 中世纪大学[M]. 王晓辉,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06–107.

##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Capitalization

Hu Qinxiao

**Abstract:**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European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such as Paris and Bologna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decline and entered the “glacial period” of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their decline can not only grasp 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capitalization, the academic capital of medieval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was monetized and knowledge was obscured by money and gradually became the privilege of the nobility. Academic capital got involved with relations and knowledge was obscured, and even kidnapped, by interests or in-laws. Academic capital had been politicized. Universities were involved in political disputes either actively or passively and teachers were keen to chase political power. Academic capital broke away from moral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declined overall, and there was a widespread lack of morality in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degree conferment. The phenomenon of academic capitaliza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has sounded the alarm for the academic capitalism of the current universities.

**keywords:** medieval traditional university; decline; academic capitalization; academic capital

# 创新能力建设：大学治理的新挑战

王建华 黄文武

**摘要：**新制度主义将组织环境分为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前者强调环境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后者强调组织环境的效率机制。大学组织活动同时涉及针对制度规范的环境和针对行动效用的环境。大学治理实践需要协调推动治理体制机制的变革与治理绩效的提升，在合法性与效率性之间达成平衡。现阶段大学治理应从重视治理正当向强调治理绩效转变，通过提高大学治理绩效以保障、强化治理的正当性，实现治理正当与治理绩效的协同。大学治理绩效的提升需要聚焦大学能力建设，尤其是促进大学创新能力提升。实践中，通过有效治理促进大学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牢固确立并积极实施“创新治理”的战略。

**关键词：**创新能力；大学治理；治理绩效；创新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57-08

“大学治理”是高等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主题，实现大学有效治理是相关行动主体不懈追求的目标。近年来，我国大学治理改革围绕着以规范组织权力运行为核心的大学章程和相关制度建设以及保障学术权力充分行使的各级学术委员会建设等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些措施的提倡和推行反映了治理主体对于实现大学治理正当性的关切和重视。在各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下这些措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并形成了以追求治理正当为目标，实现大学有效治理的常识理性。然而，对常识的既定认知和逻辑遵循也导致了大学治理研究和实践容易陷入“大学治理存在问题——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治理，追求治理正当——问题得到解决实现善治”的思维定式。其结果，仅仅关注大学治理的正当性，忽视了对组织（治理）行为绩效目标和外部环境及其发展方式、需求的全面分析。大学发展的实质是基础科研能力和支撑能力的建设与提升，进而服务和推动国家、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当前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大学能力建设是新时代赋予大学的历史责任<sup>[1]</sup>，也是大学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大学治理不能只满足于自身正当性发展的诉求，也要使大学有能力服务国家、社会发展，满足国家、社会对于创新知识、技术及人才的需要，要有能力实现从适应到引领的角色转变。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大学的有效治理必须重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治理绩效的提升。

## 一、大学治理：从正当到绩效

近年来，随着公共管理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的兴起和发展，大学治理的相关研究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上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大学治理过程中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的大学组织结构变革及活动的制度化，目的就在于促进大学及其活动获得外部环境（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和内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国家重大课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科调整与建设研究”（VIA170003）

作者简介：王建华，男，河南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黄文武，男，湖北石首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成员的认同，符合其期望、意愿以及各自的利益诉求。已有研究所提倡的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建议，包括政府有限参与和宏观规划、社会第三方机构的评估、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和各种委员会的组建、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运行边界厘清、大学教师与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管理等，更多是向内关注大学本身，强调建构以合法性为基础的制度环境。大学通过治理正当实现了基于合法性的制度环境建构，试图推动大学、政府、市场 / 企业、群体或个人等治理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价值共识，并塑造组织活动的意义框架，从而尽可能避免大学发展的合法性危机。

然而，以基于合法性获得的制度环境建构为出发点，大学治理的行为、目的及结果更多的追求在由社会环境所塑造的规则、价值观、理念系统中大学治理内外各相关主体价值层面上表现为满意、合理或正当，这也正是大学在组织结构和制度上很多看似无效率的做法之所以大量存在的原因。对制度环境所强调的合法性机制的重视要求组织采取那些在特定制度环境下被广泛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做法是否产生效益。“追求对技术环境的适应常常导致对制度环境（合法性）的忽视；而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又常常与组织内部生产过程争夺资源（对效率性的忽视）。”<sup>[2]</sup>大学治理改革对于制度环境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对高校内部组织活动过程（以知识生产为基础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资源的争夺与消耗，无益于办学效率的提高，甚至降低效率。这一问题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学治理过程中的组织结构、制度的“内卷化”，即大学管理的规范制度和组织结构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形成各种名目繁多的活动条例和组织形式，大学管理变革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革新，治理体系日趋复杂化和精细化，管理变得越来越冗余而低效。现有治理结构中，大学组织的某些规则和结构只是一种形式（形式化的制度设计），仅仅是为了追求组织的正当性而设置的，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践价值，部分制度设计难以转化为制度实践或是效率低下而过度消耗资源。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组织环境分为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前者强调环境合法性机制的作用，

后者强调组织环境的效率机制。迈耶和罗恩就指出，任何组织都是制度化的组织，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和塑造。同时他们也认为，组织受技术环境的影响。以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作为组织环境分析二维象限模型（图1）的两个维度。不同的组织在两种环境（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中的嵌入程度具有差异。根据两种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力不同，可将组织在这个二维空间中进行排列形成组织类型分布“连续谱”。“可以设想存在这么一个连续谱，沿着这个连续谱排列组织。这个连续谱的一端是重视产出控制（更受技术环境影响强调效率性）的生产组织，它们的成功取决于对关系网络的管理；在另一端是制度化组织（更受制度环境影响强调合法性），它们的成功则依赖于通过与制度化规则趋同来获取信心和稳定。”<sup>[3]</sup>新制度主义强调组织的开放性，组织为了持续发展必须与环境进行交流和资源交换，从环境中获得组织发展的合法性（从制度环境中获得）和必要资源（从技术环境中获得）。技术与制度并不是环境的一种二分状态，而应视之为环境沿之变化的维度。<sup>[4]</sup>对组织行为的考察，不仅要考虑其制度环境，也要考虑技术环境，组织的持续发展应同时满足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制度环境与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技术环境这两种环境的要求。制度环境要求组织的结构、制度及活动的过程满足法规、理念、文化等的要求；技术环境要求组织的制度、结构设计及其运作方式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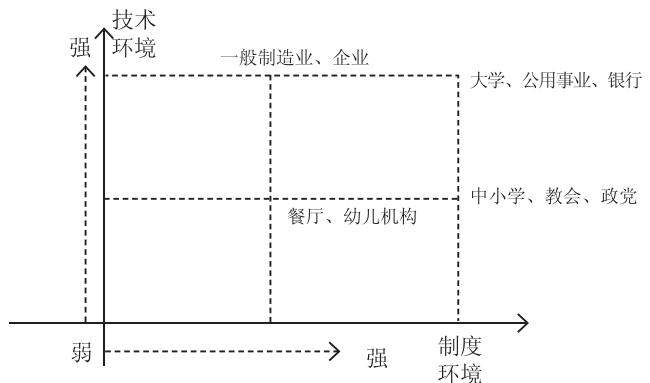


图1 组织环境分析二维象限模型

大学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也是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产物。换言之，大学组织活动同时涉

及针对制度规范的环境和针对行动效用的环境。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强调合法性机制的制度环境，通过追求治理正当的途径实现；而强调效率机制的技术环境则是通过提升治理绩效的方式实现。现代社会大学深度嵌入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是强制度、强技术型组织。一方面大学的活动立足于自身组织特征、发展愿景，寻求组织制度、结构、文化的变革，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基于以自身发展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对外关系，实现组织活动效用最大化，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根植于自身必须应对的技术和制度的多元环境之中。组织应对环境的过程不是单一的，受到一些变量的影响：环境需求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程度，组织资源的本质、数量、来源，个体、组织参与策略行动时的领导能力、利

益动员和价值承诺的差异性”。<sup>[5]</sup>在从“治理”走向“善治”的组织变革过程中，大学治理行动应兼顾正当性逻辑和工具性逻辑，即一方面坚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身发展的合法性，追求组织制度、结构、文化的合理与正当，从而得到组织成员和外部组织广泛的认同以更好地在社会大系统中存续；另一方面“大学必须更多地参与社会，它们必须预见到要处理的有意义的问题，提高大学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对高等教育的怀疑能够很好地转化为对基础研究的承诺和学术重要性的欣赏”。<sup>[6]</sup>只有充分发挥大学作为社会性组织以自身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用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大学的社会价值。大学治理的现代化应协调推动治理体制机制的变革与治理绩效的提升，在合法性与效率性之间达成平衡，大学善治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寻求治理正当的组织的绩效性行为基础之上（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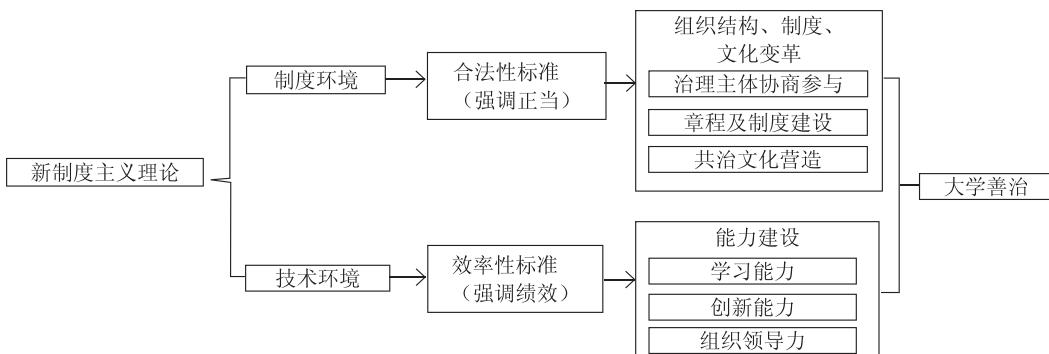


图2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大学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

实践中，任何组织治理都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治理的“有效性”，有效性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形式有效性和实质有效性，前者的核心是强调正当的民主参与原则，后者的核心是突出绩效的效率原则。<sup>[7]</sup>大学治理对正当性的追求往往只能塑造或增强治理过程形式有效的预期，并不能确保或直接推导出治理行动结果的实质有效性。换言之，仅仅强调正当性的治理无法解决组织的发展性矛盾。大学需要的是真正有效的治理而不是作为管理时尚的“伪治理”。大学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其治理必须有利于提高知识组织和知识工作者的效率；必须强调治理结果的实质有效性优先于治理结构、制度等形式有效性；必须指向解决

大学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而不是用来粉饰现实或忽视问题的存在。

休谟曾说，“在所有涉及行为优缺点的道德裁定中，人们总是诉诸效用，效用是与我们人类有关的道德的主要部分的一个基础”。<sup>[8]</sup>重视组织活动的效用也是大学实现有效治理获得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保障。大学作为一类社会性组织，其行为及影响已远远超过大学自身的范围，其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具有工具性价值，即大学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在强调大学的独特性、独立性的同时不应该也不能忽视其工具性特征和作用。大学必须“在坚守自身理性的基础上，通过设法部分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地位”。<sup>[9]</sup>大学在完善组织内部结构和制度（合法性层面）的过程中应注意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组织活动绩效（效率层面）。毕竟“效率是大学善治必需依赖的起始目标”。<sup>[10]</sup>基于此，大学治理改革应更加强调解决与组织效率性直接相关的问题，注重组织“自我产出”效能的提升。通过提高大学治理绩效以保障、强化治理的正当性，实现治理正当与治理绩效的协同。

## 二、创新能力建设：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当前，大学治理理论和实践过于关注正当性制度环境的建构，面对组织发展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暴露出了由设计理性指导的组织结构、制度的内在局限。实践中，基于正当性的治理结构、制度安排更重视治理过程以及对当下诉求的回应，无法及时、灵活应对社会发展的变化，缺乏指导组织发展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理论上，“组织发展自身的有效性观念，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即结构、过程和结果”。<sup>[11]</sup>为强化能力建设，大学治理需要依据治理行为绩效定义有效治理，遵循以绩效衡量、检验治理过程的逻辑和原则。在大学治理进程中通过治理的实践效果证明治理结构、制度设计的正当性，以治理绩效（治理实质有效）回应和消解人们对治理正当（治理形式有效）的质疑。

21世纪是一个更加重视质量的世纪，关注质量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而治理的质量最终是由自主性和能力的互动来决定的，其中能力意味着资源及组织发展的专业化程度。<sup>[12]</sup>对大学而言，高质量的治理意味着经由治理正当和治理绩效共同推动的有效治理的实现并达致善治。正当以“认可”为内涵，绩效以“能力”为核心，正当是给予组织及其结构、制度的一种承认，绩效则是组织能力的一种证明。大学治理绩效从组织层面来说，强调大学在组织结构、制度变革以及在相应体制框架下目标设定、行动实践过程及结果中表现出的能力状态。大学治理变革从制度环境的构建转向更重视技术环境的建设，从关注治理正当到强调治理绩效，应该更加凸显大学组织活动的能力状态，将组织能力建设

置于组织架构、规则和制度之上，将加强大学组织能力建设、提升治理绩效作为实现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环节。

治理的正当性体现在“认可”来自多个主体，治理的绩效也涉及多种能力，如组织学习能力、组织领导力以及组织创新能力等。实践中组织能力是影响组织活动有效开展，推动组织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能力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迈克尔·波特曾将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的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能力为主阶段以及将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的财富效应阶段。<sup>[13]</sup>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强调通过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个体和组织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在知识社会中，大学与外部环境形成了日益紧密的联系，并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可以作为孤立的象牙塔延续下来，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基本知识的这种观点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在的观点是，大学应该作为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柱，生成基础概念并同时为创造有用的产品和服务作贡献。”<sup>[14]</sup>大学要打破仅仅只是知识生产、传承和传播的组织的固有形象，应致力于成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为社会带来价值”。<sup>[15]</sup>大学也不例外，需要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全球、国家、区域创新体系中知识、科技创新主体，成为创新的“引擎”“斯坦福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大学应该扮演那种‘创新的中央引擎与本国科学技术企业的导航’的角色。”<sup>[16]</sup>大学应成为国家、区域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以及适应新需求和造就新机遇的推动者。

从组织发展角度出发，弗莱德里克·莱卢将组织发展模式的范式变革划分为五种类型：红色组织、琥珀色组织、橙色组织、绿色组织和青色组织（进化型组织）。进化型组织是组织发展模式的高级阶段，其被视为有生命并具有自己的方向感，明白想要成为什么以及想要服务于怎样的宗旨，组织系统有能力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并做出适应性、创造性的内在反应。<sup>[17]</sup>对于大学而言，创新是组织持续发展、推动组织持续变革并形塑组织进化理性

的动力之源。创新能力的提升意味着组织拥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竞争优势，能够准确把握社会的发展需求和趋势，从而不断适应、及时调整和创设有利环境。因此，定义组织的“成功”应倾向于创新，而不是模仿，以此来实现组织的卓越性并维持竞争优势。<sup>[18]</sup>当今时代创新能力是大学实力的展现，集中反映大学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也是高等教育领域竞争的关键内容。正如柯特勒和墨菲所言，大学仅仅只是具有特色竞争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其他高校或组织也可能具备不相上下的特色竞争力。大学更要关注自身的差异化竞争力（Differential Competence），即自身的强势领域为其他高校或组织所不具备，或者虽然具备但不足以与之在该领域相比较。<sup>[19]</sup>大学差异化竞争力形成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否占据着知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和最前沿。

具体而言，大学的创新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形态维度的创新能力，即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制度的设计和变革层面上所表现出的能力状态，指向大学治理的组织结构性绩效。大学的发展容易受既成偏好与模式的限制和局限，大学在定义自己时必须走出固化的路线。“当今时代需要增加演变的适应性。因为今天周围的变革步伐加快，大学必须快速响应。”<sup>[20]</sup>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应随着环境的发展不断创新，具备现实的及时应对性和面向未来发展的预见性，从而使大学真正成为在发展过程中“关键的制度性主体”。<sup>[21]</sup>二是组织特性维度的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创新能力以及社会服务创新能力等四个层面，指向大学治理的组织功能性绩效。通过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创新型大学的发展，使大学具备能够有效应对，解决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复杂问题的能力。无论何时，“大学非凡的生命力正取决于其创新中心的特质”。<sup>[22]</sup>创新能力形塑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使其在社会中保持自身的优勢，只有具备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证大学不落后于时代。

陈玉生等人指出，中国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可区分为革旧的有效性、移植的有效性、创新的有效性。只有创新逻辑才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和有

效性的基本范式。创新成为一种生存需要和制度产出，只有创新才能生存与发展。<sup>[23]</sup>同样，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话语体系下的大学治理也应遵循创新的逻辑，以“创新的有效性”作为理解大学治理模式和有效性的基本范式，将创新能力作为衡量大学治理绩效的核心指标。“创新不是一个防御性行为，而是走向成功的战略。”<sup>[24]</sup>为了提升创新能力，大学治理在应变过程中不仅要在制度环境层面淡化组织管理上的等级科层制和构建大学权力运行的良性运行结构；也要在技术环境层面倡导非线性的组织活动模式，提升组织活动的开放性并充分利用整合组织内外部资源（对大学而言的技术环境包括组织掌握的资源、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以及如何创生资源等），推动大学创新能力建设，促进大学的自我更新、自我成长与自我完善。“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能力对所在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乃至整个人类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sup>[25]</sup>基于此，大学治理必须在正当性的基础上，聚焦有效配置整合组织内外部资源（特别是知识资源）、提升组织创新能力。

### 三、基于有效治理提升大学创新能力

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并获得外界广泛的认可。现代大学向创新型大学转型的关键在于将“创新能力建设”作为组织的核心理念和行动目标。大学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及内部组织结构是组织及个人行动的基础，要保证组织创新能力建设的持续向前发展，就需要对大学进行有效治理，消除阻碍创新能力建设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比如科研管理制度、人才培养制度、教师考评制度等。

大学的有效治理是组织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和实现途径。提升大学组织创新能力不仅关涉大学微观层面如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活动等具体活动领域，更与大学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有效治理密切相关。在宏观治理层面，通过治理提升大学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大学创新引导中的战略意识凸显。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提升大学创新能

力的举措，例如2012年发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推动大学建立协同创新中心。2015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鼓励大学积极与企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合作开展协同创新活动。2016年颁布实施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大学在建成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应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外，美国长期以来特别重视通过政策引导提升大学创新能力，比如通过《拜杜法案》《高等教育创新法》《美国创新法》《美国专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激发大学创新活力。此外，还通过成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创新和创业咨询委员会等全国性组织指导大学创新活动，通过“战略性投资计划”资助大学的创新计划。瑞典也通过制定《创新体系中的研究开发与合作》《创新瑞典》等法规和国家创新局的设立来推动大学与产业研究机构、企业之间加强创新合作，并启动创新卓越中心刺激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在中观层面上，大学治理要注重通过组织发展模式和活动框架的变革推动自身创新能力建设。比如威斯康星大学通过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WARF）集合各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指导学校创新活动，搭建教师与学生创新平台、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并为不同系科间的合作研究搭建信息平台，建设各类跨学科研究机构和技术转移组织，成立威斯康星研究区促进不同组织间的创新协同。<sup>[26]</sup>筑波大学推动组织创新能力建设的重点在于构建以学科间协同为核心和与筑波科学城紧密互动的大学内外部协同创新环境，通过市场化治理手段促进大学内外部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建立多主体协同的合作创新机制。<sup>[27]</sup>

概言之，通过有效的大学治理实践促进大学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牢固树立并积极实施“创新治理”战略。“创新，即用知识生产新知识，不是美国那么多民间传说所断言的‘灵感’，也不是孤单的个体在其车库里干得最出色，创新需要系统的努力和高度的组织。”<sup>[28]</sup>实践中，创新行为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和计划性特征，清晰的目标和有组织的努力可以造就创新，创新活动的开展和能力的形成是有组织的，也是需要治理的。基于

此，“创新治理”就是新公共管理中“治理”的理念、结构、模式等在组织行动及其过程中的运用，即创新主体从系统角度思考创新问题在治理逻辑上的延伸；旨在激发组织创新活力，有效配置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提高组织创新效率和效益。创新主体是多中心和非等级的，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行动目标参与创新治理，实现创新平台的搭建、创新要素的集聚、创新支撑条件的供给以及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在外部治理环境上，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应转变计划管理思维，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服务，充分利用政策工具治理大学创新发展，通过一系列引导性和支持性措施、制度供给和体系建设以及政策上的倾斜促进大学创新能力的提升。组建高层次创新治理的决策咨询机构，加强创新治理的顶层设计，制定经济部门、产业部门、科技部门等政府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统筹协调的创新政策和技术转移法律体系，为大学创新能力建设营造良好的宏观创新治理格局。与政府的宏观治理相比，大学是自身组织模式与架构变革提升创新能力的主体，首先强调保持组织的开放性，加强与外部组织的联系，增加创新资源获取通道，打破个体组织和机构资源的分散、封闭状况，在更大程度和范围内构建组织创新能力建设的环境。其次是实现创新的制度化，使创新成为大学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对创新能力建设的理性计划和持续性承诺。

具体而言，大学的创新能力建设包括能力的生成和应用两个方面。在大学创新能力生成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从治理的角度纠正各创新主体间的系统失灵，包括创新主体孤立、创新政策缺失以及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方面，在宏观层面上推进创新战略设计、创新政策制定，形成多组织、多主体、跨领域的创新模式，推进创新的制度化、网络化和组织化。大学作为创新能力建设的主体应根据自身办学特点与优势制定创新发展计划，在对外关系上保持组织发展的开放性，加强与政府、科研单位及企业等外部组织的联系，共同构建协同创新治理平台，提升组织创新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创新资源共享为核心，开展对外合作搭建联合研发创新平台，形成跨区域、跨组

织协同创新网络，促进组织间的创新战略协同和资源协同。“跨越边界创新是不变的重要催化剂。创造所谓的组织多孔性倾向于改善信息流动，简单地说，增加获取信息的通道，就能提高创新潜力。”<sup>[29]</sup>在大学组织内部则应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组织的建设，提升大学知识创新能力。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提升师生创新创业意识，并通过各类激励政策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大学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应该在独立决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和优先事项的基础上将自身行动导向实践。“高校几乎不可能被谋杀，高校多出于自杀。他们死亡是因为失去了时效，或没有去做这个世界想要做的事。”<sup>[30]</sup>大学治理应积极推动组织内部活动走向实践，通过创新创业中心、技术转移办公室等中介组织的设立以及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收益分配与利益协调、创新风险管理等制度建构，提升组织及个人产生有形产品并加以商业化的能力，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开发研究（创新成果商业化）的完整链条，消除大学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创新断层，建立一个更加高效、组织化的创新系统。

总之，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大学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们一方面面临极大的竞争性颠覆风险，另一方面又面临创新助燃下的复兴所带来的潜在机会”。<sup>[31]</sup>大学要不断获取和创生资源、优化组织结构和改善组织体制机制，致力于在变化的内外环境中使组织保持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大学的治理应指向为创新勾勒出适宜的组织环境，制定明确、长远的创新计划和确定优先重点发展领域，形成全新的创新机制，并在整个创新活动中有效开展组织创新能力评估，提高创新的计划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如果（大学）内部的拖延导致变革在受到来自更敏捷的新竞争对手压力或在外部规则制定后才出现，这将是高等教育的不幸。”<sup>[32]</sup>为免于制度失灵，大学的治理应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推进组织变革，从而使大学在构建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中体现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只有通过对创新的治理增强组织及其成员的创新主体意识，努力提升组织创新开放广度

（缩短创新资源搜索周期）和创新开放深度（利用创新资源数量和频率，注重隐性知识的挖掘），大学才能成长为“进化型组织”，懂得为未来而规划组织的发展，营造他组织和自组织特征协同的创新环境，并成为更智慧、更协作的创新的焦点，在适应中引领，由引领走向卓越。

## 参考文献

- [1] 宣勇. 大学能力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5):14-23.
- [2]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71-77.
- [3] 张永宏.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7.
- [4] 鲍威尔, 迪马吉奥.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 姚伟,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182.
- [5] 帕翠西亚·冈伯特. 高等教育社会学[M]. 朱志勇,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290.
- [6] 史蒂夫·C·柯拉尔, 埃德·弗朗汉姆. 有组织的创新:美国繁荣复兴之蓝图[M]. 陈劲, 尹西明, 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133.
- [7] 朱家德, 周湖勇. 大学有效治理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23.
- [8] 大卫·休谟. 道德原理探究[M]. 王淑芹,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54.
- [9] 张学文. 大学理性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84.
- [10] 眭依凡. 论大学的善治[J]. 江苏高教, 2014(6):15-21+26.
- [11] 劳伦斯·列恩, 罗比·沃特斯·罗比丘. 治理和组织有效性:政府绩效理论的视角[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6):121-126.
- [12] 弗兰西斯·福山. 什么是治理?[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6):19-27.
- [13]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李明轩, 邱如美, 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 [14] 艾伯特·N·林克, 唐纳德·S·西格尔, 迈克·赖特. 大学的技术转移与学术创业——芝加哥手册[M]. 赵中建, 等, 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101.

- [15] 张维迎. 大学的逻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5.
- [16] 史蒂夫·C·柯拉尔, 埃德·弗朗汉姆. 有组织的创新: 美国繁荣复兴之蓝图[M]. 陈劲, 尹西明,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107.
- [17] 弗雷德里克·莱卢. 重塑组织: 进化型组织的创建之道 [M]. 进化组织研习社,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7:325.
- [18] 霍尔登·索普, 巴克·戈尔茨坦. 创新引擎——21世纪的创业型大学[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123.
- [19] 张曙光, 蓝劲松. 大学战略管理基本模式述要[J]. 现代大学教育, 2006(4):32-36.
- [20] 克莱顿·M·克里斯塔森, 亨利·J·艾琳. 创新型大学——改变美国高等教育的基因[M]. 陈劲, 盛伟忠,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318.
- [21] 詹·法格博格. 牛津创新手册[M]. 柳卸林, 等, 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31.
- [22] 霍尔登·索普, 巴克·戈尔茨坦. 创新引擎——21世纪的创业型大学[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12.
- [23] 陈玉生, 张开云. “创新”逻辑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进程、模式及其有效性[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3):178-184.
- [24] 克莱顿·M·克里斯塔森, 亨利·J·艾琳. 创创新型大学——改变美国高等教育的基因[M]. 陈劲, 盛伟忠,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332.
- [25] 宣勇. 大学能力建设: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5):14-23.
- [26] 王志强, 杨庆梅. “创新驱动”过程中研究型大学的功能实现路径——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为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4):151-155.
- [27] 丁建洋. 筑波大学协同创新模式的逻辑建构及其运行机制[J]. 外国教育研究, 2015(12):47-56.
- [28] 彼得·德鲁克. 后资本主义社会[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189.
- [29] 史蒂夫·C·柯拉尔, 埃德·弗朗汉姆. 有组织的创新: 美国繁荣复兴之蓝图[M]. 陈劲, 尹西明,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89-90.
- [30] 克莱顿·M·克里斯塔森, 亨利·J·艾琳. 创创新型大学——改变美国高等教育的基因[M]. 陈劲, 盛伟忠,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288.
- [31] 克莱顿·M·克里斯塔森, 亨利·J·艾琳. 创创新型大学——改变美国高等教育的基因[M]. 陈劲, 盛伟忠,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3.
- [32] 克莱顿·M·克里斯塔森, 亨利·J·艾琳. 创创新型大学——改变美国高等教育的基因[M]. 陈劲, 盛伟忠,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26.

## Innovation Ability Building: A New Challenge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Wang Jianhua Huang Wenwu

**Abstract:** New institutionalism divides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into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environmental legality mechanism,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the efficiency mechanism of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involve both an environment that is institutionally regulated and an environment that is action-oriented. University governance practice needs to coordinate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legitimacy and efficiency. At this stage, university governance should shift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governance to stressing governance performance, by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ies to ensure and strengthen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achieve synergy between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The improvement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needs to focus on university capacity building, especially to promote university innovation. In practice, the key to promoting university innovation capacity building through effective governance lies in the concept and strategy of “innovation governance”.

**Keywords:** creativity; univers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novation governance

# 文化归谁所有？——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式中餐馆

刘海铭 王晓丹

**摘要：**作为华人社区及中华饮食文化的标志，遍布全美的中餐馆是美国餐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改良后的美式中餐虽广受美国本土消费者的青睐，却始终未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上阶层的餐饮市场，发展成为正规高端的餐饮场所。本文以美国著名美式中餐馆“华馆”（P.F. Chang's China Bistro）为例，追溯传统美式中餐馆的发展历程及其运营模式，发掘作为华人餐饮业新风尚的“华馆”经营理念的转型及成功的根源，以及“华馆”里程碑式的成功对于美国华人餐饮业主的“双刃剑”效应，进而探讨全球化语境下饮食文化究竟归属何方，人们应当如何应对饮食文化挑战。

**关键词：**中餐馆；主流社会；双刃剑；文化归属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65-06

## 一、引言

美国的中餐馆至21世纪初已多达40000余家，遍布全国，成为美国餐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两家中式连锁餐馆当属“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和“华馆”（P.F. Chang's China Bistro）。“熊猫快餐”属快餐行业，截至2014年已有1750家连锁店，而“华馆”作为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上市于华尔街纳斯达克的正规高端中餐馆，同年也已拥有210家分店。两家餐馆都致力于烹制正宗的中餐，但二者都主要迎合美国主流社会顾客的口味，店铺也并非处于或邻近华人聚居区。它们的兴盛不仅仅是一个餐饮故事，尤其是“华馆”，其成功堪称美国餐饮行业的里程碑，对于美国华人而言既是福祉也是挑战。笔者将探讨“华馆”在何种意义上是个巨大的成功，以及它如何引发人们对于饮食作为一种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解与思考。（而奉行另一种经营理念的熊猫快餐则应另当别论。）

## 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华人饮食业——“正宗的中餐也可以吃”

1968年上映的电影《六人一台戏》（*With Six You Get Eggroll*）<sup>①</sup>颇受美国大众欢迎。虽然此电影是一部关于一对再婚的中年白人夫妇和他们四个孩子的家庭喜剧，与华人完全无关，但片名却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中餐馆的普遍看法：“去学校接了孩子，就到当地唐人街点份二号中式特色套餐。”<sup>②</sup>所谓中式特色套餐一般包括一大份芙蓉蛋、杂碎<sup>③</sup>、蘑菇鸡片和蛋花汤。彼时，一家六口在中餐馆享用一顿正餐的费用不会超过15美元。因而对于一般美国家庭而言，出门吃中餐是实惠之选，中餐馆里的“杂碎”尤其是一道物美价廉的特色菜。

1962年，一位名叫江孙芸（Cecelia Chiang）的华人女性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都板街开了一家中餐馆。她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品尝过许多地道、有名的中国菜肴。江孙芸有意在美国开创正宗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后现代美国小说中的生态思想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2016J057）

**作者简介：**刘海铭，男，北京人，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t Pomona）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亚裔文化与移民学；王晓丹，女，河南商丘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的中餐品牌，她在菜单上列出300多道中餐菜品，包括铁板锅巴汤、樟茶鸭、叫花鸡和蒙古羊肉等。然而，惨淡经营了一年半，江家中餐馆一直门可罗雀，不断亏损而濒临破产。旧金山唐人街著名餐馆“康家饭店”（Kan's Restaurant）的创始人康约翰（Johnny Kan）曾善意地提醒江孙芸：“改变你们的烹饪风格吧。美国人就喜欢吃杂碎，没人听说过什么是锅贴。”江孙芸的姐姐甚至建议她干脆关掉餐馆。<sup>④</sup>在20世纪60年代，江孙芸可能是旧金山第一位做正宗中国菜的餐饮业主，<sup>⑤</sup>但美国本土消费者和外地游客并不知晓何为正宗的中餐，几十年来，他们千篇一律习惯于杂碎、炒面和芙蓉蛋。

正当江孙芸几近绝望之时，普利策奖得主、《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专栏作家赫布·凯恩（Herb Caen）无意间路过她的餐馆并进店品尝。几天后，凯恩在作品中提到他在一家中餐馆吃到最正宗的中餐这一经历。随之而来的是，江孙芸接到了数百个订餐电话，生意一夜之间兴隆起来。八年后，这家中餐馆从旧金山唐人街迁至吉拉德里广场（Ghirardelli Square），并发展为拥有三百个座席的高端餐厅。开业典礼当日，单价高达250美元的宴会座席全部售罄。<sup>⑥</sup>在美国，从未有过任何一家中餐馆曾有如此之高的收费标准。江家中餐馆的黄金时代至此拉开序幕。商人、名流、游客和中产阶级家庭都慕名前来品尝江孙芸家的正宗中餐。

然而，江孙芸的成功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故事。她的中餐是在凯恩的支持和宣传下才获得美国主流社会消费者的认可，而过去萧条的生意显然不是风味或烹饪的问题。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顾客只有在美国主流饮食专家和文化批评家的推荐下才愿意走进一家中餐馆，相信“正宗的中餐也可以吃”。

1975年，江孙芸在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开设了另一家中餐馆，她的儿子江小帆（Philip Chiang）开始接管生意。江小帆在尝试开创正宗中餐时也遭遇美国顾客的类似排斥。当他不再使用番茄酱并减少淀粉的用量，将咕咾肉这道大卖的菜品改良为更为正宗的中餐风味时，他的老顾客开始恐慌并打电话向他抱怨：“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喜欢原来的味道！”当他把食材中的西式花椰菜换成传统的中国芥蓝，或者把四季豆换成豇豆时，顾客们也会抓住他抗议并提醒道：“你是一家中餐馆，对吧？你就应该卖炒面。”<sup>⑦</sup>

可以说，江小帆在尝试烹制正宗中餐的过程中付出了诸多注定失败的努力。低成本的美式中餐已经为美国顾客的口味及其对中餐馆的期望定型。1988年，他的餐馆在一场大火中烧毁。在重建后的餐馆里，他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设计了一个面向主餐厅的开放式厨房。如此一来，顾客可以亲眼看到厨师从烤箱里取出北京烤鸭，甚至可以看到烤得酥脆可口的棕色鸭皮。江小帆说：“这就像从零开始，像开了一家新餐馆一样。”<sup>⑧</sup>

### 三、商机、餐饮文化与美国标准

尽管江小帆天资聪颖，并锲而不舍地钻研正宗中餐的烹制及销路，但在成为“华馆”的合伙人之前，他始终无法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中餐馆的形象。“华馆”是由美国白人保罗·弗莱明（Paul Fleming）所创立，他曾经营了四家“茹丝葵”连锁牛排馆（Ruth's Chris Steak House），<sup>⑨</sup>而从牛排餐厅到中餐馆不啻为一个相当大的商业转向。在一次去洛杉矶的途中，弗莱明曾在江小帆比弗利山庄的一家分店用餐，对其菜品赞不绝口。1993年，弗莱明在亚利桑那州斯科特斯戴尔（Scottsdale）的时尚购物广场创建了自己的第一家“华馆”，并邀请江小帆做他的合伙人，<sup>⑩</sup>希望打造一家供应正宗中餐的高端餐厅。这家餐馆被命名为“P. F. Chang's China Bistro”，其中“P. F.”代表保罗·弗莱明，而“Chang”代表江小帆。江小帆有意将其姓氏“Chiang”改为“Chang”，使餐馆的名字多了一份华人新风尚的气息，也体现了其摒弃传统美式中餐、立志烹制正宗中餐的决心。他的母亲江孙芸和中餐食谱作家芭芭拉·特罗普（Barbara Tropp）共同为“华馆”设计了菜单。特罗普是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兼餐饮业主，出版过著作《中餐烹饪的现代艺术》，并曾获著名的查尔德国际食谱奖（Julia Child Award for Best International Cookbook）。<sup>⑪</sup>

“华馆”进军中餐馆市场恰逢其时。20世纪

80年代，美国少数族裔餐馆仅占全国所有餐馆的10%，且大多位于美国东北部和西海岸。而中餐馆业务占少数族裔餐馆总额的30%，再加上意大利餐馆和墨西哥餐馆三者共代表了少数族裔餐饮业全部的70%。<sup>[1]</sup>以纽约市为例，1958年共有304家中餐馆，1988年便增长至近800家。<sup>[2]</sup>随着大批华人新移民来美，美国大都市的中餐馆也随之兴旺发达，但仍未出现一家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口味的正规高端餐厅。正如一位餐饮业高管于1996年评论道：“在整个美国餐饮业，我们没有看到中餐馆独立的一席之地，而仅是独立运营而已。这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sup>[3]</sup>而“华馆”则正是针对美国主流社会中产阶级这一客户群开拓市场。

餐饮文化是有阶级之分的，不同阶层的顾客往往不会光顾同一类餐厅。传统的中餐馆通常聚集在唐人街和华人聚居区，如洛杉矶近郊的圣盖博谷（San Gabriel Valley）或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Flushing）。这些餐馆供应各式正宗的中国菜，包括粤菜、湘菜、川菜或沪菜，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较大、装修考究的店铺。但中餐馆的经营策略是尽可能多地吸引顾客。菜单上的菜品既有1.5美元的点心，也有75美元的鱼翅，甚至100美元的燕窝。由于一顿晚餐的价格从每道菜品50美分到50美元不等，这些中餐馆实际上瞄准了所有的社会阶层，最终导致其沦为一个仅供解决吃饭问题的场所。

“华馆”始终在努力规避中餐馆的一些常见问题，菜品不油腻，也不味重，严禁使用味精，保证每日食材的新鲜。“包括所有肉类、海鲜和家禽。蔬菜每天都是手工切的。每一个饺子，每一个春卷，都是手工制作。我们可能每天都要用到40种不同的酱汁，而且每天都会再新调制出一种。”<sup>[4]</sup>作为一家连锁餐厅，“华馆”的规模从4500平方英尺到8000平方英尺不等，可容纳210~225名顾客，有些分店还提供露天台座，厨房也全部是开放和标准化的。正如“华馆”的一位高管所说：“我们不必费力研究如何运作这家餐馆，因为所有连锁店的规划与设施都是整齐划一的。”<sup>[5]</sup>

尽管弗莱明清楚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餐馆业在洛杉矶近郊的圣盖博谷及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蓬勃发展的势头，但他坚持认为只有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的中餐馆才符合美国主流社会消费者的标  
准。<sup>[6]</sup>他预见到为高端主流社会消费者量身打造才将是中餐馆的商机，而这种商机则是那些小型、独立、家庭式的中餐馆无法企及的。他认为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也许能够接受并喜欢正宗的中餐，但不会把中餐馆当作社交晚餐的理想之所。因此在他的设想中，“华馆”应该与美国其他本土连锁餐厅一样，成为目标消费者锁定为美国中上层主流社会的饮食场所。

#### 四、华人餐饮新风尚——“华馆”

“华馆”是美国餐饮业的一个新风尚。1996年《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弗莱明位于洛杉矶近郊的尔湾“华馆”分店：“这个地方简直令人惊叹。主餐厅和拉斯维加斯的表演厅一样大，有拼花地板，还有立于基座上的西安兵马俑仿制品……这个地方的灵感来源于正宗的中餐和精致的西餐厅之巧妙融合。”<sup>[3]</sup>虽然每家“华馆”分店的外观和内部设计都有所不同，但没有一家和唐人街的传统中餐馆相似。门口没有摆设许多中餐馆特有的财神、菩萨像，时尚的室内装饰以描绘中国古代山水的手绘壁画和展示唐朝及明朝市井生活的雕塑为主。同时，硬木家具和石材地板又给人一种现代感。这种风格的餐馆营造出舒适的就餐环境，不断招揽美国主流社会的回头客。

“华馆”以中国五大区域菜系为招牌菜品，包括粤菜、湘菜、鲁菜、淮扬菜和川菜。由于早期华人移民多来自广东，粤菜最初在美国的影响力远超其他菜系。20世纪70年代，台湾移民所带来的湘菜也颇受欢迎。但蒙古羊肉也一直是中餐馆的特色菜品。以上这些闻名遐迩的地方菜肴都囊括在“华馆”的菜单中。“华馆”首席厨师长保罗·穆勒（Paul Muller）说：“我们在烹制这些菜品时一直尽可能地接近中国的传统做法。”事实上，穆勒最初也曾尝试过改良传统的中国菜，使其更符合美国顾客的口味。但后来他决定尽可能地按照他在[中国](#)看到和学到的技艺来烹饪食物，不会为了迎合顾客口味而彻底改变这些菜品的食材、风味或配菜。每当“华馆”新开一家分店时，穆勒留意到顾客们

都会有诸如“这太咸了”或“这太油腻了”等评价。<sup>⑯</sup>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光顾。

事实上，“华馆”菜单上的传统地方菜系在其他中餐馆随处可见。但唯独只有它成了美国中餐馆的成功典范，并在得到凯恩的推荐后广受美国主流社会消费者的好评。“华馆”进军餐饮行业后，全美的主流社会消费者都逐渐开始接受正宗的中餐。这证明，原汁原味的中国菜肴在美国照样会被接纳甚至受到欢迎。然而，前提是只有在美国主流社会拥有和运营下的中餐馆才能成功，这对于华人餐饮业而言，不啻为苦乐参半的现实。

“华馆”作为一家供应正宗中餐的正规高端全美连锁餐厅，代表了美国中餐行业的新形象。此前供应杂碎的中餐馆已成为美国化的快餐店，而非美国消费者享用正餐和社交的场所。“华馆”的出现扭转了形势，和美国大多数正规高端餐厅一样，已成为社交聚会、商务午餐、晚餐活动、周末度假或浪漫约会的理想之所。

但要清醒地意识到，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华馆”并非华人种族或华人社区之象征，而仅是一家烹制中国风味食品并将其作为商品加以出售的美国饮食经营机构。在“华馆”的经营理念中，正宗的中餐风味是他们的文化资本。饮食是文化，代表一个种族。在美国这个只讲价值与利益的商业世界里，“华馆”开创的并非某一类中国食品，而是美国商业文化的概念。在全球化语境之背景下，餐饮与食品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同时也冲淡了族裔与文化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裔美国人约罗·鲍鲁奇（Jeno Paulucci）将冷冻杂碎注册专利，供应于其遍布全美的连锁餐厅“重庆菜馆”（Chun King）。此连锁餐厅于1967年以6700万美元的价格被新加坡的一家公司收购。另一例为，“加州披萨饼厨房”这一当今流行连锁餐厅的代表并非由专门烹饪披萨饼的厨师所创建，而是源于两位律师。换言之，尽管美国的商业文化无法复制中华民族的族裔性，但它可以并且已经创造了能够代表华裔的饮食概念。“华馆”现象所体现的并非某一款新型食品，而是一种新的美国餐饮经营理念。

## 五、对于华人而言的“双刃剑”

1996年，“华馆”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即回购了原先由他人管理和部分拥有的所有店铺，聘用由理查德·费德里科（Richard Federico）担任总裁、罗伯特·维维安（Robert Vivian）担任首席财务官的管理团队，并在丹佛、拉斯维加斯和休斯敦开设新店。1998年，当“华馆”拥有10家分店时，它以每股12美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上市融资，至2000年3月已飙升至每股32.75美元，连锁店发展至39家，另有13家正在建设中。<sup>⑰</sup>同时，“华馆”以每年13到15家新店的速度不断扩张，截至2014年12月已在全美运营共210家正规高端餐厅和200家休闲快餐厅，并计划在其他22个国家继续开设分店。<sup>[4]</sup>

在美国餐饮业史上，“华馆”是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华尔街纳斯达克上市的中餐馆，其菜品接近于“橄榄园”“加州披萨饼厨房”或“奶酪蛋糕房”的菜品价位。作为一家拥有众多标准化连锁店的上市公司，“华馆”已成供应正宗中餐的美国高端餐饮市场的一部分，成为历史上美国中餐馆发展的里程碑。

然而，“华馆”的成功对美国华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华馆”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开始了解接触正宗的中餐。虽然美国主流社会消费者在用正餐时一般不会光顾独立、小型、家庭经营的中餐馆，但像“华馆”这样的正宗高端中餐馆已被广泛接受。这一成就往往只有大型的主流美国企业才能实现。作为餐饮业的赢家，“华馆”拥有丰厚的财力资源为消费者提供时尚而舒适的就餐环境，吸引中青年成功人士及中产阶级家庭前来用餐。这是美国历史上所有华人餐饮业主从未实现过的梦想。

## 六、文化归谁所有？

“华馆”现象给美国华人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文化到底归谁所有？<sup>⑱</sup>餐饮一直是美国华人社区最重要的商业基石，中餐已是华人身份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华人餐饮业主致力于打入美国餐饮市场，而真正进入市场的却只是杂碎、芙蓉蛋或其

他已被美国化的中餐，正宗中餐在美国主流社会并无一席之地。个别中餐馆，如江孙芸的餐馆，确实在当地取得了成功，但只有“华馆”作为一家餐饮公司有实力和能力让正宗的中餐进入美国正规高端餐饮市场，被主流社会消费者认可并接受。反言之，在美国餐饮市场的一隅，中华餐饮文化真正的代言人未必是华人餐饮业主，而是美国的主流社会。

饮食文化通常被视为社区或民族的软实力。文化似乎是可遗传或原始即有的。而事实上，餐饮市场是一个“公共领域”，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人、机构或商业组织都可以接触或拥有。一种饮食文化并不一定只属于其创始人。在美国主流餐饮市场供应正宗的中餐，并不需要一定和华人群体有种族关系或内在联系。饮食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商品。当饮食转为商品时，它就不再是可继承的，而成为可由美国商业社会轻而易举地从华人社区中获得的文化。如今，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挑战？面对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应对？<sup>⑩</sup>

## 注释

- ① 影片名根据内容可直译为《免费春卷》。春卷为美国中餐馆热卖的传统中国小吃。
- ② Linda Loi. So We Don't End Up Like Chop Suey: Searching for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n L.A. [2019-04-12] <http://www.sscnet.ucla.edu/aasc/classweb/fa1197/M163/loi5.html>.
- ③ 杂碎(Chop suey)源于粤语，由美国中餐馆的一道常见菜品名音译而来，因19世纪李鸿章访美而风行全美。现常用来代表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文化杂糅现象。
- ④ (2019-03-15) [http://www.asianpacifcifund.org/awards/bio\\_chiang.shtml](http://www.asianpacifcifund.org/awards/bio_chiang.shtml).
- ⑤ 康约翰(Johnny Kan)自己也曾试图一改中餐馆廉价、方便的餐馆形象，因此他的“康家饭店”(Kan's Restaurant)是一个针对像赫布·凯恩(Herb Caen)一样的名人或国外游客的高端餐饮场所。作为一位美国土生华裔，康约翰所开创的“康家饭店”以粤菜为主，但其菜肴的口味大都已被美国化。有学者认为，“康家饭店”应为第一家推出正宗中国菜的中餐馆。参见Madeline Y. Hsu. “From Chop

Suey to Mandarin Cuisine: Fine Dining and the Refashioning of Chinese Ethnicity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Culture. ed. Sucheng Chan and Madeline Yuan Yin Hsu.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3 - 193.

- ⑥ 同上。
- ⑦ Linda Loi. So We Don't End Up Like Chop Suey. 同上。
- ⑧ 同上。
- ⑨ “茹丝葵”牛排馆(Ruth's Chris Steak House)，美国顶级牛排品牌餐厅，1965年创立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30余家分店。
- ⑩ Joel Kotkin. Will Chinese Food Go the Way of Pizza? New York Times. 2000 (3).
- ⑪ Barbara Tropp. The Modern Art of Chinese Cooking Techniques and Recip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2.
- ⑫ Cynthia Mines. Chinese Chain: Steaming with Success. 2000 (5). [2019-2-20] [http://retailtrafficmag.com/mag/retail\\_chinese\\_chain\\_steamming](http://retailtrafficmag.com/mag/retail_chinese_chain_steamming).
- ⑬ 同上。
- ⑭ 同上。
- ⑮ Kotkin. Will Chinese Food Go the Way of Pizza?
- ⑯ Bret Thorn. Paul Muller: Creating a Stir and Frying Up a Storm at P.F. Chang's China Bistro. Nation's Restaurant News. 2003 (1). [2018-12-5]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3190/is\\_4\\_37/ai\\_97314555/pg\\_1](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3190/is_4_37/ai_97314555/pg_1).
- ⑰ Kotkin. Will Chinese Food Go the Way of Pizza?
- ⑱ 有关文化所有权的理论讨论，参见Susan Scafidi. Who Owns Culture? Appropri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American Law.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09-9-12] [www.pfcb.com](http://www.pfcb.com)
- ⑲ 参见“墨西哥华人中餐厅之连锁店调查”(陈勇，《从高端连锁店到快餐摊位》)。陈勇指出：“26年前创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华馆’，如今已在21个国家开设220家连锁店(见Sheila Sanchez Fermin, “Fundador de P. F. Chang's: ‘Méjico Fue el Lugar Correcto Para Internationalizarnos’ ”. Expansion. 2017 (10). [2017-10-25] <https://expansion.mx/>

empresas/2017/10/25/fundador-de-pf-changs-mexico-fue-el-lugar-correcto-para-internacionalizarnos)。

“华馆”的第一家海外连锁店建于2009年墨西哥城的一个商业区(见“美国中餐打进墨西哥”，《羊城晚报》，2010 (1). [2018-2-18] <http://news.sina.com.cn/o/2010-01-02/154516869540s.shtml>)。截至2017年，墨西哥共有25家“华馆”分店(见Sheila Sanchez Fermin, “Fundador de P. F. Chang’s”)，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墨西哥首都。事实上，“华馆”已将墨西哥作为其第二大市场，并计划开设至少30家分店。

## 参考文献

- [1] Donna Gabaccia. We Are What We Eat: Ethnic Food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8.
- [2] Min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5.
- [3] Max Jacobson. P. F. Chang’s Explores New Dimensions but Stays Flat in Places[J]. Los Angeles Times. 1996 (3).
- [4] Company Information: P. F. Chang’s China Bistro, Inc[J]. New York Times. 2009 (9). [2018-10-16] [www.pfcb.com](http://www.pfcb.com).

# Who Owns the Culture? —— Chinese Restaurants in America in the Global Context

Liu Haiming Wang Xiaodan

**Abstract:** As a symb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ese food culture, Chinese restaurant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atering market in America. However, popular as they are with local consumers, the American-style Chinese restaurants have never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upper and middle class catering market in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or evolved into formal and high-end catering places. Taking “P.F. Chang’s China Bistro”, a well-known Chinese restaurant in Americ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estaurants in America,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success as a new fashion of American-style Chinese restaurants along with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n their owners, and further discusses who owns such Chinese food culture in the global context as well as how people should confront the subsequent challenges.

**keywords:** chinese restaurants; mainstream society; double-edged sword; cultural ownership

# 当前中美关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林宏宇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当前的中美关系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清楚。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量。受其影响，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呈现“抗变”状态。我们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及其复杂性、长期性，同时，要相信中国人的理性与智慧，冷静看待并积极引导当前中美关系。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格局；中美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71-08

## 一、引言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被许多美国学者视为新一轮世界权力过渡过程中正在崛起的挑战者。<sup>①</sup>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机遇还是威胁，美国是应与中国接触还是对撞，这些问题曾一度引起关注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的很大争论。<sup>②</sup>但在今天看来，这场争论似乎已经结束，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威胁。例如，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声称，“中国重返大国地位，或许是21世纪美外交面临的最关键挑战”<sup>[1]</sup>。同样，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美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不少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到1972年以来的最困难时期，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来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sup>[2]</sup>。

但笔者认为，这些中美学者有关当前中美关系

的判断不尽全面，个别甚至有些短视与偏激，因为它们缺乏一个战略背景的比衬，这个战略背景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高层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因素及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与以往的中美关系状况相比，出现了很多为我们所不熟悉、很不容易理解的情况。因此，要想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须了解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所发生的诸多变化；同样，当前中美关系也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

## 二、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年）：“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

**作者简介：**林宏宇，男，福建福州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研究方向为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国际安全问题。

(邓小平语)<sup>[3]</sup>；第二阶段（1989—2000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但一个也没有解决好”（邓小平语）<sup>[4]</sup>；第三阶段（2001—2016年）：中国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第四阶段（2017年至今）：“放眼世界，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语）<sup>[5]</sup>。可以说，前三个判断强调更多的是机遇与希望，而第四个判断更强调挑战与不确定性；前三个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战略判断，而第四个则是一种相对动态的战略判断。

笔者认为，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点在于“变”字，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我们未曾遇到的“变数”：一、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与逆流；二、狭隘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不少西方国家中盛行，全球治理面临空前的严峻挑战；三、大国博弈烈度有所加剧，大国权力政治、强权凌行径呈凸显趋势。

纵观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它有时快，有时慢，有时顺利，有时曲折。全球化进程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周期，另一个是国际社会“主导国”（指对国际关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作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遭遇空前的挑战。之所以说是空前的挑战，是因为这轮挑战来自上述2个因素的叠加。无论是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还是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作用来看，当今全球化进程都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点<sup>[6]</sup>。持续近百年的全球化进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挑战，同时，全球治理也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危机。

随着反全球化逆流的进一步泛滥，部分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受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各国纷纷以狭隘的本国利益为优先选项，置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全球治理问题于不顾（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不愿多参与国际合作，频频“退群”；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置欧洲一体化进程于不顾，脱离欧盟；法国国内右翼势力活动上升，“黄马甲”运动猖獗；意大利右翼势力大涨，“五星运动”兴盛等）。此外，个别西方大国依然抱有冷战对抗与权力政治思维，

动辄以经济制裁、关税武器，甚至武力要挟相威胁，由此导致大国之间的博弈烈度有所加剧，强权政治与大国霸凌行径时有发生。

换言之，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因为有三个重要变量。变量一：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变了，变得让我们很陌生，很无奈，也很失望；变量二：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变了，变得让我们很不适应，很不易理解；变量三：当今世界极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变了，所出现的反全球化逆流与全球治理赤字变得让我们很震惊，也很揪心。

### 三、特朗普因素：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近年来美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中国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极大的美国因素。独特的“特朗普效应”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可从个人个性、机构特性、执政环境等3个维度来看。

首先，从个人个性维度来看，有4个特点：

1.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出身平民商人（Businessman）的美国总统，这不仅创造了美国历史，而且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深远。1787年美国宪法生效以来，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已先后产生了43位总统。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34人）出身民选“公务员”——副总统（14人）、州长（11人）、参议员（7人）、众议员（2人）；其余9人来自内阁部长或高级将领（3个国务卿、2个战争部长、1个商务部长、3个陆军将军）。这些人都是美国传统政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都谙熟美国政治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公职经历、执政经验与外交经历，是美国总统的正常候选人，他们中的任何人当选美国总统，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但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则打破了这个200多年的老传统。如果说2008年奥巴马当选是一个历史的突

破，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则是更大的突破。因为奥巴马的当选仅是突破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种族平等（如果2016年希拉里当选也是一样），而特朗普的当选则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突破。奥巴马虽然是黑人，但他依然属于美国政治精英的范畴，出身于传统的主流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但特朗普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主流”的平民商人出身的“三无”总统——无从政经验、无公职经历、无外交经历。

2. 特朗普特殊的“三无”背景决定了他独特的执政特点：“既幼稚无知（无畏），又老谋深算（顽固）”，近年来美国内政外交的很多变数与不确定性都是受此影响的结果。所谓的“幼稚无知”

（无畏），是指他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民主文化，对治国理政的权术缺乏经验。无知自然就无畏，自然就没有太多的政治顾忌，就可能做任何出人意料的决定。例如，违背中美关系基本原则，居然以当选总统身份给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不顾各方争议，坚决发布“禁穆”令；以非正常方式罢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吉姆·科米与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不顾国际社会压力，频频退出多个多边国际合作组织（条约）；不顾阿拉伯世界反对，执意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搬迁大使馆；为创造历史，未与其外交安全团队充分沟通，就完全颠覆“以压促变”的一贯立场，主动发起与金正恩的首脑会晤；为了兑现竞选时的“修墙”承诺，不惜贸然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等。这些举措是任何一位“正常”的美国总统都不会做的。因此，我们不能以其前任的正常所为来推断特朗普的治国理政之术。而所谓的“老谋深算”（顽固），是指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老龄总统”，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成形了。入主白宫之前，他就已有很“顽固”的世界观与政绩观。据说，特朗普的行政领导观念形成于他在纽约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地产开发商同民主党政客们打交道的经历<sup>③</sup>。他的很多政治用语与思维方式都是20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他对美国内政外交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度”看法与“明智”判断，对很多政策举措都有自己的顽固执着。

3. 个性张扬、好出风头、痴迷自媒体。入主白宫之前，特朗普曾告诉其高级助理，要把当

总统的每一天都看作他当年主持综艺节目的每一集，不断碾压对手<sup>④</sup>。其个性之张扬，从中可见一斑。另外，可以说特朗普是靠自媒体——“推特”（Twitter）赢得2016年大选的，当选后的特朗普依然痴迷“推特”，依赖“推特”来宣扬其执政理念。特朗普对“推特”的痴迷，也使其决策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许多美国学者看到这一点，例如，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道：“特朗普是推特执政，每天靠手机治国，在白宫的一年半时间里，做了2601个错误的或者不明智的决定，每天平均超过6.5个。”<sup>⑤</sup>

4. 作为美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特朗普创造了很多商业神话。在他眼中，什么都是“生意”或“交易”（deal），在他的日常用语中，Deal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做交易，做大交易”（Make Deal, make a big deal）是他的基本处世哲学。因此，出于商人的本性，“两面下注”“极限施压”“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等成为特朗普执政的常态。

其次，从机构特性维度来看，除了上述个性特点外，特朗普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汇聚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特点。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有3个特点：“退出”“逞强”与“单边”。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同时兼具这3个特点，而且还有所“发扬光大”，并形成其“特式风格”。所谓“特式风格”的退出，是指不仅退出经济贸易协定等务实性的国际合作，而且还退出像《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人权组织等涉及国际政治正确性与大国声誉形象的国际合作，仅从狭隘的“美国优先”出发，只要眼前有利可图的，不要长远有名望和有声誉的。所谓“特式风格”的逞强，是指特朗普非常强调军人的作用。在其内阁成员中大量使用军人或有军方背景的官员。所谓“特式风格”的单边，是指特朗普极端强调以美国利益为重。不论对手国是谁，只要涉及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一律不顾对方关注与诉求，依靠美国霸权优势，实施单边制裁或行动。<sup>⑥</sup>

再次，从执政环境维度来看，特朗普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突破了近半个多世纪来美国民主党

施加在共和党总统身上的“捆脚”魔咒，赢得了相对较好的执政氛围。根据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美国总统的执政环境分为3种形态：一、“快脚期”，即国会两院被同一个政党控制，且与总统同属一个政党，这时总统的执政环境最好，因此在行政议程上可以快步走。二、“跛脚期”，即国会两院分属于2个政党控制，这对总统的行政议程构成钳制，总统只能谨慎小心行走。三、“捆脚期”，即国会两院被同一个政党控制，但与总统不属于一个政党，国会对总统形成强大的反制，总统在行政议程上步履艰难，如有不妥，甚至面临弹劾的危险（例如尼克松、克林顿）。

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政治进程来看，可以发现共和党总统是不好当的，往往难逃民主党施加的“捆脚”魔咒。具体来说，58%的共和党总统执政环境处于“捆脚期”，如果加上21%的“跛脚期”，共和党总统就有79%的时间是处于民主党国会的控制或影响下。例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都被“捆住”6年，老布什被“捆住”4年，福特、里根、小布什各被“捆住”2年。而特朗普打破了这个魔咒，他至少已有2年的“快脚期”，现在虽处于“跛脚期”，但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美国共和党已出现了明显的“特朗普化”，原先不被共和党精英建制派看好的特朗普，成了共和党州长和议员赢取选票的“香饽饽”，而且2018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还赢得了过半数的州，这大大加强了特朗普的执政基础与施政影响力。减税法案的顺利通过与美联储10年来的首次降息，都证明了特朗普的强大执政影响力。

#### 四、不断升级的“贸易抗变关系”： 当前中美关系的走向

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特朗普因素的影响，当前中美关系所呈现出的动荡与“多变”，是中美建交以来我们所不熟悉与不易理解的。要想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先简要回顾一下近十年来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变化。

近十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态势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美先中赶”阶段：2008年以前。2008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之前两国关系的战略态势是中国在追赶，美国在领跑，而且距离拉得很大，但中国追赶的速度也很快。以GDP为例，1980年的中国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1996年翻了一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2003年又翻了一番，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世界经济，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被加快”，到2010年中国的GDP又翻了一番，超过日本，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对华的担忧也日益增长，如果说2008年以前美国谈“中国威胁论”还是言不由衷的话，那么2008年以后就是切肤之痛了。

“美攻中守”阶段：2009—2013年。2009年打着“变革”（Change）旗号上台的奥巴马总统试图开启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打破以往“先抑后扬”的节奏。但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周期的“时间差”，加之其外交团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偏见，奥巴马对华战略发生了较大转向，开始以“巧实力”“重返亚太”为抓手，对华实行新一轮的“围堵”与“遏制”，利用中日矛盾、朝韩危机、南海争端等因素，发起对华外交的战略攻势，使得中国周边烽烟四起，不得安宁。同样，也由于两国政治周期的“时间差”影响，2012年习近平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未能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从战略态势上看，这个阶段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

“中攻美守”阶段：2014—2016年。为了避免在狭窄的东亚地区与美国迎头相撞，中国进行了战略调整，从海洋为主转向海陆并重，从战略东向转到战略西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美攻中守的战略态势，中国在广阔的西面天地找到了大国作为的空间，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顺利推出，习近平主席成功访英，中欧关系取得良好发展，中俄关系也进一步紧密；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拉近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距离，并进一步打消了欧洲老牌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2014年APEC北京峰会，2015年IMF人民币“入

篮”，2016年G20杭州峰会，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个阶段中方显然处于攻势。<sup>⑦</sup>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入主白宫，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数与不确定性。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上台的特朗普总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非主流”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伊始，并未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简单兑现其竞选口号——把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这是因为2017年中国的主动、务实外交（4月份首次“习特会”以及同年11月特朗普创纪录的对华国事访问），积极影响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但随着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基本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对中美经贸关系数据的掌握，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自然就把对华政策的重点聚焦在中美关系的老问题——不平衡的经贸关系上，因为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整个对外贸易逆差的70%。

所以，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特朗普，在2017年短暂的对华“不作为”后，从2018年1月开始在对华贸易关系方面“有所作为”了，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种“贸易抗变关系”状态。所谓的“贸易抗变关系”是指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不断升级的对抗关系。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抗变关系可分为3个回合：第一回合，2018年1—7月，美方无理施压，中方高调反击，双方对抗关系不断升级；第二回合，2018年8月—2019年4月，尽管抗变关系逐步升级，但中方开始务实调整，美方也做相应让步，双方朝达成协议迈进一步；第三回合，2019年5月至今，美方突变，极限施压，中方稳步对抗。

2018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铝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开启了中美贸易抗变关系的第一回合。该回合上半段的对抗还是以口头为主，未落实锤，曾还有回旋的余地，但从5月下旬开始，特朗普变卦，表示仍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并于6月15日正式发布首批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清单。同日，中国发布公告，决定对等规模征税。6月19日，美方继续施压，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中国依然强硬回应，中国商务部高调宣布，如果美方失去

理性，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反制。这时双方开始小步实质对抗，已无法正常谈判对话了。

2018年8月下旬开始进入第二回合。尽管美方在这个回合的施压逐步升级，中方依然惯性强烈应对，但立场有所软化，开始寻找除了“对抗”之外的其他务实途径。其中，9月24日中国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可视为中美贸易抗变关系发生转圜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中方开始正式摆脱简单对抗思维，寻找务实合作解决方案。中方的理性与务实的态度，加上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亟须稳定国内市场与美国经济的特朗普，也开始做出相应让步。双方相向而行，终于12月在阿根廷G20峰会上，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决定推迟“摊牌”时间，开始务实谈判。从2019年1月下旬开始，双方的工作团队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朝达成协议的方向迈进一步。

2019年5月初开始，中美“抗变关系”进入第三回合。这一回合双方对抗进一步升级，且对抗性质有所改变。这一回合依然始于特朗普的突然变卦，决定继续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同时决定对中国华为公司进行实体制裁，企图以行政干预手段封杀华为。此举中断了之前中美之间达成的贸易协作意向，再次升级中美贸易抗变关系，且有可能出现政治化与扩大的趋势。6月底在大阪召开的G20峰会为中美两国走出对抗提供了机会。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如期会晤，并达成若干重要共识。这是一场双方都很需要的重要会晤。从美方来看，特朗普需要它来提升其连任竞选的国内选情。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来看，为了增加党内出线的概率，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往往会提前宣布竞选（多在大选年前一年6月30日以前），这无形中给特朗普以巨大的压力。在民主党候选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特朗普也不得不提前宣布开始连任竞选。而美国经济形势的好坏将直接决定特朗普的胜选概率，特朗普贸然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已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所以当特朗普主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确认大阪会晤时，美国内外股市就应声大涨。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巨大

影响。同时，从中国来看，中国也需要这次会晤来稳定波动中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并不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大局，但它却可能恶化中美关系的氛围，加剧中美之间的对抗，激化中美关系之间其他敏感的核心问题。所以，中国也希望借助这次会晤来增信释疑，寻求摩擦解决机制。尽管这次会晤达成了不少积极的成果，但此次会晤的“发酵酝酿期”还不够长，不如2018年阿根廷会晤那么充分，中美之间依然存在不少摩擦变数。7月底8月初，中美抗变关系又生变数。就在中美工作团队在上海举行了美方称为“富有建设性”会谈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宣布继续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要对余下的3000亿中国商品征税，同时，美国财政部也把中国定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对此无理施压，中方于8月23日宣布新的反制措施。中美抗变关系又走到一个新的升级点。

## 五、如何看中美的“抗变关系”

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感知就像过山车似的跌入低谷。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不少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到1979年以来的最困难时期。笔者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的片面感知，是过分夸大了当前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实际上，所谓的中美“贸易战”，是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准绳，单边抛弃“国际政治正确性”，强调“无条件的对等”与“绝对的贸易自由”，试图突破全球化规则对“美国的束缚”，以挽救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对外政策举措；同时，也是兑现其竞选承诺，满足国内部分利益集团与选民需要，赢取连任支持的选举政治举措而已。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与地区，只不过对中国表现得更严厉、更高调些。<sup>[7]</sup>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个短视的政策举措，损人不利己，缺乏后劲。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个复杂的结构问题，是长时间来历史自然形成的，有一定的合理性。特朗普仅看到其表面的不平衡，而想在短时间内简单地以关税为武器来解决。这显然

是一种短视的政策行为，其负面影响极大，它不仅损害中国的对美贸易，也让美国自身受害匪浅。如果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弹性较小的消费品）征税，那么美国的家庭和厂商将承担更高的税后价格。一旦通胀率明显上升，美联储将可能收紧银根，这对目前估值很高的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来说，将是一个灾难。因此，可以判断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缺乏后劲，没有前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核心认知在于他把美国制造业过去20年失业率的上升怪罪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其实这是一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低级错误认知。实际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主要来自机械自动化对于人力的取代，而非贸易不平衡，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个趋势还将加强。因此，就算是美国降低贸易赤字，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会持续减少。

警惕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化、扩大化与非理性的倾向。近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公司列入实体制裁名单之后，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政治化、扩大的危险倾向。另外，近期中国的反制措施对美国股市产生重大影响，恼怒的特朗普试图以1977年通过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法案来强行切断中美经贸关系，这显然是一种非理性的“胡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可以说，美国以国家力量对一个全球化的实业公司进行打压，以总统行政权力肆意干涉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这已不是特朗普所标榜的以追求“国际贸易平衡”的初衷，这是在粗暴切割早已相互依存的全球生产链与供应链结构，以及全球协作体系。特朗普这种简单粗暴的落后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其“筑墙”思维在国际贸易中体现。如果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形成气候，将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全球化模式的终结，狭隘的民族国家之间恶性竞争的潘多拉匣子将要打开。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警惕这种做法的巨大负面效应。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总基调并没有改变。尽管特朗普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非常高调、严厉、苛刻、多变，但这依然是其“商

人总统”特性的体现，做“大交易”（Make Big Deal）、“挣面子”，依然是特朗普的首要考虑。从上述中美贸易抗变关系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像特朗普这样不以常理出牌、自以为擅长于谈判的商人总统，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战略思维，不能简单地以传统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对抗思维来处理，不能被特朗普的“胡来”而打乱了我们自己的战略节奏，要清醒地看到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及其复杂性与长期性，同时要相信中国人的理性与智慧，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我们可以适度满足特朗普的“面子”，努力让特朗普的“务实”特点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引导中美关系朝积极方向发展。

## 六、结语

中美是两个体量巨大，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迥异的巨型国家。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更需要塑造与引导，以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不同的塑造与引导，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遇到像特朗普这样对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不甚了解的美国总统，更需要我们的主动塑造和引导。<sup>[8]</sup>我们不要被动地跟随特朗普的节奏，可以有创意地主动“示弱”，适度“吃亏”，以塑造和引导中美关系的正面走向。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基础面还是很宽广的。中美两国之间除了传统的“政治基础”之外，还有“非政治基础”。传统的“政治基础”主要聚焦于国际安全、政治外交与意识形态。冷战时期，国际安全与政治外交无疑位于首位。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尤其是经济意识形态上升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政治基础”因素。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依然是当前中美两国的基本共识，只是美国觉得中国做得还不够而已。此外，“非政治基础”因素保持强大的存在，即共同的全球责任与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国际移民与难民等全球治理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以个人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存在，尽管特朗普试图以狭隘的“美国优先”原

则来修正，但只要国际社会还存在，只要我们还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这个“非政治基础”就存在，就需要中美两国的协调合作。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很困难，但从中美建交40年来看，更困难、更危险的情况还有。例如，再困难，能有1989—1991年困难吗？当年中美之间几乎面临全面对抗的困境；再危险，能有1999—2001年危险吗？当时中美之间几乎面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所以，笔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境仅是中美关系史长河中的一段逆流或漩涡而已。今年是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随着特朗普外交的“成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也将逐步进入沉稳期。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理智——理性+智慧，即使美方“胡来”“乱来”，我们也不能失去战略定力<sup>[9]</sup>。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 注释

① 参见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5 - 55;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2008; Rosemary Foot,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management: three decades of China - Japan - US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p. 829-842.

② 参见Kagan, Robert. 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 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The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20, 1997, pp. 22-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Routledge, 1999. David Shambaugh and Karl F. Inderfurth, China and the US: To Hedge or Engage, YaleGloabl Online, April 11, 200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and-us-hedge-or-engage> (访问时间: 2019年5月28日); Suisheng Zhao,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5 (2012), pp. 369–389.

③ 《华盛顿时报》2018年6月20日第4版,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topics/donald-trump/>, 访问时间: 2019-7-25。

④ 同上。

⑤ 《纽约时报》2018年5月12日第一版。<https://www.nytimes.com/2018/05/12/us/politics/>, 访问时间: 2019-6-28。

⑥ 以上观点论述参见林宏宇：“试析特朗普‘新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

⑦ 以上有关近1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3个阶段的论述，参见林宏宇：“从特朗普访华看中美关系”，《人民论坛》2017-11。

## 参考文献

- [1] Thomas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M].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p. 1.
- [2] 林宏宇. 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0-14.
-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90.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107.
- [5] 习近平在2017年12月28日会见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参见[www.chinanews.com](http://www.chinanews.com), 访问日期: 2019-7-20.
- [6] 林宏宇. 金砖国家概览[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7:8.
- [7] 林宏宇. 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0-14.
- [8] 林宏宇. 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0-14.
- [9] 林宏宇. 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0-14.

# 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hip and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Lin Hongyu**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in a hundred years”(UGCIHY) is a dynamic strategic judgment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a, which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and basis for guid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exchanges, and 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 must be examin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UGCIHY.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es for making a judgment of UGCIHY is that the USA and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have changed a lot. Among them, unprecedent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hundred years is the biggest variable affecting 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 Influenced by it, the current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show a "resistance" state.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and complexity and long-term nature of 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elieve in the rationality and wisdom of Chinese, look at and actively guide 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a stable China-U.S. relationship.

**keywords:** China-U.S. relations;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U.S. trade war

# 从边缘到主流：美国的越裔文学

张龙海 张英雪

**摘要：**美国越裔文学很大程度上是越南战争的结果。本文围绕越南战争给美国越裔带来的深重灾难和身份危机，以越裔族群为主要关注点，探讨越裔文学中的战争和身份主题。通过梳理国内外越裔文学研究现状，提出：随着1.5代越裔作家的不断壮大和优秀越裔作品的出现，越裔文学开始迈入美国文学正典化进程，同时越裔文学研究正在成为亚裔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关键词：**越南战争；越裔文学；战争主题；身份主题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79-11

近年来，随着美国越裔族群的壮大，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越裔开始书写自己族群的历史。由于越裔文学很大程度上是越南战争的结果，受其影响，战争成为显性或隐性主题，以不同形式出现在越裔作品之中。与此同时，由战争导致的身份危机使越裔族群成为在美游荡和寻根的“异乡人”，借助故国回忆和想象，他们试图重建精神家园。2016年阮清越<sup>①</sup>（Viet Thanh Nguyen, 1971—）凭借小说《同情者》（*The Sympathizer*, 2015）斩获美国普利策大奖，这是美国越裔作家第一次荣膺全国性文学奖项，标志着越裔文学开始迈入美国文学正典化进程。至此，越裔文学开始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关注。

## 一、战争的梦魇：越裔文学的发端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越南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难民潮，他们背井离乡，相继逃亡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及其他亚洲国家。出于政治利益上的考虑，美国成为越南难民最大的接收国。据统计，1965年之前在美生活的越南人仅603

人<sup>②</sup>，而1975年越战结束当年，就有12.5万越南难民逃亡美国。1975—1989年间总共有41.4万越南难民到达美国，这一数据到2002年累积达75.9万人<sup>③</sup>。由此可见，美国越裔族群的出现主要是越南战争的结果，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战争的恐惧，这些难民穿过太平洋来到美国，成为流离失所的精神难民。

然而，最早对越战和越裔难民经历进行书写的白人作家<sup>④</sup>，由他们（多是美国越战老兵）书写的、以越战为题材的作品被称为美国越战文学。越战文学以小说为主要形式，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纪实为主，在史实的基础上记录战争残酷，着重分析越战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并对美国政府在越战决策上的失误进行反思。第二阶段关注越战退伍军人，主要描述越战老兵退伍后融入美国社会过程中遭受的心理障碍<sup>⑤</sup>和社会歧视。第三阶段将关注点转向越裔群体，作品多以越裔聚集地“小西贡”为叙述场所，将越裔集体作为战后美国社会的一大文化景观加以展示，重点揭露后越战时代美国社会的低落情绪和沮丧气氛。越战文学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已经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国家认同研究”（16BWW076）

作者简介：张龙海，男，福建漳州人，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后，闽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少数民族文学、印度语文学、印度政治经济；张英雪，女，河北衡水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少数民族文学。

成为美国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无论是早期战争的残酷本质、中期退伍军人的心理障碍，还是后期越裔群体的生存状态，三个阶段的越战文学均以白人视角探讨越战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西方思维。

与越战文学相比，越裔文学出现相对较晚。最早发表作品的越裔作家是陈宛定（Tran Van Dinh, 1923—2011），在回忆录《无人渡河》（*No Passenger on the River*, 1965）中，他对越南政府进行尖锐的政治批判，发出了美国越裔的第一声。20世纪90年代以来，1.5代<sup>⑥</sup>作家开始文学创作，一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越裔文学一跃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的新生力量。迄今为止，至少已有包括赖晶荷（Thanhha Lai, 1965—）、安德鲁·彭（Andrew X. Pham, 1967—）、芭芭拉·陈（Barbara Tran, 1968—）、莫妮卡·张（Monique Truong, 1968—）、张陈（Truong Tran, 1969—）、孟兰（Mong Lan, 1970—）、阮清越、黎氏艳岁（Lê Thị Diêm Thúy, 1972—）、范艾美（Aimee Phan, 1977—）、黄丽丽（Lily Hoang, 1981—）、王洋（Ocean Vuong, 1988—）等在内的11位作家获奖，引发了越来越多读者和评论家对越裔作家这一群体的关注。初步统计，从1965年陈宛定发表《无人渡河》至今的54年间，共有至少40位越裔作家发表了百余部文学作品，其中小说30余部（自传性小说12部，虚构性小说22部）、诗歌集28部、戏剧16部（电影剧本9部）、散文集10部、短篇小说集6部<sup>⑦</sup>。

对于越裔文学的概念，沿袭著名亚裔学者金惠经（Elaine Kim）关于美国亚裔文学的定义<sup>⑧</sup>，是指越裔作家使用英文创作发表的、关于越裔在美经验的作品。然而，由于越战与越裔文学存在天然的联系，因此将越裔文学仅限定在“越裔在美经验”显然有失公允。阮清越认为“越裔文学与美国越裔群体密不可分”，“美国越裔之所以存在完全是越战爆发的结果。”<sup>⑨</sup>这种说法总结了越裔文学的特征——越战成为越裔作家的共同经历，通过记录难民故事，越裔作家直接或间接描写越战和难民经历。

1993年莫妮卡·张发表论文《声音的出现：美国越裔文学1975—1990》（The Emergence of Voices: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1975—1990），这是最早对越裔文学进行阶段性总结并作出深入分析的文章<sup>⑩</sup>。在这篇文章中，莫妮卡·张对“美国越裔”和“美国越裔文学”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并对早期访谈文学和前南越军、政要员的回忆录进行了简单介绍。莫妮卡·张认为应该打破语言的限制，不仅将英语写作的包括自传、诗歌、书信、散文、小说和其他非小说文本在内的书面文学划入美国越裔文学行列，还应将非英语抄写或改编的民谣、歌曲、口述历史及其他形式的口头文学也列入美国越裔文学范围之内。此外，她还认为应当由写作者自身而非评论家单方面决定自己是否应当归为越裔文学作家之列。

在总结阮清越和莫妮卡·张有关越裔文学内容和体裁的基础上，并根据《诺顿美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只收录母语是英语作品的原则，笔者将美国越裔文学概括为美国越裔作家使用英语创作的、关于越裔在美生活经验、越战经历以及对母国集体回忆和个人想象的作品。由于早期口头文学，尤其是记录越裔经历的访谈文学带着强烈西方意识形态倾向，这些转录文本极易被采访者以政治目的“再书写”，因此，本文在梳理越裔文学作品时舍弃了对这一部分文本的研究。

## 二、从沉默到发声：越裔文学的发展

鉴于越裔文学主题鲜明，本文在梳理越裔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采用了主题研究的方法。总的来说，越裔文学的主题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战争主题。这也是越裔文学最为突出的主题。作为美国越裔的集体记忆，越战成为越裔作家挥之不去的集体梦魇；第二类为身份主题。随着越裔族群在美国生活的开始，离散在美的越南难民及其后代徘徊在美越两种文化之间，不断寻找自我身份。针对这一阶段越裔身份“杂糅”（hybridity）问题，越裔文学进行了反省和回应。

### （一）永不消逝的战争：越裔文学的战争主题

越裔文学深受越战影响，战争成为越裔文学不可回避的主题，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出现在越裔作品

之中。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再现战争残酷。这一主题的作品多见于早期回忆录、自传或其他自传体文学中。第一代越裔作家保留了早期亚裔文学多以回忆录、自传或其他自传体文学形式进行创作的传统，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策略，从个人或家庭角度再现战争残酷<sup>⑪</sup>。

阮氏图兰（Nguyen Thi Thu-Lam, 1940—）的《落叶：越南妇女回忆录 1940—1975》（*Fallen Leaves: Memoirs of a Vietnamese Woman from 1940—1975*, 1989）记录了作者从出生到越战结束三十多年间经历。从北越到南越，从越南到美国，从不谙世事的少女到事业有成的商人，作者将个人的成长背景与越战背景相联系，再现越南社会多年战争史。胡广玉（Jade Ngoc Huynh Quang, 1957—）的《南风改变》（*South Wind Changing*, 1994）以个体视角描述战争给无辜民众带来的痛苦。战争像一场慢性病夺走了小广玉六个亲人的生命，广玉因在外地上大学得以幸存了下来。然而，为了避免继续受迫害，广玉不得不继续四处逃亡。

在早期自传体文学作品中，最为有名的是冯氏黎乐（Phung Thi Lê Ly, 1949—）<sup>⑫</sup>的《天翻地覆：一个越南女人从战争到和平的历程》（*When Heaven and Earth Changed Places: A Vietnamese Woman's Journey from War to Peace*, 1989）和《战争之子、和平之女》（*Child of War, Woman of Peace*, 1993）。两部作品以作者亲身经历为故事原型呈现战争的残酷及主人公自我抗争的心路历程。越战期间，黎乐所在的村庄被南越政府军和北越共产党交替控制。为了生存下去，黎乐最终通过一场美国婚姻逃离越南。但是移民美国的黎乐并未从此过上安宁的日子，对越南亲人的担心以及周围美国人对越南人的偏见，时时刻刻将她拉回到过去。幸运的是，冯氏黎乐虽饱经战争之苦，却从未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就像她所说，“我在磨难中得到的特殊礼物是如何在脆弱时变得坚强，如何在恐惧时变得勇敢，如何在困惑中变得清醒，如何让那些我们掌控不了的过去随风而逝”<sup>⑬</sup>。

与阮氏图兰、胡广玉和冯氏黎乐从个人视角记录越战不同，阮文武（Nguyen Van Vu, 1932—）和董宛梅（Duong Van Mai Elliott, 1941—）从家庭角度

再现战争残酷。阮文武的《在美国家中》（*At Home in America*, 1979）<sup>⑭</sup>讲述了一个普通的越南家庭越战中历尽艰险生存下来的故事，描述了普通家庭在面对“西贡陷落”<sup>⑮</sup>“船民”逃难等重大事件时的痛苦抉择。董宛梅的《神圣的柳树：一个越南家庭的四代史》（*The Sacred Willow: Four Generations in the Life of a Vietnamese Family*, 1999）再现了一段跨越两个世纪的四代家族史，作者以自己亲人提供的故事、照片、文件等资料为素材，揭露了战争对普通家庭造成的深重灾难。

通过个人和家庭角度书写战争构成越裔早期回忆录、自传或其他自传体文学的基调。将个人成长经历与越战时代背景相联系，或以家庭为单位反映战争对普通家庭的破坏，再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从不同侧面直面了战争的残酷本质。

第二，揭示战争创伤。与第一代越裔作家相比，1.5代作家多在“西贡陷落”前夕逃往美国。不同于第一代越裔作家对战争的直接书写，他们多通过回忆和想象，采用复调叙事、时间倒置、隐喻等叙事方式揭露战后越裔族群的心理创伤。

高兰（Lan Gao, 1961—）的《猴桥》（*Monkey Bridge*, 1997）和《莲与暴》（*Lotus and Storm*, 2014）书写了越战结束后越裔族群的创伤记忆。越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战争记忆却深深烙在两代越裔心中。《猴桥》中母亲清的刻意回避和《莲与暴》中父亲铭的苦苦追寻都将女儿带回到过去那场恐怖血腥的战争。作者在两部小说中均使用了复调叙事的写作手法，借此表达因战争而造成的人的精神世界的混乱失序。陶·斯托姆（Dao Strom, 1973—）的《草屋顶、锡屋顶》（*Grass Roof, Tin Roof*, 2003）同样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手法。小说以三重视角阐述战争对两代越裔的精神摧残——战争不仅阻碍了战争亲历者与他人重新建立家庭关系的机会，还变成第二代越裔心中抹不去的阴影，迫使他们不得不以“他者”的方式理解周围的世界。陈武（Van Tran, 1975—）的《龙鱼》（*Dragon fish*, 2015）采用隐喻的叙事策略讲述了警察罗伯特追寻自己越南前妻苏西的故事，以白人视角反观越战给越裔难民带来的持久创伤。虽然已在美国生活多年，但悲伤的记忆像“龙鱼”一样撕

咬着苏西。小说以白人视角管窥战后越南难民在美国无家可归的心理状态，同时也折射出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2017年阮清越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难民》（*The Refugees*, 2017），通过八个独立的故事揭示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黑眼睛的女人》（Black-Eyed Women）讲述了一位饱受丧子之痛的母亲被死去儿子鬼魂纠缠的故事。《我要你要我》（I'd Love You to Want Me）描述了一段越战老兵陷入回忆误把妻子当成越南情人的经历。《美国人》（The Americans）刻画了一名无法摆脱越战中炮轰越南罪行的空军老兵。《难民》中，无论是早年参加越战的美国老兵、逃亡到美国的第一代“船民”，还是在美国长大的1.5代，他们都徘徊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无法解脱。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作者使用倒叙和闪回等多种叙事方式，再一次显示了他在情节设计和故事呈现方面的天赋。正如《观察家》所说，“阮笔下的文字令人眼花缭乱，明晰透彻”<sup>⑩</sup>，描绘了一幅饱受战争后遗症折磨、困守在各自精神荒原里的难民群像，抨击了战争的罪恶及其对人类心灵造成的致命创伤。

除了上述作品，王洋在诗集《燃烧》（*Burning*, 2010）和《带伤的夜空》（*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 2016）将个人遭遇与时代不幸相连接，在现在和过去的时间切换中以悲戚精确的语言描写了时代的忧伤。《与燃烧的城市晨歌》（Aubade with Burning City）是王洋的经典诗作，诗人使用诸如“黑犬、蜡烛、香槟酒、圣诞欢歌、红色的天空”等具有强烈哥特风格的意象，描述了“西贡陷落”前夕越裔难民逃离越南的紧张场景，以阴暗的色调和恐怖的画面表现出越南人民在战争中飘摇不定的命运和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

阮清越在《一切都不会消失：越南与战争记忆》（*Nothing Ever Dies: Vietnam and the Memory of War*, 2016）中写到，“所有战争都会发生两次，一次是在战场上，一次是在记忆中”<sup>⑪</sup>。不同于以白人为主视角的越战文学，越裔文学把重点放在越裔族群遭受的精神痛苦上，通过不同叙事手段揭示出越战对越裔族群造成巨大创伤，为越战中饱受折磨的越裔难民发出了越裔族群的声音。

第三，反思战争本质。在再现战争残酷和揭示战争创伤的同时，越裔作家还以包括外交官员、参战军人、女性以及儿童等在内的多重视角直接或间接反思战争本质。

早在1983年，陈宛定的《青龙白虎》（*Blue Dragon and White Tiger*, 1983）就将越战上升到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层面加以审视。值得一提的是，《青龙白虎》是美国越裔群体中出现的第一本用英语书写的越战小说<sup>⑫</sup>。曾出任南越政府驻美大使的陈宛定对南越政府与美军之间的勾结深恶痛绝，通过揭露南越政权腐败和美国政府阴谋反思越战，为后来的越裔作家提供了创作主题上的范式。例如，阮清越继承了这一主题，在《同情者》中充分表达了对越战的反思。

《同情者》是近年来出版的反思越战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不仅一举获得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多项国际大奖，还将越裔文学这一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亚裔文学分支推到读者和评论家面前。该书以一名参战军人视角反思战争。主人公是一名北越间谍，“西贡陷落”之后，他随一位南越“将军”逃亡美国，成了受美国政府庇护的政治难民。小说以“自白书”形式展开，一方面很容易将读者带回越战这一历史背景中，另一方面也更加直接地揭示出战争的本质：战争只是国家之间为实现各自利益而使用的政治工具，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正义和自由，相反只能将普通民众推向苦难的深渊。阮清越在《同情者》中多次使用反讽的修辞策略，主人公站在南北政权和东西文明之间看似可以看透事情的两面，实际上却总是陷入两难境地。阮清越认为战争就像人性一样复杂，而历史却总是将战争简单化，尤其对于那些承受战争之痛的受难国来说更是如此——它们被强权国家粗暴地当成历史教材或新闻报道的注脚，淹没在历史长河里。

《同情者》打破了白人越战文学从美国角度书写越战的局面，从北越军人的视角审视越战，为越战本质的反思提供了另一种声音。

除了以战争亲历者的视角直接反思越战，越裔文学中也不乏以女性和儿童视角间接反思越战的作品。林丁（Linh Dinh, 1963—）的《仇恨般的爱》（*Love Like Hate*, 2010）以女主人公“金兰”的

战后生活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幅混乱的越南社会场景。作者使用寓言式书写方式，或将越南比作被强奸了的母亲，或将越南社会比作发酵的海鲜垃圾，以女性细微的观察将战争对越南造成的破坏进行细致的描写，以此抨击美国为实现本国目的践踏别国主权的行径。黎氏艳岁在《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The Gangster We Are All Looking for*, 2003）中使用儿童视角反观战争。主人公是一名八岁的小女孩，她跟随父亲乘船逃亡到美国，目睹了战后生活的艰难。小说中没有暴力的场面和阴郁的气氛，而是透过儿童无辜的眼神，呈现战争带给人的无奈和忧伤。散文般的语言不禁让读者忘记这是一部反战作品。黎氏艳岁正是通过这样的反差让人们发出质问：这场为了本国利益在别国领土发起的非正义战争究竟会将越南人民的命运带向何处？

此外，以儿童视角反观战争的作品还包括赖景荷的《再见木瓜树》（*Inside Out & Back Again*, 2011）和萨曼莎·勒（Samatha Le, 1974—）的《丢弃的妹妹》（*Little Sister Left Behind*, 2007）。《再见木瓜树》是一部半自传小说，以自由诗形式叙述了女孩“哈”一家在美国避难的心酸经历；《丢弃的妹妹》是一部虚拟的回忆录，以少女的口吻讲述了战后她的家庭四处避难的过程。两部作品都以平静的语言对战争进行了强烈控诉。

无论是以战争亲历者视角直接反思越战，还是以女性和儿童视角间接反思越战，越裔文学将这场战争置于越裔族群的视角进行审视，逐渐打破长期以来白人作家对越战话语垄断的局面，为这场发生在越南领土的战争增添了新的注解。

## （二）我是谁：越裔文学的身份主题

对于美国亚裔文学来讲，身份主题一直是其最为重要也无法避开的主题之一。越裔作家，尤其是1.5代和第二代，继承了亚裔文学的创作传统，将身份主题作为重点进行书写。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遭遇身份危机。越战最为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无数越裔难民家园的失去和身份的丧失，反映在越裔文学中主要表现为越裔族群在面对美越两种文化冲突时所遭遇到的身份危机。

莫妮卡·张的第二部小说《难言之隐》（*Bitter*

*in the Mouth*, 2010）揭示了越裔后代身份丧失后的焦虑。琳达无法控制由词语触发的味觉，当她重回成长地时发现自己的生母原来是逃难到美国的越南难民。回想从小到大遭遇过的歧视，琳达才意识到像所有越裔同族一样，自己在白人世界遭受到冷眼的根本原因是她被视为他们眼中的“异类”。琳达对于语言的特殊反应是她对美国文化不适的隐喻。相比《难言之隐》，莫妮卡·张的处女作《盐之书》（*The Book of Salt*, 2003）在主题上立意更远。小说透过阿平对过去越南生活的回忆和现实巴黎生活的描绘展示了殖民地小人物流浪异乡、自我放逐的过程，揭露了白人殖民者注视下亚洲人卑微的生存境地。通过对两部小说发现，莫妮卡·张在人物、地点、情节设置上可谓别有用心。阿平的厨师职业和琳达对味道的特殊能力使《盐之书》更像是《难言之隐》的前传；而在地点设置上，法美两国更像是越南历史的前世今生。法国和美国先后以“保护者”的姿态介入越南，将越南人变为丧失家园的流浪者——阿平是流浪法国的越南杂役，琳达是漂泊美国的越裔难民。作为处在白人世界的“他者”，他们只能通过味觉表达失去身份的苦涩和无奈。

莫妮卡·张是1.5代中成名较早的作家，其作品主要探讨了文化认同、流散身份以及新殖民主义等复杂问题。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越裔作家。拉克苏（Lac Su, 1970—）的《我爱你们是为了白人》（*I Love You Are for White People*, 2009）以自传形式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美越文化冲突。五岁跟随父母逃难到美国的苏被美国热情开放的文化深深吸引，但父亲代表的越南父权文化简单粗暴，不仅强行割裂苏和白人社区接触的机会，还对他积极融入白人文化的行为横加指责。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苏不得喘息，一度被逼到离家出走的境地。黄丽丽的《易经》（*Changing*, 2009）以神秘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女孩的家庭故事，在不断地世事更迭中展示了家族成员飘忽不定的命运。书中略带实验主义的写作风格为读者呈现出人在失去身份后的惆怅和夹在两种文化中被撕裂的痛苦。陈家宝（GB Tran, 1976—）的《越美：一趟家族旅行》

(*Vietnamerica: A Family's Journey*, 2010) 以图像叙事的方式回忆了自己试图在充满艰辛和英雄主义的家族传奇中寻找身份的经历。作者将家族历史和身份认同置于具体场景中，揭露了越裔后代为解答由战争引发的“何处是家乡”这一命题所面临的身份危机。

阮建 (Kien Nguyen, 1967—) 的《无家可归：童年回忆录》 (*The Unwanted: A Memoir of Childhood*, 2001) 以悲伤的语言回顾了自己作为一名美越混血儿不愉快的成长经历。美越混血身份令小阮建在越南的处境十分艰难，他的卷发让他备受歧视，在越南他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经历九死一生的逃亡后，阮建终于到达美国，然而这一次他又因为混血身份而遭受美国人排挤，成为美国社会不受欢迎的人。美越混血儿是越战的直接产物，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美国，美越混血儿都丧失归属感——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痛苦地徘徊在两种身份之间，成为这次非正义战争的历史见证。

美国越裔因越战而被迫沦为在美游荡的“异乡人”，夹在美越两种文化之间摇摆不定，为了克服身份丧失带来的苦闷，他们不断在文学作品中探求“我是谁”的身份命题。

第二，重塑自我身份。随着越裔文学的发展，新生代越裔作家使用包括回忆录、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通过化解代际矛盾和寻根母国文化，重塑自我文化身份。

阮碧铭 (Bich Minh Nguyen, 1974—) 的回忆录《偷吃菩萨的晚餐》 (*Stealing Buddha's Dinner*, 2007) 分析了自己作为一名越裔难民徘徊在美越两种文化之间的复杂心理——她为美国文化着迷的同时也被越南文化深深吸引。处女作小说《矮女》 (*Short Girls*, 2009) 延续了《偷吃菩萨的晚餐》的主题，讲述了一对受美国文化影响的越裔姐妹通过挖掘父辈逃难故事寻找自我身份的经历。第二部小说《先锋女孩》 (*Pioneer Girl*, 2014) 将母女关系置于越裔族群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在离散背景下对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自我和他者等二元身份等问题加以考量。通过分析，阮碧铭发现对于像她一样的美国越裔来说，吸收美国文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母国文化传统，相反，保存母国文化更容易让他

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

同样地，以寻根母国文化重塑自我身份的作品还有安德鲁·彭的《鲶鱼和曼荼罗》 (*Catfish and Mandala*, 1999) 和时布 (Thi Bu, 1975—) 的《尽我们所能》 (*The Best We could Do*, 2017)。《鲶鱼和曼荼罗》是一部毕加索风格的回忆录，记录了作者骑自行车跨国旅行的见闻。为期一年的寻根之旅不仅让他克服了亲人自杀带来的心理障碍，还使他逐渐找回早已失去的身份。同样作为一部回忆录，《尽我们所能》以动人心弦的口吻探讨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对越裔后代的不良影响。当作者自己成为母亲之后，才最终理解父辈逃亡美国开始新生活时面临的困难。母亲的身份不仅让她同过去达成和解，也让她重获寻找美好未来的勇气。

安德鲁·林 (Andrew Lam, 1964—) 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东方吃掉西方：两个半球之间的故事》 (*East Eats West: Writing in Two Hemispheres*, 2010) 和《失乐园的鸟》 (*Birds of Paradises Lost*, 2013) 对于越裔难民如何跨越地理和心理界限进行自我身份建构展开了详细探索。他认为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差异仍然存在，重点是如何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相互融合。此外，芭芭拉·陈的散文集《八哥的诉说》 (*In the Mynah Bird's Own Words*, 2002) 以诗意的语言表现了作者在身份构建过程中体验到的忧伤和痛苦。

在1.5代越裔诗人中，张陈和孟兰颇为活跃，他们的作品在强调诗歌审美价值的同时还注重诗歌的文化功效。张陈主张将诗学、史学与身份认同相联系以抵制对少数文化的边缘化，他的多部诗集如《观念之书》 (*The Book of Perception*, 1999)、《处于边缘》 (*Within the Margin*, 2004)、《尘埃与良知》 (*Dust and Conscience*, 2002) 都表达出对文化独特性的尊重。孟兰将艺术与诗歌相结合，以多种形式呈现难民流离失所的经历，诗集《边缘缘何起风》 (*Why Is the Edge always Windy*, 2005)、《豆腐之歌及其他》 (*Love Poems to Tofu & Other Poems*, 2007)、《才华横溢：诗歌与艺术》 (*One Thousand Minds Brimming: Poems & Art*, 2014) 描述了越裔族群为构建自我身份所作的各种抗争，赞扬了他们在身份构建过程中探求存在意义的勇气。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1.5代和第二代越裔作家对越裔文学身份主题正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开始挖掘隐藏在文化因素和政治背景之下的普遍人性和道德伦理，以期对流散海外的越南人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等现实困境进行积极性探索。例如，王洋在其处女作小说《地球上我们短暂的荣光》（*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 2019）中，一改以往的阴郁风格，以紧迫的张力和优雅的笔触探讨了沉浸在暴力和创伤之中的人们如何拯救自我和他人的问题。范艾美在《程樱桃的再教育》（*The Reeducation of Cherry Truong*, 2012）中以程、吴两家战后逃往美国的故事描述了越战难民在世界各地四处漂泊的悲惨经历，探讨如何恢复战后记忆、伦理秩序等问题。随着美国越裔文学的不断发展，美国越裔文学对于身份主题关注也将更加多样化。

### 三、方兴未艾：亚裔文学研究的新兴力量

越裔文学一开始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越裔文学才开始逐渐出现在学术期刊和学术专著当中。最早关注越裔文学群体的是越裔学者<sup>⑨</sup>。1989年陈魁平（Qui-Phiet Tran）率先发表文章《自由之地中的流浪者：1975年以来离散在美国的越裔艺术家及作家》（*Exiles in the land of free: Vietnamese Artists and Writers in America, 1975 to the Present*），对1975—1989年间的越裔艺术家及作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梳理，越裔文学研究由此开始。1992年由林玉玲（Shirley Geok-Lim）和林英敏（Amy Ling）选编的《美国亚裔文学作品选读》（*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收录了雷尼·克里斯托弗（Renny Christopher）《〈青龙白虎〉：美国越裔文学的双重文化属性》（*Blue Dragon, White Tiger: The Bicultural Stance of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和陈魁平《从孤立到融合：陈迭航小说中的美国越裔形象》（*From Isolation to Integration: Vietnamese Americans in Tran Dieu Hang's Fiction*）两篇文章，这是越裔文学作品第一次以集体形式出现在学术选编著作中。1993

年莫妮卡·张发表论文《声音的出现：美国越裔文学1975—1990》，如前文所述，莫妮卡·张在这篇文章中对“美国越裔”和“美国越裔文学”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拓展了越裔文学的研究文体和范畴。

20世纪90年代，两部有关越裔文学的选集相继出版。一部是1995年由陈德（Tran De）、安德鲁·林、阮海岱（Hai Dai Nguyen）合编的《曾经有一个梦想》（*Once upon A Dream*）。这是第一部由1.5代作家编写的越裔文学选集，全书共分为“流亡”（Exodus）、“挽歌”（Elegies）、“美国越裔”（Viet American）、“回家”（Homecoming）四个部分，收录了1975—1995年20年间越裔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小说、诗歌和其他艺术作品。另一部选集是1998年由芭芭拉·陈、莫妮卡·张、鲁章珂（Luu Truong Khoi）合编的《水印：美国越裔诗歌与散文选》（*Watermark: Vietnamese American Poetry & Prose*, 1998）。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集以代表越南传统的“水”为线索，收录了1.5代作家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探讨了越裔文学除小说之外的其他文体形式，首次将研究重点放在战争之外的其他主题上。

相比八九十年代的缓慢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越裔文学研究步入发展时期。表现之一是有关越裔文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据不完全统计，1975—1999年的25年间，只有零星几篇文章见诸学术专著和期刊<sup>⑩</sup>。而2000年至今，已有几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其中仅2011—2018年8年间就有22篇论文发表，包括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2篇<sup>⑪</sup>。这些文章既涵盖战争书写、难民叙事、家园沦丧、身份追寻等传统意义上的主题研究，也涉及文化记忆、性别政治、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以及后现代叙事等文化研究。2011年，两部以越裔文学为主题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分别是伊莎贝尔·苏·佩劳德（Isabelle Thuy Pelaud）的《我要诉说：美国越裔文学的历史和杂糅》（*This Is All I Choose To Tell: History and Hybridity in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和珍妮特·米歇尔（Janette Michele）的《我的越南：1962年以来的美国越裔文学》（*My Viet: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1962-Present*）。其中《我要诉说：美国

越裔文学的历史和杂糅》是第一部越裔文学研究专著，“对美国越裔文学进行了分析性介绍，描述了这些越裔作品出现以及评论家阅读和阐释它们所需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解决了围绕在文学作品上的争论、主题等一系列问题，突出了杂糅的概念”<sup>②</sup>。

相对于美国学术界对越裔文学研究的关注，国内越裔文学研究刚刚起步<sup>③</sup>。2011年郝素玲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诗情画意背后的那段历史：论越南裔美国作家黎氏艳岁与她的〈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对黎氏艳岁及其作品《我们都在寻找的那个土匪》进行了详细介绍，这是国内最早关于越裔文学研究的论文。实际上，直到2016年阮清越获得普利策奖，国内学者才开始对越裔文学进行关注。目前仅有7篇期刊论文发表。论文研究对象包括

《同情者》《猴桥》《莲与暴》《越美：一趟家族旅行》和《天翻地覆：一个越南女人从战争到和平的历程》等作品<sup>④</sup>。硕博论文中，仅有两篇硕士论文关注了越裔文学作品<sup>⑤</sup>。目前为止，还没有博士论文进行越裔文学相关方面的研究。

随着阮清越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国内学界对越裔文学的关注日益升温。李玉瑶在《短篇魅力与亚裔之声——2015年美国文学概述》中对阮清越及其《同情者》进行了引介，认为亚裔作家人才辈出，其中华裔、日裔、菲裔、越裔文坛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图景，开始将越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中的一部分进行研究。2018年厦门大学张龙海教授在其《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一书中将越裔文学正式纳入亚裔文学体系之中，认为越裔文学是美国亚裔文学组成部分，越裔文学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立于美国亚裔文学体系当中。第六章《美国越裔文学》不仅对冯氏黎乐和阮清越的生平及其作品进行了解析，还简要介绍了美国越裔的移民史和越裔文学的发展概括。同年，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等主编的《美国亚裔文学作品选》对赖昌荷、莫妮卡·张、阮清越、王洋四位作家作品进行了简介和作品节选。2018年6月，“2018美国亚裔文学高端论坛——跨界：21世纪的美国亚裔文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期间，郭英剑教授谈到了美国越裔文学的三个阶段，介绍了阮清越等当代越裔作家的基本情况。来自台

湾的单德兴教授认为战争对少数族裔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以阮清越的个人经历为例说明亚裔作家在美国面临的歧视。同年12月，张敬珏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了题为《阮清越的〈同情者〉与亚裔英雄传统》的讲座，认为《同情者》通过伦理与审美的维度表现出对人性的探索和关注。2019年6月，刘葵兰教授以《“模范”难民和“劣等”难民：〈飘〉与〈难民〉对比》为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报告，探讨了越裔难民的不同经历和主流社会的互动状态。

目前为止，国内仅有《盐之书》《难言之隐》和《同情者》三部越裔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总的来看，国内学界越裔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期刊论文发表较少，研究对象相对集中，研究缺乏系统性。

#### 四、结语

从1975年越战结束至今的四十多年间，越裔作家逐渐打破白人越战文学的叙述垄断，为越战及其相关文学主题增添了越裔族群的声音。与其他亚裔文学相比，越裔文学出现较晚。受自身或父辈越战经历的影响，无论是第一代还是1.5代越裔作家，创作主题主要集中在战争记忆、文化身份等族裔文学早期常见主题之上，这也是越裔文学的主要创作特点。近年来，越裔作家在战争和身份主题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探讨后现代人类生存状态和伦理道德等普遍议题。与此同时，随着越裔文学的不断壮大，越裔文学研究正在成为亚裔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国内越裔文学研究刚刚起步，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 注释

① 关于“Viet Thanh Nguyen”的汉译，目前国内有两种译法：台湾译本和网络资料均译为“阮越清”；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本则译为“阮清越”。对于为什么将“Viet Thanh Nguyen”译为“阮清越”而不是“阮越清”，译者陈恒仕专门做了考证（具体可见网络资料<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595824/>），本文认同陈恒仕的观

点，选用了后者。

- ② 数字来自：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9: 448。这603人的成员构成为南越学生、语言教师以及外交官员。
- ③ 数字来自：Max Niedzwieki and TC Duong. *Southeast Asian American Statistical Profile*. Washington DC: Southeast Asia Action Center, 2004:9-11。转引自：梁茂春，《1975—2004年间移居美国的越南人》，世界民族，2007(1)：71-72。
- ④ 评论界谈论的第一本越战小说并非出自美国人笔下，而是由英国人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创作的《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 1955)。转引自：胡亚敏，《从幻想走向噩梦的深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1): 89。
- ⑤ 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ost -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指个体经历死亡威胁、严重伤害或性侵犯之后表现出来的以创伤情境反复侵入、回避和高唤起症状为特征的精神障碍。参见：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American Psychology Pub, 2013.
- ⑥ 1.5代(1.5 generation)是指不在美国出生但幼年时随父母移民到美国的群体，他们介于第一代移民和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之间，因此被称为1.5代。
- ⑦ 在梳理越裔文学时，本文排除了带着西方意识形态倾向的回忆录、访谈录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文本。如，南越前总理阮高其(Nguyen Cao Ky)的自传《二十年零二十天》(*Twenty Years and Twenty Days*, 1976)；前“越南共和国”副总理陈文敦(Tran Van Don)的《我们无止尽的战争》(*Our Endless War: Inside Vietnam*, 1978)；越南前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礽(Truong Nhu Tang)的自传《一个越南官员的回忆录》(*A Vietcong Memoir*, 1985)(与Doan Van Toai、David Chanoff合著)；南越前驻美大使布迪姆(Bui Diem)的《在历史的夹缝中》(*In the Jaws of History*, 1987)(与David Chanoff合著)；陈氏素娥(Tran Thi Nga)的访谈录《浅冢》(*Shallow Graves*, 1986)(与Wendy Wilder Larsen合著)。
- ⑧ 金惠经在《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1982)一书中将美

国亚裔文学定义为“美国华裔、日裔、朝裔、菲裔使用英语创作发表的关于美国经验的作品”。《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其他亚洲各族裔，华裔、日裔、朝裔和菲裔较早移民美国，为了研究的需要，金惠经选取华裔、日裔、朝裔和菲裔作为研究的对象，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其他亚裔人口的增长，如何重新看待和定义美国亚裔这一集合概念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 ⑨ 引自：Viet Thanh Nguyen. *Nothing Ever 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00。
- ⑩ 之后莫妮卡·张修订了《声音的出现：美国越裔文学1975—1990》并重新命名为《美国越裔文学》(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美国越裔文学》后被收录到美国亚裔学者张敬珏(King-Kok Cheung)主编的《美国亚裔文学的跨民族同伴研究》(*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中。
- ⑪ 实际上，由于越裔文学起步较晚，1.5代和第二代作家中以回忆录、自传和自传体文学形式进行创作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在后面的“越裔文学的身份主题”论述中，本文也涉及了其他同类型的文学作品。
- ⑫ 冯氏黎乐(Phung Thi Le Ly)是黎乐·黑斯利普(Le Ly Hayslip)的原名，本文使用了黎乐的越南名字。她的两部自传小说《天翻地覆：一个越南女人从战争到和平的历程》和《战争之子、和平之女》是她与美国作家杰·伍兹(Jay Wurtz)合作完成的。
- ⑬ 引自：Le Ly Hayslip and Jay Wurts. *When Heaven and Earth Changed Places: A Vietnamese Woman's Journey from War to Peace*. Doubleday Press, 1989: XV.
- ⑭ 《在美国家中》是阮文武与鲍勃·皮特曼(Bob Pittman)合作完成。
- ⑮ 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攻占南越首都西贡，标志着越战的结束。南越政权称越战的结束为“西贡陷落”(the fall of Saigon)，与南越不同，北越则称之为西贡解放。
- ⑯ 译自《难民》的封底评论。参见：Viet Thanh Nguyen. *The Refugees*. Corsair, 2017.
- ⑰ 引自：Viet Thanh Nguyen. *Nothing Ever 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
- ⑱ 引自：Bonnie R. Crow, Blue Dragon, White Tiger: A Tet Story by Tran Van Dinh. *World Literature Today*

59. 1 (Winter 1985): 160.
- ⑯ 这些越裔学者多为大学教师，教授美国亚裔文学、东西方文化、越南战争等相关方面的课程，科研工作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亚裔文学文化等相关领域。
- ⑰ 代表性文章有：Leo Cawley, *The War About the War: Vietnam Films and American Myth. From Hanoi to Hollywood: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Film*. Ed. Linda Dittmar and Gene Michaud.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90. 41–68; Jan Susina, “Tell him about Vietnam”: Vietnamese American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16.2(1991):58–63; Qui-Phiet Tran.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American Feminine Writing: Exile and Home. *Amerasia Journal*. 19.3(1993): 71–83, 内容主题涉及战争、儿童文学以及女性书写等方面。
- ⑱ 2006年，美国亚裔历史学家陈素成(Sucheng Chan)主编并出版了第一本有关美国越裔族群的专著——《1.5代美国越裔》(*The Vietnamese American 1.5 Generation: Stories of War, Revolution, Flight and New Beginning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这本专著收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美国越裔讲述的有关越南家族历史的故事，为越裔学生写作有关越裔难民经历和其他相关主题的论文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背景。
- ⑲ 伊莎贝尔·苏·佩劳德，美国越裔作家、评论家，旧金山州立大学美国亚裔研究中心副教授，也是越裔移民艺术家网络(DVAN)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是阮清越)。引自：Pelaud, Isabelle Thuy. *This Is All I Choose to Tell: History and Hybridity in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0:1.
- ⑳ 与美国越裔文学研究相比，国内越战文学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详见：甘文平、王锐，《续写、新见、展望——2007—2017年国内越战文学研究述评》，*当代外国文学*, 2017(4)。
- ㉑ 2016年刘葵兰在《外国文学研究动态》发表《淤泥中盛开祥和之莲：高兰小说中的战争创伤与后战争记忆》，对《猴桥》和《莲之暴》两部小说中的战争创伤和后战争记忆进行分析。2017年孙璐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同情的困境：〈同情者〉中的世界主义伦理与反讽主义实践》，以阿皮亚的世界主义伦理和罗蒂的反讽主义为理论基础，阐释了《同情者》中的世界主义反讽叙事。同年，张淑丽在《英美文学评论》发表《记忆皱褶、感知拼图、观点联觉：陈家宝的〈越美：一趟家族旅行〉》，从图像叙事角度阐释《越美》中的家庭伦理关系，将小说的形式特质和主题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2019年甘文平、李忻在《外国语文学研究》发表《解读越裔作家阮清越的越战小说〈同情者〉中的“中国形象”》，详细解读了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特征及其内涵，以期引起中国读者对小说背后社会历史与文化形态的关注。此外，黄世香和罗翎的《“他者”的创伤与文化适应：论越裔美国作家曹兰作品〈猴桥〉的叙事策略》、王智杰的《越裔美国小说〈同情者〉的文化传播意义》以及尹姬和曾紫琼的《论越南裔美国作家乐·莱·黑斯里斯的〈天翻地覆〉》，分别从多重叙述、文化二重性以及身份探求角度对《猴桥》《同情者》和《天翻地覆》进行阐释。另，2016和2017年两篇关于《同情者》的书评先后发表在《书城》和《博览群书》上，它们分别是金衡山、孙璐的《〈同情者〉描述的被同情者》和吴冰寒的《斩获今年普利策奖的〈同情者〉》。2018年12月7日，《文艺报》发表王凯的《阮清越〈同情者〉：永远都不会结束的越南人的越战》，对阮清越及其《同情者》作了介绍和分析。
- ㉒ 分别为罗翎的《创伤中的成长：〈猴桥〉的创伤叙事研究》和商程群的《谁被遗弃了——〈无家可归〉中的“弃儿”人物解析》。

## Origin and Trend of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Zhang Longhai Zhang Yingxue**

**Abstract:**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s largely a result of the Vietnam War. Based on the tragic suffering and identity crisi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caused by the Vietnam War, this article explores war theme and identity theme in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entered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literary canonization with a rapid growth of 1.5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American writers and the emergence of excellent Vietnamese American works. Meanwhile, the study of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ecomes a rising branch of the study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Vietnam War;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war theme; identity theme

# 新时代高校美育的规律特点与实施路径

## ——杜卫教授访谈

杜 卫 李 制 郑 欣

**摘要:** 美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高等学校作为多数学生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 其美育工作能否适应时代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社会的基本风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的“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为高校美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遂使新时代高校美育的规律特点与实施路径, 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高校美育所面临的面向人人之难、教学评价之惑, 以及课程教学与实践体验关系等体制机制和实施路径诸问题, 都应回归到对新时代美育规律特点的研究之上。

**关键词:** 高校美育; 规律特点; 实施路径; 激发兴趣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9)03-0090-05

**问:** 杜老师,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十大战略任务第二项“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 标志着新中国美育在经历了“艰难起步、蓬勃发展”之后, 已经进入了新时期美育的发展期。您认为高校美育应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答:** “全面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是国家对新时代学校美育的要求, 要达到这一要求, 首先应解决教师转型的问题。现阶段, 我们的美育教师多未经过专业的培训, 知道些教育学和教学法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示范, 即通过美育示范课的教学展示, 用说课的方式, 逐步建设高校美育课程教学的范式。此种范式应具备通识视野, 不能永远停留于鉴赏水平, 因为鉴赏课难以令学生投入, 没有投入, 就没有情感体验。这意味着高校美育应逐步加强专业性, 令学生在高强度学习中体会挑战和超越的乐趣, 使其能投入其中。

只有在学生投入之后, 具备通识视野的美育才能真正发挥其育人价值。

**问:** 我们在戏剧教学实践中已注意到学生一旦投入其中, 便会非常积极, 但使学生投入是比较困难的。

**答:** 我上大学时参演了《屋外有热流》<sup>①</sup>, 在投入实践后, 才切实体验到戏剧的魅力。我曾做过一个实验。1981年, 我在实习时组织学生即兴表演了鲁迅作品《药》中当街交易人血馒头的情境, 学生演得非常真实。时值教学改革, 我们就组织学生将《药》排练成戏, 学生很有兴趣, 教学效果非常好。因此, 公共艺术教育入手于兴趣, 这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但须注意不能降低品味。激发学习兴趣很简单, 制作成抖音视频, 可以轻易达到目的, 但抖音视频也须保证品质。高校美育要有高品位, 公共艺术教育难就难在保持品位的同时, 激发兴趣。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以高校戏剧实践为载体践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7J011)

**作者简介:** 杜卫, 男, 浙江平湖人,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 北京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高等教育学会美育分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研究方向为美学、美育; 李制, 男, 山西运城人, 西北工业大学艺术教育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为艺术教育、艺术学理论; 郑欣,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西北工业大学艺术教育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为艺术教育、戏剧影视文学。

问：紧随而来的一个问题，即学校美育有“面向人人”的要求，而同学们的兴趣是多元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师资和教学资源去保障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各自兴趣点上向美而行。请问您有何良策？

答：对，正如陈宝生部长所说的学校美育“最大的问题是师资”，但师资与多元兴趣的矛盾也有调和之道。一方面，学校美育可以借鉴体育经验，引入“俱乐部制”。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一个项目。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养成运动习惯，达到身心健康，而不是要求100米一定要跑到13秒，因它不以培养专业运动员为目的。学校美育亦如是，我建议高校也搞美育俱乐部，师资不够，可以先探索。另一方面，学校美育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文学，尚未被我们好好利用起来，如果能把文学引入美育，师资就够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到了宋代以后，戏曲才逐渐发展起来。在此之前，又有说唱文学、话本文学等，都带有强烈的诗韵、故事性和情感色彩。当前学校美育老师缺、学生多，特别是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用文学来实施美育是很好的选择。我们往往把艺术教育狭隘化了，其实文学就是语言艺术。学校美育如能更好地发挥文学的育人价值，则师资与学生兴趣的矛盾可得化解。

问：文学似乎更侧重情感体验而少技能训练，且理论性相对较强。美育应如何调和理论、体验与实践的关系？

答：诗词格律、识繁写简，大家或多或少都掌握一些文学技能而不自知。此外，诗词歌赋的古谱，如能很好地翻译转化，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资源。基于这些文学技能训练的美育成效，一点都不亚于书画戏剧。每一门艺术都有其独到之处，我现在非常倡导舞蹈和戏剧，因为这些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呈现出人与人在关系中的种种行为，先天具有培养学生协同合作意识的优势。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即能带动其情绪，学生可以在情感交流过程中，理解他人、理解艺术。如果说文学是个人的独自体认，那么舞蹈、戏剧就是集体的协调，它们要求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要合拍。进一步说，艺术是人类的通用语言，舞蹈的非语词性教育对理解力和交流能力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加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人文交流的主要渠道，就是人文艺术。文学、舞蹈、戏剧的美育价值是同等的，文学的门槛低些，对学生而言，文学技能训练会更具趣味性和普适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艺术本来是拿来“玩”的，因此艺术课程应避免程式化，而要让学生们在“玩”的过程中接受教育。美育课程要为学生打开一扇门，关键是要让学生体会到门里的东西是有趣的。一定要激发学生兴趣，这一点是整个学校美育过程中共同缺失的东西。从1990年至今，我坚持调查美育课程，很不幸，各类美育课长期都是学生最不感兴趣的课之一。学生最感兴趣的课往往是数学课，因为数学是智力的游戏，学生在领略其智慧魅力后，会激起无限的兴趣。

问：美育课程要有趣味、有体验，过程中还要有智慧。但教学实情则呈现理论与实践体验两极化状态，理论课程教学中能够加入实践因素的机会并不多，例如戏剧鉴赏课程，受课时等因素限制，实际教学很难分配较长的时间，以供学生进行表演体验。请问应如何化解这一矛盾？

答：鉴赏类课程对高校美育起步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在高校美育起步阶段，受限于师资、条件种种因素，鉴赏课程是推进学校美育的较好选择。学校美育发展到当下，进一步的推进机制可以落在上一门课、带一个团上，即一周两次课程，课程要结合艺术团或俱乐部的实践训练，俱乐部教学要纳入教师工作量，甚至要探索以实践成绩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机制。在校园文化建设当中，那些深受学生爱戴的实践型教师应该进入高级职称序列。鉴赏课的主要任务是要让学生知道、了解该艺术门类，但很难真正引领学生进入这一门类；能引领学生进入某一艺术门类的，只有真实的体验。未来，高校美育的理想形式，应是用艺术团或俱乐部来替代课堂，即在团里讲授，边讲边演、边演边讲，慢慢体会、慢慢提升。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这也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深受学生喜欢的教育模式。未来艺术教育的发展是非常个性化的。

问：但这种教学模式只能面向少部分人，无法达到教育部“面向人人”的要求。

答：每个人都懂戏剧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喜

欢戏剧也是不可能的，学生的兴趣是多元的。每一届学生中，如能有四五个人因为你的存在而爱上戏剧，就是你这门课程最大的成绩。一般的学生，通过课程了解了戏剧，大概掌握戏剧的基本知识，如戏剧史、戏剧程式的基本知识等，对于普及艺术教育而言也就足够了。每届学生中，如有几位能够终身热爱戏剧，又因戏剧而丰盈了情感、体认了人生世界，就非常好了。在这一点上，美育、艺术教育与体育是相通的。

**问：**体育的教学评价是可以量化的，但艺术教育现阶段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量化评价机制。请问您怎样勾画美育的评价机制？

**答：**我认为美育的评价应是层级形态，比如可以用“上、中上、中、中下”的形式来判定学生的水平。从考试角度来讲，美育对“以文化人”的考核，“最好”是针对那些没有读过文学史的学生。因为学生在读过文学作品后，一定会形成自己的体验，在考试时如若填写切身体验，则很可能不符合教师拟定的标准答案；而那些没有读过作品的人，通过考前背诵，其答案必与标准答案相符，但其实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体验和认识。标准化的考试，导致学生不会主动去体验作品的，因为那要占用大量的时间，且不能确保高分。只要有标准化的考试，必然导致标准化的教和学，第一个被抽掉的，就是情感体验。而情感体验是美育和艺术教育的基础和关键。

**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美育要以艺术教育的改革发展为重点，紧紧围绕高校普及艺术教育、专业艺术教育和艺术师范教育三个重点领域，大力加强和改进美育教育教学”。请问您如何解读普及艺术教育？

**答：**这三类艺术教育的对象不同，普及艺术教育是针对普通高校美育而言。普通高校学生的知识体系，与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是不同的，因此，面向普通高等学校的普及艺术教育，应基于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而做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在这种意义上，通识教育成为普通高校美育的一个良好路径。通识教育是国际教育界都在积极探索施行的育人路径。仍以文学教育为例，我在刚参加高校教学工作

时，就发现理工科学生的文学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还要好，直观体现为课堂教学的活泼和课后作业的干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污染”<sup>②</sup>，是用纯真的心灵去感受和体认文学。反观中文系学生的作业，“酸溜溜”的，以为这样才是有修养。在普及艺术教育中进行艺术史论的教学，首先要把握贯通的线索。在这一点上，合理运用观念史的方法是较好的切入点。一方面，艺术观念史实质上是人类文明史，另一方面，人类的创造性集中体现在历代艺术品之上；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往往未能得到充分重视。普及艺术教育如能抓住这两方面，把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通过艺术课程传递给学生，就是“人文素养”提升的高校美育路径，“以文化人”是在这里得以落实。艺术是世界语言，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中国需要快速地把握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这是可以通过艺术教育实现的，同时，艺术教育也有助于中国设计制造的产品，在重实用基础上，更富人性化。

**问：**您是如何理解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的“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这一论述与“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是什么关系？

**答：**育人、化人内蕴着对德育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善关系。汉字的一个特质就是包容蕴藉，“美”字有多元意涵，以至于每说一个“美”的时候，其所指都是不同的。具体到高校美育，“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中的“美”，在某种程度上与“善”是一个问题。从造字法角度看，“美”与“善”是同出一源，而据日本学者考证，“美”“善”都关乎远古祭祀活动<sup>③</sup>。教育部关于“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这一论述，可以通过具体的优秀艺术作品和优美的自然景观来落实，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里面一定包含德育。高校教育对德育的投入非常大，但课堂上的抬头率只有10%左右，这种情况必须扭转。中国人一定要懂中国的国情，一定要懂中国的政治，这是我做高校教育的一个基本信念。德育困境的一方面是师资问题，另一方面是教学内容问题。解决此两方面问题的关键，是在情感体验基础上，深化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在此过程中，教师如能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而有所引申，从而达到“纯洁其情感”的效果，则美育的目标就实现了。艺术教育的优势，是用真情去打动学生，来培育他们的真情。具体到理工科高校美育，就是一定要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学生在艺术上可能是门外汉，但他们整体的素养是非常高的，因此要想办法把课程提升转变为高水平的素养课，这就需要提高教师的水平。

**问：**您刚才所说的艺术观念史课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高水平素养课。问题在于这类课程似乎很难与艺术团、俱乐部等形式的实践体验进行有机融合。我们所探讨的高校美育课程讲授+实践体验的教学模式还有没有其他落实方式？

**答：**实践体验不必拘于艺术团和俱乐部，读书会、研读小组也都是很好的形式。作为985高校，读书会这种形式不能满足于走过场，一定要做出高水平：一是要读原典，包括外文原典和古文原典；二是要继承发展本学校的优良文化和作风，也就是校风。我知道，西北工业大学具有艰苦奋斗、默默无闻的传统。一所高校的传统需要在几代教师、几代学生共同努力下才能形成。校风建设直接关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它的形成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十年，而堕落则只需很少的时间。包括读书会在内的艺术实践体验，是延续学校优良传统的抓手，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问：**高校美育课程建设应怎样发扬学校传统、发掘地域优势，以把握新时代美育发展趋势？

**答：**在高校美育“从无到有”的阶段，课程以八门限选课为主，但若以建设高水平的高校美育体系为目标，则只有这八门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把这八门课开足、开齐并不难，普通高校不必与专业艺术院校相比，条件不同，普及艺术教育的难点在于走出本学校的特色道路，既要与本学校传统相结合，也要注意与地域艺术特色相结合。陕西的民间音乐、戏曲、手工艺都独具特色。你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在地域艺术中发掘符合工科学生特点的形式，进而建设能够满足工科学生需求的课程，也就是能够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课程。理工科高校美育除了有审美、人格等关乎人文素养、价值塑造的需求外，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是非

常重要的内容。我们知道，逻辑思维和创造性发展之间是有矛盾的，艺术教育则可以调和这一矛盾，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伟大科学家的艺术素养是非常高的。

**问：**公共艺术教育如何在技能的基础上，上升至关乎创造力的美育？

**答：**西方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逻辑在12岁左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它同时也是人身体快速发育的时期，但一个糟糕的情况是，在逻辑思维突飞猛进的同时，人的创造力急剧下降。中国人比较内敛，可能导致出现压抑自我表达和创造性的情形。由于长期得不到鼓励，进入大学后，学生的整体创造力会进一步下降。创造性的养成和发展需要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艺术教育是能够激发学生创造力的。在课程设置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自己来设计，如自己来创编简单的剧本或舞蹈等，为学生提供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鼓励学生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关于高校美育如何提升想象力和创造性的问题，可以用两句话做总结：施行教学民主，营造投入氛围。

## 注释

① 《屋外有热流》发表、首演于1980年，马中骏、嘉鸿源、翟新华编剧。该剧采取时间顺序颠倒和空间灵活转换，现实场景与回忆、梦幻的交替出现，以及非现实的舞台调度，多演区表演等新颖表现形式，受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欢迎，剧本曾获1980年首届全国优秀剧本奖。

② 中西美育传统都强调“净化”作用。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理工科学生“干净”、未受“污染”，和文科生“酸溜溜”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澄清美育规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③ “美”“善”在甲骨文中都从“羊”。“美”，有羊大为美、羊人为美等说法，《说文解字》认为，“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善”，羊下从二目或一目，目伪变为言，像两人或多人在说羊肉的美味。《说文解字》释“羊”为“祥”，“祥”即供奉于祭台上的羊。

## The Regular Features and Actualizing Ways of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in New Era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u Wei

**Du Wei   Li Zhi   Zheng Xin**

**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Plays a key part in one's all-round development, which can't be replaced. As the last station for most students stepping into the society, whethe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su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or not determines to a large degree the basic style and life in the future society. That the all-round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school'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Modernized Chinese Education in 2035 puts forward a new period demand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hich made the regular features and actualizing way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 an urgent practical problem to be solved. All the problems like facing every one,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urricula teaching and practice experiences, etc. in universities' Aesthetic Education should be returned back to the study of the regular featur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times.

**key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regular features; actualizing ways; stimulating interests

# 欧盟版权法改革中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问题研究

司 晓 曹建峰

**摘要:** 欧盟最新的网络版权立法《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不仅结合数字技术和网络服务发展对美国DMCA奠定的避风港规则进行了扬弃，将特定类型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定性为直接实施了向公众传播行为，从而有义务获得版权权利人的授权或者采取措施阻止侵权内容出现在其平台上。而且对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应用中为了文本与数据挖掘等目的复制、使用作品的行为进行回应，创设了新的合理使用情形。其对技术和商业模式发展中的版权新问题的积极回应，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版权指令；特殊责任机制；过滤义务；文本与数据挖掘；非表达性使用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3-0095-08

2019年6月7日，欧盟版权法改革的主要成果《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以下简称《版权指令》）生效，《版权指令》是继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之后，国际上应对互联网产业发展与版权保护新情况的首个重大成果。《版权指令》旨在应对互联网技术发展对版权保护的冲击，保障内容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欧盟数字市场一体化建设。本文旨在对《版权指令》中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制度——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的“过滤义务”和对网络爬虫、文本与数据挖掘、数据科学、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的版权规制——进行研究和分析。

## 一、欧盟版权法改革概述

### （一）《版权指令》立法过程及主要内容

2015年5月，为了抓住数字革命带来的数字机遇，欧盟委员会启动“单一数字市场战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旨在通过一系

列举措革新法律和监管政策，将28个成员国市场打造成为一个统一的数字市场，以促进欧盟数字经济繁荣发展。这一战略以三大支柱、十六项关键计划为核心。第一大支柱，旨在便利消费者和企业跨欧盟获取数字产品和服务，涵盖跨境电商、消费者保护、物流、地理屏蔽、电商领域反垄断调查、版权法改革、卫星和有线指令审查、税费改革等事项。第二大支柱，旨在为数字网络和创新性服务繁荣发展创造适宜的条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涵盖电信规则改革、音视频媒体制度审查、在线平台规则、个人数据保护、网络安全等事项。第三大支柱，旨在最大化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涵盖数据自由流动、标准和互操作性、数字技能等事项。<sup>[1]</sup>

版权法改革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2016年9月1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版权法改革的一系列提案，《版权指令》作为其中的核心提案，虽然在立法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抗议和反对，欧盟议会甚至一度投票反对该立法。但在经过激烈的立法博弈之后，欧盟立法者现代化欧盟版权制度使其能够适应技术发展的决心，最终胜过了各

**作者简介：**司晓，男，河南商丘人，腾讯研究院院长，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科技法；曹建峰，男，陕西咸阳人，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网络法、人工智能法律与伦理。

界的抗议。在经过2019年3月26日欧盟议会批准、4月15日欧盟理事会批准之后，欧盟历时两年多最终通过了《版权指令》。成员国需要在该指令生效后两年内将其转换为国内法。《版权指令》旨在实现三个主要目的：其一，促进跨欧盟获取在线内容；其二，扩大在教育、科研、文化遗产等活动中使用版权内容的机会；其三，完善版权市场机制。最终希望在新的数字环境下促进内容产业相关的创新、创造力、投资和新内容的生产。<sup>[2]</sup>

《版权指令》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第3—6条新增数字和跨境环境下的版权例外（合理使用），包括文本与数据挖掘、数字和跨境教学活动中使用作品以及文化遗产保存；第二，第8—11条规定了非流通作品的保护；第三，第12条规定了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旨在解决交易成本问题，促进作品许可；第四，第13条针对流媒体平台上的视听作品许可问题，提出通过中立机构或调解人等协商机制来促进此类许可；第五，第14条明确了公有领域的视觉艺术作品的使用问题，即除非衍生自公有领域的视觉艺术作品具有独创性，否则不能获得保护；第六，第15—16条规定了新闻出版商邻接权，要求新闻聚合等在线平台为使用新闻出版物（包括其中的部分或片段）向新闻出版商付费，以保护新闻出版商的组织和金钱投入。新闻出版物不限于文字作品，也包括图片、视频等形式。考虑到新闻的时效性，《版权指令》最终为这项邻接权规定了较短的存续期间，只有2年；第七，第17条规定了在线内容分享服务平台的特殊责任机制，将此类平台定性为直接从事向公众传播作品行为，为免于承担版权侵权责任，此类平台需要主动履行授权寻求、版权过滤等义务；第八，第18—22条规定了作品、表演开发利用合同中对作者、表演者的保护，包括公平合理报酬原则、透明度义务、合同调整机制、争议解决程序、作者、表演者的撤销权等机制。<sup>[3]</sup>

## （二）《版权指令》旨在应对互联网技术对版权保护的冲击，保障内容产业高质量发展

欧盟主要的网络版权立法《电子商务指令》和《信息社会指令》，制定于2001年之前。当时，网络搜索引擎服务还处在襁褓阶段，尚无社交网络、

视频分享、流媒体等如今风行全球的数字网络服务。然而，互联网技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给内容产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彻底改变了创作、生产、发行和利用作品的方式。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参与者持续涌现。如今，社交媒体、流媒体、新闻聚合、内容分享等互联网平台成为人们获取数字内容的主要渠道。在欧盟立法者看来，这给网络版权保护提出新的挑战，因为这些平台尤其是谷歌新闻、YouTube等长期以来免费使用新闻、视频等版权内容，在这些平台和权利人之间造成了所谓的“价值鸿沟”（value gap），因为按照既有版权规则，在线平台不需要向权利人付费。因此，《版权指令》希望通过一系列新的规则来弥合这一鸿沟，确保版权及相关权的权利人可以就互联网平台使用其版权内容获得公平合理的报酬。

更进一步，文创人员、记者、新闻出版商等是内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过时的版权规则导致新闻聚合、内容分享等在线平台收割了大部分利益，权利人却没有获得公平的报酬。《版权指令》加强了新闻聚合、内容分享等在线平台的法律责任，使其有义务、有动力与权利人达成公平的许可协议并向权利人支付报酬。同时确保权利人在维护其版权权利、获得公平补偿上处于优势地位，以便让更多的在线版权收益流向作者而非互联网巨头的股东，从而确保可持续的文创工作和媒体质量。

## （三）推行欧盟内部统一的互联网监管模式，制衡美国等国际互联网产业力量

欧盟《版权指令》立法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包括通过制定规则来推动利益再分配，并推行互联网规制的欧盟模式。具体而言，不满于美国互联网巨头长期从欧盟收割数据、版权内容等带来的巨大收益，新的《版权指令》通过革新版权制度促使美国互联网巨头向权利人分配其所应得的公平报酬，使权利人在互联网环境下继续受益。正如欧盟立法者所言，“个别公司依赖无数创作者和新闻记者的作品，赚取巨额的金钱（huge sums of money），却没有给予他们公平的报酬。对于纠正这一状况，本指令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2019年2月13日欧盟委员会、议会、理事会等三方

就《版权指令》艰难达成政治协议后，欧盟委员会在博客网站Medium上发文，回应舆论对《版权指令》杀死、终结互联网的质疑，斥责美国互联网公司鼓动欧洲民众杀死英雄（即新闻记者和文创工作者）、拯救恶龙（即大型互联网平台）。

更进一步，在单一数字市场战略之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版权指令》以及持续进行中的数字税、反垄断、涉及假新闻、政治广告的平台监管等一系列举措，旨在构建欧盟内部统一的互联网监管模式，以此削弱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地位，使面向未来的互联网惠及所有人，而非个别占据着市场优势的公司。这意味着互联网监管需要考虑国际竞争因素，正如Facebook高管马克·扎克伯格、雪莉·桑德伯格、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表示，政府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强监管（例如针对四大巨头GAFA启动的反垄断调查）可能危及美国硅谷科技行业整体的成功，因为有太多国家想要复制硅谷，所以监管政策需要实现平衡，避免失去硅谷的竞争优势。<sup>[4]</sup>

## 二、从“避风港”到“过滤义务”的网络版权保护范式转移

### （一）“过滤义务”的出台背景及主要规定

“过滤义务”制度是欧盟此次版权法改革的核心举措，也是最受争议的条款，受到了美国主流互联网企业的大力反对和抗议。其出台目的是降低“避风港规则”给权利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具体而言，在欧盟立法者看来，以YouTube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长期未经授权上传并传播大量版权作品，致使欧盟众多权利人利益受损。但平台商在法律诉讼

中往往以自己尽到“通知—删除”义务，符合“避风港规则”为由进行抗辩以免除侵权责任，并且“通知-删除”是事后措施，并不需要平台方承担事先的版权过滤义务。在通知删除规则下，权利人很难与平台方订立版权许可协议，更无法因其作品被上传而获取报酬，导致平台与权利人之间的“价值鸿沟”。于是，“避风港规则”的“庇护”引起了权利人组织的不满。

因此，《版权指令》第17条在避风港规则之外，为符合要求的在线内容分享平台创设了特殊责任机制，其目的十分明确：在线平台从版权内容中赚钱，却不补偿权利人，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继续存在下去。具体而言，该特殊责任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重新界定在线内容分享平台（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的性质。对于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究竟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而应受到《电子商务指令》第14条的责任限制规定保护，还是从事落入版权专有权范围的向公众传播、向公众提供行为而应承担直接责任，《版权指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即分享平台存储、组织、推广用户上传的大量作品以营利，是向公众传播、向公众提供行为，而非宿主（hosting）服务。对于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的认定，需要在个案中个别认定，考虑其用户、上传的作品量等，但从立法意图来看主要针对YouTube等视听内容分享平台。但不包括非营利的在线百科全书（如Wikipedia），非营利的教育和科学知识库，开源软件开发、共享平台（如GitHub），电子通信服务提供者，在线市场（即电商平台），B2B云服务，个人云服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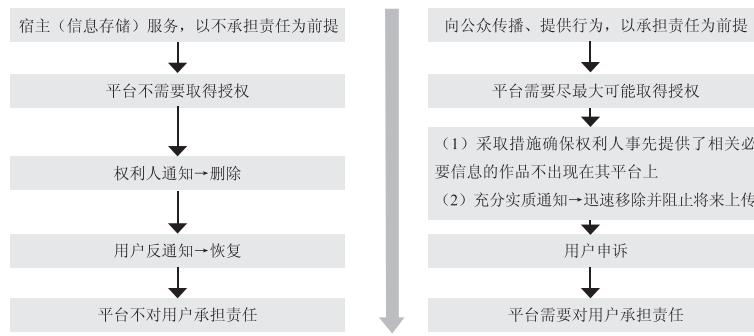


图1 避风港规则与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特殊责任机制对比

第二，构建以授权寻求义务和版权过滤义务为核心的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特殊责任机制。《版权指令》并没有完全颠覆关于“宿主服务”（即所谓的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避风港规则，即《版权指令》第17条规定的在线内容分享平台以外的“宿主”服务提供者依然适用通知-删除机制。因此，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的版权侵权责任不以遵守通知-删除程序或对用户侵权的明知、应知为限，而应对其实施的向公众传播、向公众提供行为承担直接责任，不论其是否知道用户上传内容未获授权。以此为基

础，为了免于承担版权侵权责任，在线内容分享平台需要证明其主动履行两项义务：一是授权寻求义务，分享平台应当与权利人签订许可协议，获得权利人的授权，而且不能预设用户上传内容已经获得了权利人的授权。二是版权过滤义务，如果未获授权，分享平台应当对于权利人事先提供了相关必要信息的特定作品，根据专业注意义务的较高行业标准尽最大努力阻止其出现在平台上，或者在接到权利人发出的充分实质通知后，迅速移除或限制访问侵权内容并尽最大努力阻止其将来被再次上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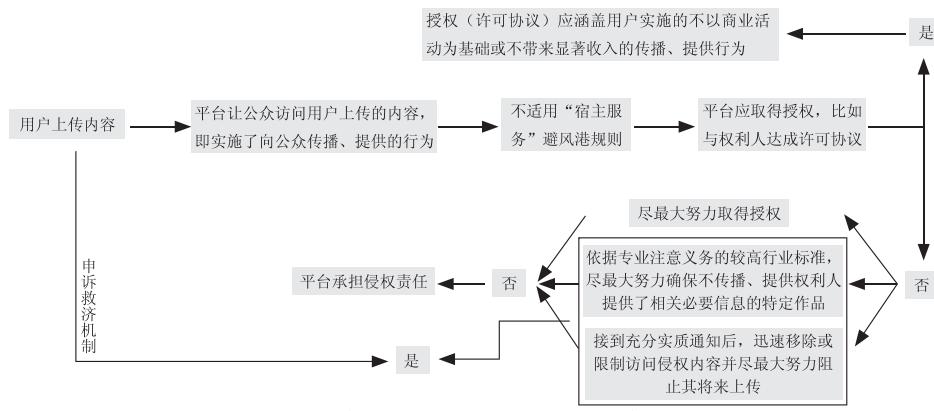


图2 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特殊责任机制

第三，平台不承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普遍监控义务。不承担普遍监控义务是美、欧版权法上的避风港规则的内在要求，《版权指令》继续遵循这一要求。按此，对分享平台上侵权内容的过滤，需要以权利人和分享平台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网络版权的保护需要平台和权利人之间的配合合作，《版权指令》相比美国DMCA而言走得更远，从基于避风港的合作机制发展到了基于特殊责任的合作机制。即权利人需要事先向分享平台提供必要且相关的信息，表明其是特定作品的权利人。对于权利人不明确的作品，不能期望平台采取阻止、过滤措施。即使其被用户上传，也不大可能让平台承担责任。

第四，对用户的保护和对创业型平台的豁免。《版权指令》给分享平台规定的过滤义务，不影响不侵犯版权或构成版权例外（合理使用）的内容的上传，例如meme、GIF等，因此引用、批评、评论、讽刺、戏仿或模仿，或其他合理使用均不受影响。此外，为避免过滤义务阻碍互联网创新，上线

运营不足3年且年营业额少于1000万欧元的创业型平台免于遵守新的过滤义务。但当其月独立访问者超过500万时，需要采取措施阻止用户将来上传被通知的侵权内容。

## （二）“过滤义务”的履行与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的自动过滤器

对于分享平台如何履行《版权指令》规定的“过滤义务”，法案并没有对需要采取的工具、人力资源、设施等进行明确规定，虽然《版权指令》最早的版本明确提出“可以采取有效的内容识别技术”，这被各界解释为《版权指令》要求在线内容分享平台采取上传过滤器（upload filters）来识别过滤侵权内容。但正如欧盟议会所言，“指令没有明确说明或列举需要采取什么工具、人力资源或基础设施来阻止未授权内容出现在网站上。然而，如果大型平台不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它们最终可能倾向于采取上传过滤器。事实上，一些大公司已经采取了过滤器。过滤器有时候确实有可能过滤掉

合法内容，但这是研发、部署过滤措施的平台的责任，不是设定立法目标的（即平台必须为使用内容的行为付费）立法者的责任。”<sup>[5]</sup>

欧盟议会提出说某些平台已经采取了过滤器，其实是指YouTube平台上的Content ID技术，简单来说，当用户上传内容时，YouTube会基于Content ID技术将用户上传的内容与平台作品库中的内容进行自动比对，如果发现涉嫌侵权，则告知权利人，由权利人决定是否允许用户上传。当前，随着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动化的内容识别成为可能且其准确性在不断提高甚至已经超过了人类水平。例如，Facebook等科技公司开始引入AI技术辅助互联网平台治理，采取AI技术自动审查、移除非法内容。经过训练的AI系统能够对大部分内容的违法性做出自动判断，从而自动阻止非法内容的上传和传播，并在用户投诉举报之前就移除非法内容。但在版权领域，自动化的识别过滤需要存在一个事先的作品库，否则平台无从采取AI等技术手段对用户上传内容进行比对，所以《版权指令》要求权利人事先向平台提供作品的相关必要信息。以微信为例，其对公众号原创文章的保护也是以平台上的原创作品库为基础，对于原创作品库之外的或者其他平台上的文章，公众号的原创保护机制无法进行识别比对。

美国DMCA制定之时，互联网技术尚在发展初期，也没有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避风港对互联网创新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如今，考虑到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步，欧盟给在线内容分享平台施加新的过滤义务，要求其考虑行业最佳实践，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来净化平台上的版权内容。当然，这需要考虑所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可行性、服务的规模，以及现有措施和未来技术发展。正如平台的注意义务需要考虑服务类型、行为类型、技术能力、权力类型等因素一样<sup>[6]</sup>，平台内容治理也需要考虑现有技术和未来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这样的治理既可以基于平台自身设定的平台规则，也可以通过类似欧盟《版权指令》这样的立法来推动。

### 三、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

#### （一）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的出台背景及主要规定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服务和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已经成为欧盟竞争力的核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甚至被认为是所有经济领域内实现经济增长和推动创新的催化剂，而文本和数据挖掘（Text and Data Mining，简称TDM）更是推动大数据时代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文本和数据挖掘技术在整个数字经济中非常普遍。新技术能够对数字形式的信息进行自动计算分析，例如文本、声音、图像或数据，通常称为文本和数据挖掘。文本和数据挖掘使处理大量信息成为可能，以便获得新知识和发现新趋势。而且随着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海量数据的学习和挖掘要求极为迫切。因此，高科技公司急需获得文本和数据挖掘例外，在不用担心著作权侵权的前提下可以专心进行技术的研究并促进高新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欧盟委员会专家组在2014年发布的报告《创新和技术发展尤其是文本和数据挖掘领域的标准化》指出，文本和数据挖掘对欧盟经济来说是一次重大机遇，大规模运用文本和数据挖掘将会为欧盟GDP额外增加数以百亿欧元的收入。

然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内容进行文本和数据挖掘方面面临法律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下，文本和数据挖掘可能涉及受版权保护的行为、受特殊数据库权利保护的行为，或同时受两者保护的行为，特别是复制品或其他客体、从数据库中提取内容、或两者同时发生，例如在文本和数据挖掘过程中数据被规范化。在没有例外或限制的情况下，需要权利人授权进行此类行为。

在这一背景下，《版权指令》第3和第4条规定了文本与数据挖掘的版权例外。第3条规定了为科学研究所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的版权例外，属于法定例外，不可通过服务条款、许可协议等方式禁止之。按此，研究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为了科学研究所目的进行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可对其可以合法访

间的作品、数据库等进行复制和提取。具体而言，此项例外的行为主体限于研究机构和文化遗产机构；行为目的限于进行文本与数据挖掘是为了科学的研究目的；行为方式是为进行文本与数据挖掘而对作品、数据库等进行复制（reproduction）或提取（extraction）；行为对象是可以合法访问的内容，包括通过订阅协议、开源许可等方式获取的内容，也包括网上免费可获取的内容。行为主体还需履行一项附属义务，即存储复制件应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并可为科学的研究目的（如验证研究结果）而保存复制件。此外，权利人为避免网站被大量爬虫爬取而威胁到其服务的安全和可用性，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系统安全完整。

第4条则规定了有条件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该例外不限制行为主体和行为目的，为文本与数据挖掘目的而复制、提取可以合法访问的作品、数据库等，即属于版权例外。但权利人可以保留为文本与数据挖掘目的而复制、提取的权利，即对于网站上公开提供的内容，权利人可通过机器可读方式来保留这一权利，包括元数据（metadata）、网站的服务条款等。其他保留方式包括合同协议、单边宣言等。这意味着商业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必须尊重版权权利人的意志，否则即可构成侵权行为。

## （二）明确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数据与作品利用的法律保护边界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和应用离不开数据的“喂养”，所以实践中大量存在利用网络爬虫从网上爬取数据或其他方式获取数据并用于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系统训练或其他商业目的，因此明确数据与作品的利用边界对于促进创新和技术发展意义重大。欧盟早在1996年就制定了《数据库保护指令》，创设了数据库权这一特殊权利，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从受保护的数据库中提取、复制数据。此次的《版权指令》区分科学的研究目的和商业目的，进一步明确了文本与数据挖掘、数据科学、机器学习等技术应用中复制、提取作品和数据的版权保护边界，一方面为相关技术研发应用活动提供了法律确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放开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例外，确保欧盟在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科学领域与

美国等竞争时不会受到不合理的法律壁垒限制。

更进一步，数据合理使用和数据不当使用的边界需要明确。根据《版权指令》，数据合理使用须是为了文本与数据挖掘目的，且商业性使用须尊重权利人的意志和保留权。而不当获取与利用数据，根据国内外司法判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未经许可或超出许可，采取侵入的方式获取非公开数据，通常表现为侵入服务器、破解或规避技术措施或者使用他人ID、密码等；二是采取爬虫等手段复制、抓取数据，一般针对公开数据。根据前述判例，法院在认定这些行为的不正当性时一般采取两个测试标准：一是实质替代标准，即将获取的数据用于足以产生替代效果的竞争性产品、服务，此标准主要体现在大众点评系列案件中。二是正当商业利益标准，其出发点是企业对其投入劳动搜集、获取、加工、整理、生成的数据和数据产品享有竞争法上的财产性利益，他人未经授权予以利用具有不正当性。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诉Associated Press一案中所表达的观点，信息、设计等无形物可以因劳动、金钱等投入而产生一种“准财产权”（quasi-property right），从而可以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他人不当盗用。<sup>[7]</sup>

## 四、启示

### （一）版权制度应因应人工智能对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变革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版权制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工具的层面，互联网平台在加强平台治理、保护网络版权方面的技术能力在不断进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都可以为网络版权保护提供创新性的思路，欧盟《版权指令》中过滤义务的提出也是基于现在和未来技术发展的考虑。这意味着，在现在的技术背景下平台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和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也许正是既有的版权避风港规则不断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所在。所以在工具的层面，平台规则、技术方案、代码、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在网络治理方面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正如莱斯格在《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中所

言，代码比法律更高效地调节个人行为、规制网络空间。然而，技术的深入应用也可能导致技术工具与法律规范界限的模糊化。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智能合约、区块链等技术对数字世界的影响，可以看到区块链甚至可以承担法律的功能，代码不仅被用来执行法律规则，还被用来制定和阐明法律规则，例如智能合约可被用来效仿或者模仿法律合同的功能，使得法律与技术规则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因为智能合约既可以支撑、也可以代替法律合同。所以有人声称，区块链技术可能导致一个以自治规则代替传统法律的社会。这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第二，规范的层面，人工智能对版权制度的影响不限于作品创作即所谓的AI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问题，也包括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应用中对作品的非表达性使用（non-expressive use）和前置的复制行为的正当性问题。例如，如果一个AI系统通过免费方式复制、学习某个知名歌手的所有歌曲来创作出一首类似风格的歌曲，复制行为是否侵权？原歌手能否就AI生成的新歌曲主张权利或者版权利益？随着内容创作的版图从人类作者中心主义扩大到“非人类作者”甚至将来可能过渡到“非人类作者中心主义”，版权制度必须对所有这些问题予以回应。将版权合理使用的辐射范围延伸至文本与数据挖掘，仅仅开了一个头而已。在AI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方面，目前国外很多国家如英国、南非、印度、新西兰、爱尔兰等，都已将计算机生成内容（包括AI生成内容）纳入了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例如，英国采取拟制作者的方式，规定对于计算机在没有人类作者参与的情况下生成的作品，为创作该作品作出必要投入的人视为作者，一般为软件开发者。其理由是“一些计算机程序能够在人类参与较少的情形下进行内容生成已成为现实、技术的未来发展对版权法的长期适用构成挑战、版权法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而根据南非最高法院的观点，版权法保护计算机生成内容的合法正当性不在于创作该作品的计算机，而在于使得该计算机能够创作出该作品的人类主体，意味着AI生成内容凝结着开发者的智力投入。目前的趋势是，欧盟、日本等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始考虑AI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以激

励技术创新和保护AI相关的文学艺术创作。此外，借鉴欧盟和美国的做法，我国将来在修改著作权法的时候有必要增设文本与数据挖掘等随着技术发展与应用而出现的新型合理使用情形，并规定一般概括式的合理使用制度，以使合理使用制度能够适应技术发展并保持足够的适用张力，合理平衡版权保护与产业发展。

## （二）合理审视网络平台的版权保护义务

就当前而言，视频聚合、分享网站尤其是短视频分享网站给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带来巨大冲击。在避风港规则之下，它们一方面没有义务和动力向权利人付费，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和支付了高昂许可费的正版视频网站之间的公平竞争，不利于在线版权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类分享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等手段，最大化地传播用户上传的视听内容，是否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意义上的“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值得深入检视。当前，美国、欧盟等都在反思美国DMCA奠定的避风港框架的有效性，欧盟率先跳出避风港框架，加强了视听内容分享平台的版权责任，无疑会对避风港规则的革新产生示范效应。

就我国而言，国家版权局已经推行多年的“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要求相关网络服务商应对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重点作品采取以下保护措施：直接提供内容的网络服务商未经许可不得提供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作品；提供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商应禁止用户上传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作品；提供搜索链接的网络服务商、电子商务平台及应用程序商店应加快处理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作品权利人关于删除侵权内容或断开侵权链接的通知。这其实已经超出了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加强了部分网络平台的版权保护义务。可以在此基础上，在著作权法修订中考虑适当加强直播、短视频等视听内容分享平台的版权责任，除了遵守通知删除程序，还应履行版权过滤义务，更积极主动地与权利人合作，采取可行的措施，尽到最大努力阻止侵权内容出现在其平台上并阻止用户将来再次上传。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使受到规制的网络平台和版权权利人更密切地合作，克服传统避风港规则将版权保护义务过度分配给版权权利人带来的弊端。

的弊病，从而实现更高程度和更高效率的网络版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和良性发展的网络版权市场环境。

## 参考文献

- [1] 曹建峰. 欧盟如何为繁荣数字经济打造统一的数据法律规则? [EB/OL]. [2019-6-15] <https://zhuanlan.zhihu.com/p/47611114>.
- [2] European Commission, Modernization of the EU copyright rules. [EB/OL]. [2019-6-15]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modernisation-eu-copyright-rules>.
- [3]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EB/OL]. [2019-6-1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L0790>.
- [4] CNN Business, Google CEO reacts to looming US antitrust probes for first time. [EB/OL]. [2019-6-17] <https://edition.cnn.com/2019/06/14/tech/sundar-pichai-google-antitrust/index.html>.
- [5] European Parliament,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issues about the digital copyright directive. [EB/OL]. [2019-6-17]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190111IPR23225/questions-and-answers-on-issues-about-the-digital-copyright-directive>.
- [6] 司晓.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J]. 法律科学, 2018(1):78-88.
- [7] 曹建峰, 田小军. 从国内外典型数据保护案例看如何保护企业数据权益[EB/OL]. [2019-6-19] <https://mp.weixin.qq.com/s/paqSCnfZmctZoG8pkBv8kA>.

# Study of Big Data and AI Issues in EU Copyright Reform

**Si Xiao    Cao Jianfeng**

**Abstract:** EU's latest copyright legislation, i.e.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not only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DMCA safe harbor rul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online services, stipulating that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perform an ac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therefore having the obligation to obtain license from copyright holders or take measures to avoid the availability of copyrighted works on its platform; but also responded to the reproduction and use of copyrighted works in data science and AI applications,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for copyright exceptions. Its proactive response to new copyrigh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an provide inspirations and lessons.

**keywords:** copyright directive; special liability mechanism; filter obligation; text and data mining; non-expressive use

# 智能算法专利保护的制度探索

蔡琳

**摘要:** 智能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 算法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智慧”基础, 其自主决策功能, 使决策规则承担了秩序规范的作用。由于智能算法技术的高度专业性及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 智能算法尚处于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 形成“算法黑箱”与“算法合谋”, 将算法法律的构建引至“限制”与“防控”的导向。然而,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灵魂”技术, 从根本上决定着智能社会、智能经济的发展, 也决定着在世界智能革命的格局中, 中国的话语主导和角色地位。因此, 在算法规制的制度构建外, 算法技术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也是法治回应智能革命命题中的应有之义。而现有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法律能够给算法提供保护的制度空间十分有限, 专利法以“公开换保护”的制度“机能”既能够防范“算法权力”的社会风险, 也能够激励算法技术的发展。因此, 研究算法专利保护的制度优势、算法可专利性客体的制度确认、可专利性的法理支撑及现有专利法律的制度协调, 并提出算法专利保护制度建议, 对算法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算法; 专利; 智能革命; 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 (2019) 03-0103-09

算法一词原生于数学领域, 指代数字解算的方法与步骤, 传统的数学算法表现为数字运算的定理、公式、数字关系的逻辑分析等, 因此传统的数学算法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思维规则和运算方法。因此一直不能够作为专利的客体而得到专利法的保护, 甚至不能够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来确定算法知识的权属。随着计算机学科的兴起, 算法这一概念从传统的数学领域被引入到计算机领域。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程序算法技术研究, 预言了智能时代的到来。美国计算机学家冯·诺伊曼(1957)将智能定义为“可计算性”, 暗含了智能算法的内涵。2016年世界范围内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全面“爆发”, 被称之为人工智能技术元年, 智能革命在人们的持续关注中已轩然到来。人工智能技术被称为21世纪三大尖端技术之

一, 这也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这一技术本质便来源于人工智能最为核心的算法技术。区别于传统的数学算法, 称为“智能算法”, 也可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简称为“算法”。

人工智能的任务是了解自然智能的工作方法和步骤, 并制定模拟人脑思维和信息交互的智能创造。<sup>[1]</sup>人工智能的实现主要依靠两个重要元素, 一个是人工智能的“经验”素材, 提供给机器学习的大数据; 另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智慧”来源, 提供自主决策的算法技术。可以说, 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砖瓦, 算法技术就是人工智能的设计图纸。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智慧”需要通过算法来显现。当下,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在创建模型和模仿自然界发现的过程中, 使算法拥有自我进化功能, 甚至复制大脑思维的特点, 并实现仿生算法, 如遗传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话语体系下算法的法律规制研究”(19XFX001)

作者简介: 蔡琳, 女, 陕西杨凌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法学系副主任,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

编程和人工神经网络。<sup>[2]</sup>一系列以仿生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产品及技术方案的商业化应用，无不催生着商业领域的新模式、新业态，为商业形成新的盈利点，促使社会大众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因此，在人工智能社会，算法不仅是一种新型技术，更代表着新的商业模式与方法，向传统商业发起挑战，也成了智能社会中商业角逐的工具和市场地位的保障。这也决定了算法的保护将成为智能社会商业竞争的核心与关键。

## 一、智能算法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选择

人工智能的两大要素为大数据和算法。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素材基础，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智慧”核心。可以说人工智能的时代，是算法技术引导社会发展、变革的时代。智能算法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及产业化应用，催动了智能社会的到来。在目前的智能社会中，算法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交易、无人驾驶、信用评级、贫困扶助、教育招生乃至司法审判等各个行业领域。智能算法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社会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带来了行为模式、商业模式甚至司法模式的变革，算法技术成为智慧社会的“生产力”。特别是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等算法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因其高度专业性及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容易形成“算法黑箱”与“算法合谋”，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大众对算法技术的担忧。这也将算法立法的研究导向，引入“限制”与“防控”的视域范围。

因而从保护视域来审视算法技术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算法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创新技术，知识产权对其的制度回应及优势路径选择，却没有受到高度重视。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灵魂”技术，从根本上决定着智能社会、智能经济的发展，也决定着在世界智能革命的格局中，中国的角色定位和话语主导地位。智能算法的激励发展是算法法律制度构建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知识产权体系中探讨智能算法保护的法律路径选择成为当务之急。

### （一）智能算法著作权保护路径与价值冲突

智能算法产生于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开发，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明确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的便是著

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也将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指向著作权。软件是计算机程序与算法的综合体，即程序、算法、数据结构三者的结合。任何软件都需要至少一个可运行的程序，智能算法则是程序运行的方法与步骤，是程序的灵魂。算法虽然可以通过软件，以实现“方法”思想外在表达的著作权保护，却只能以代码作为权利的边界，保护的范围也仅限于代码的实质差异。而算法之所以能够引起智能革命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其代码组成，更重要的是算法用以实现智能化决策的技术方案和手段。因此，著作权法保护的价值导向与智能算法受保护的价值根源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基于以上根本冲突，通过著作权路径来保护智能算法，在制度层面引起的首要价值矛盾便是合法私权与公益风险之间的矛盾。根据《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一系列著作权国际公约，及各国依据著作权相关公约最低标准制定的国内法，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著作权自动保护原则。作品一旦生成，便自动获得著作权，形成一种合法的既有权利。智能算法如果按照著作权进行保护，算法软件的代码一旦完成且具有独创性，便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虽然著作权制度中也存在保护的例外情况，例如违反社会公益等，但在制度实际运行过程中即便是违反社会公益的作品，只要具备作品的要素，除非违反事实被知情并经司法确认，否则通常会被推定为“合法权利”。这一原则就文学艺术作品而言，权利合法推定即便存在问题，也不会造成普遍性或者说非特定指向性的损害，只需要在个案中宣告该作品不受法律保护即可。但算法基于其深度学习和自主决策的要求，常常被研发者依据其设计思维嵌入了算法秩序的价值判断。如若价值判断存在“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问题，而该算法软件却在商业活动甚至司法过程中，被推定为合法著作权而广泛应用，则会带来社会公正及公共利益的严重挑战。其损害涉及范围无法通过个案来解决，从而将公益置于风险当中，形成公益风险。因此依据著作权来保护智能算法，极容易引发算法权利人私权使用与公共利益实现之间的价值冲突。

可能引起的第二位冲突表现在保护需求与制度

供给之间的价值冲突。根据著作权相关国际公约及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思想和表达在著作权保护范围中被严格界分，著作权法无法对智能算法软件的决策逻辑进行保护，仅可以保护其代码组合，代码的变动如果构成著作权要件的独创性，则变更后的软件可以采取保留其算法技术方案，仅改写代码的方式来完成新的著作权创设，便出现了保护漏洞。这与智能算法著作权保护的利益期待相去甚远。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代码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传统的算法保护相关制度已经无法全面规避侵权风险。<sup>[3]</sup>

## （二）智能算法商业秘密保护路径与权利自决的悖离

智能社会倏然到来，新一轮的商业结构和商业竞争由智能算法带来的新领域、新业态所引领。智能算法成为新一轮的决胜技术和关键竞争力。目前已经有大批智能算法技术被投入到商业及社会应用当中。对于促使新型商业模式生成的核心算法技术，多数的商业主体选择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路径。由于智能算法并非传统的有形产品型商业服务，而更多属于数字服务，提供给社会大众的服务形态表现为算法决策的方案和结果。因此在目前算法规制缺位的法律状态下，算法决策的方案逻辑及判断素材尚无充分披露的制度限制。算法被自然地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之内，甚至优先于被决策者的充分知情同意。

商业秘密的核心构成要件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和能够带来经济价值。智能算法目前正处于深度开发的技术趋势之下，具有关联技术特征，形成完整技术方案，能够达到自主学习决策的智能化水平，便很容易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于是算法技术的持有人，将商业秘密保护作为算法保护的首选路径。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众多制度路径中，为数不多的没有时间性限制的保护路径之一，再加上高度仿生算法技术的不透明性和不可解释性，难以在技术层面被反编译，因而智能算法容易维持技术应用或商业模式的领先及垄断状态。也就是说，商业秘密保护算法，会导致算法决策过程的保密性与以充分知情为同意前提的私法自治之间，发生价值冲突，以合法的外在形式对权利自决形成阻碍。

这一法律问题的具体表现为：因技术利益优于自决利益，使“算法黑箱”合法化，容易为“算法歧视”形成“庇护”。智能算法通常具有智能决策和判断的双重功能，其价值判断标准和运算规则形成了算法决策秩序，并转化为新的行为秩序。例如如果网约车领域的智能算法，将投诉率作为服务收费的关键标准，便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公众减少投诉。但算法设计者们是否会完全公正地把法律、伦理道德写入程序，仍处于存疑状态<sup>[4]</sup>。社会公众被严格保密的算法秩序所引导，还无法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是否允许决策的同意。算法黑箱成为算法权力和算法歧视的合法掩护。例如，新奥尔良市的安保公司Palantir，使用人工智能为警察局预测犯罪活动，使种族偏见思想被带入决策过程中。此外，算法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技术失误、设计者的偏差都有可能使算法做出错误的，歧视性的自动化决策。<sup>[5]</sup>发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著名案件State v. Loomis，法院选择了保护算法商业秘密，而否定了律师要求公开算法决策依据和算法运行规则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私权自决和救济的途径。案件发生后，ProPublica组织对该案中使用的COMPAS算法进行了分析，黑人的犯罪几率几乎是白人的两倍，被认为是否存在歧视的算法。<sup>[6]</sup>无论是当事人对于算法决策规则的知情权，还是充分知情后选择是否被决策的决定权，甚至于被决策后的权利救济，都淹没在商业秘密的利益光环之下。缺少充分知情的自动决策还可能导致许多人被算法忽略、遗弃，无法享受同等的保险、贷款服务。<sup>[7]</sup>而这些不公正待遇却难以在现有法律体系中被诉诸侵权责任，催生了智能算法控制者的“算法暴政”。<sup>[8]</sup>目前兴起的可解释性算法研究便是为了应对“算法黑箱”问题，而其法律桎梏则归根于商业秘密优先于私权自决导致的冲突。

## （三）智能算法专利保护的制度契合性

目前针对智能算法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制和权利设定，由于智能算法具有技术属性，经常作为一种创造性技术进行权利归属分配和保障，人工智能背景下，算法的保护，理应由知识产权制度来完成与回应。各国的法律体系也基本都采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完成这一目标。因此算法

技术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着天然的应和性。知识产权具有“权利束”的特征，可提供多种路径来规制和保护算法。遗憾的是，通过上述分析，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与算法技术紧密相关的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制度路径，都存在价值冲突导致的制度困境难以逾越。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够提供的保护范围和力度也十分有限。

特别是商业秘密保护路径下，一旦未来可解释性算法或解释算法的算法技术开发成熟，则通过反编译被他人申请专利的风险，可能导致商业地位的颠覆性变化。唯独专利法以“公开换保护”的制度“机能”，既能够防范“算法权力”的社会风险，也能够激励算法技术的发展。从现有专利制度来看，通过协调现行专利法规则，排除可专利性制度障碍，构建智能算法保护的专利路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 二、智能算法专利保护的法理基础与理论重构

知识产权制度创设便具有国际人权的意义。“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76年生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秉承联合国建立的人权原则和标准，参照《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提出了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三项人权，即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享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利益的权利、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sup>[9]</sup>虽然知识产权是否属于人权，各国的国内法律规定不一，但最终知识产权还是得到了国际人权公约的认可，并且将创造者的权利排位于社会公众实现文化自由和享受科学进步利益之前，作为知识产权视域下三项基本人权的前提条件。可见，创造者权益的保护是人权命题中的应有之义，且相较于社会大众的自由、利益等权益，具有优先地位。

专利制度将发明创造作为保护的对象，围绕智力发明创造展开发明人、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的三维度全过程保护。智力发明创造可以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个方面，却不包括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这是由于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通常属于思维逻辑的范畴，若通过专利权来实施创造者的思想

垄断，一来立法无法实施，二则超越法律的边界来规范思想，与基本的法理不符。

由于传统知识产权理论强调：创造者权益优先，以及智力活动规则不受法律保护，导致既作为创造又作为仿生智力规则的算法，在面临这两个理念的时候，出现矛盾与冲突。一方面根据保护创造者权利的理念，人工智能无论是算法规则、算法软件还是智能产品，都应因其创造性、实用性和新颖性受到专利法的保护；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奠基人图灵创设的“图灵验证”为标准，智能的基本要求便是能够模拟人脑进行思维做出决策，甚至还要求排除人脑思维决策过程中的致错因素，得出比人脑更优的决策与选择。因而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智力活动规则，却因为其思维属性，应当被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sup>[10]</sup>从而在保护理念和原理中形成冲突，导致对是否应当进行专利保护产生分歧。

理念的分歧影响着专利实践。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授权量为17477件，其中算法专利授权量为1378件，仅占比7.9%。<sup>[11]</sup>仔细分析已被授权的算法专利，大多在算法技术的权利要求书中弱化了智力活动规则的成分，而将智能算法包装为软件加设备的技术方案而获取授权。

《专利审查指南》将技术方案与智力规则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与工业生产技术联系较为紧密的计算方法被认定为技术方案，例如，“一种扩充移动计算设备存储容量的方法”“一种使用计算机程序测量液体黏度的方法”等。可以看出这些被认定为技术方案的算法，其计算机运算的部分仅为该技术方案的工具，其目的是解决工业生产中的技术指标，并非算法规则本身。而与工业生产关系较为疏远的部分，例如，“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率的方法”“一种计算机游戏方法”则被视为属于智力规则的范畴。探索这一区分的制度机理，则印证了对智能算法可专利性的担忧。在目前制度中，智能算法要么选择淡化其模仿智力活动的本质，弱化保护范围，要么则仿照“一种计算机游戏方法”被视为智力规则，而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

创造者权利的人权保障和思维保护除外理念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人工智能算法的创造和发展，更会影响智能社会的推进和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根

本路径在于在智能革命的时代浪潮下，进行理论的重组与调整。

首先，算法的智力创造本质理论。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创造者的权利排位于社会公众实现文化自由和享受科学进步利益之前，这一点作为人权理论与知识产权理论的深度融合，在智能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中可以部分参考。就专利制度而言，专利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保护以智力创造成果相关的创造人、申请人和专利权人，在这一前提下，注重社会公益的保障，平衡专利相对人享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利益，成为必要。因此，智能算法作为推动智能革命的核心技术，采取专利法的保护路径最符合知识产权的制度结构和价值。否则智能社会必然成为无序竞争的社会。

其次，权利顺位与利益平衡理论。传统的专利法基于国际人权公约的价值理念，始终坚持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享有法律保护权利的前提，因此在划定智力规则和技术方案的时候，严格按照专利客体的三性特征，以及客体范围的除外规则，来判断算法专利申请的可授权度。然而智能革命推动的智能社会亦称算法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因技术革新而导致的风险社会。<sup>[12]</sup>算法技术比以往社会中任何一种技术应用，更加具有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算法的价值判断和算法的秩序构建作用。因此，传统的专利理论将创造者的权利保护，作为公众享受科技进步利益的绝对化前提，在风险社会中无法完全适用。算法技术对于公平、平等、私权等基本法律价值带来的潜在风险，使得智能社会中算法技术的保护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优先原则，而是要确认对算法技术保护的同时，进行社会风险的防控与治理。因此智能社会中算法专利申请的必要公开、算法专利审查的价值风险排除等理念，应当成为人权化知识产权法理内容的重要补充。

再次，算法属性的二元结构理论。创造者知识产权保护过程融入算法本质的二元属性，算法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设计而成的仿生计算程序，例如人类神经网络算法。它会脱离人的主观思维，依靠计算机进行数据计算和处理。<sup>[13]</sup>算法不同于纯粹的抽象思想，其本质上能构成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方案，兼具技术方案和思维规则的二重属性。由此智

能算法总是在可专利性与不可专利性之间徘徊。算法不应当以纯粹的思维规则作为其本质界定，而应当以技术方案为首要本质属性，并基于此确立其可专利性。

### 三、智能算法的可专利性验证

目前的专利法并非完全排斥智能算法的专利申请。涉及智能算法的专利申请，基本均以算法“变异”的方式进行。用于推广智慧停车的车辆自动识别算法专利，将算法包装为程序软件获得专利授权。百度采用与设备结合的变异方法，将名为“一种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的方法及设备”的算法，包装成算法与设备的结合，以满足现行专利审查指南的要求。<sup>[14]</sup>可见，在现行专利法的框架下，以算法来申请专利，其权利要求书中列明的技术特征，不能仅仅反映算法计算规则的内容。否则将会被认定为属于专利法排除在客体范围之外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而无法获得授权保护。

“基于马尔科夫决策过程模型的生物芯片出错检测方法”的专利申请案例，对于智能算法的“改装”专利申请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并不是将算法简单地与设备结合就一定可以获得专利授权。该算法没有与设备紧密结合，它并不对生物芯片及其操作过程直接检测，而是对生物芯片的检测数据进行算法处理；其次，该专利申请仅仅将权利要求的描述限定于算法参数和算法模型本身，被视为是单纯的算法而归入“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范畴，<sup>[15]</sup>未获得专利授权。

这些案例从正反不同层面验证，虽然从法理层面，不能将智能算法单纯地认定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专利法也并未完全拒绝智能算法的专利保护要求，但智能算法的可专利性在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问题。

首先，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单纯的智能算法仍然被归入“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而无法获得保护。这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算法被认为是一种人类思维过程的仿生技术，可以替代人类思维与决策，虽非真正的智力活动，但通过仿生，其目标便是实现与人类大脑一致或更优的思维

过程，与智力活动的规则或方法十分接近。

其次，智能算法与设备或非算法类技术方案相结合，在权利要求中不仅涉及算法规则的抽象内容，还需要涉及算法与设备之间的关联内容，以及算法对于非算法类技术方案的贡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智能算法才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方案，而非智力规则，才有可能获得专利授权。这种实践操作范式，仍然未对算法属性的双重结构进行充分考虑。二元属性问题的核心在于：算法作为人工智能技术方案的技术属性，还是模仿人类思维过程的“智能”思维属性，在算法技术及法律认定中处于关键地位。

根据算法可专利性的案例验证，算法专利保护的法理基础，与算法可专利性的实践认同，存在较大的差异。算法可专利性制度确认的最大障碍来源于实践领域对智能算法“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惯性认知。在专利三性方面智能算法与一般技术方案之间并无巨大差异，也无特殊风险。因此，通过专利制度的调整来“接纳”智能算法，使其不必通过与设备的结合来实现权利要求，在专利保护的基础理论上存在可行性，对制度实践具有必要性。

#### （一）有利于将算法技术的核心内容全部纳入专利的范围

通过专利制度保护算法，可以克服著作权保护的“表达”限制，将算法产生技术利益的核心内容，纳入保护对象，从而为算法的技术创造者和持有者提供最为完善的知识利益保护，推动智能社会的发展。仿生的思维逻辑设计与决策过程构想，是算法技术中最具创造性的环节。技术发明人真正渴望保护的是程序背后的算法，而不是该代码。<sup>[16]</sup>专利制度保护的不是技术的载体或其表达方式，而是算法作为技术方案，呈现在权利要求书中的一系列关联技术特征。通过专利制度的协调将智能算法作为专利保护的适格客体，有利于将算法技术的核心内容全部落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排除算法依附于某种设备才能将核心内容纳入保护范围的不利影响。

#### （二）有利于将算法价值判断与公众利益平衡纳入专利事先审查

通过专利制度保护算法，可以在专利授权审

查的过程中，完成算法伦理价值的事先审查，在协调创造者权利保护前提与社会公众享受科技进步权益之间的理论关系上，既通过可专利性保护了创造者的在先权益，又在专利公开及专利审查的过程中以“公众利益”为原则，保障社会公众享受科技进步成果的同时，还免受“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算法权力”的困扰，而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避免这些问题随着算法技术的无门槛应用而造成社会风险。例如美国在教育领域探索数据驱动能力分组方式（data-driven ability grouping），但研究表明，算法决策可能会创造出系统性不公平的新群体。例如，色盲的学生在计算机任务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如果通过分组算法预测教育前景，算法决策可能使他们受到歧视，对教育公平造成挑战。<sup>[17]</sup>如果该算法提出了专利申请，则可以通过事先审查，并以公共利益为由拒绝授权，有效预防歧视性算法特别是在关键领域中的无门槛应用，还能够通过理论演进，使创造者与社会公众的人权化知识产权权益，实现有先后之分，无位阶之异，而满足人工智能风险社会的知识产权要求。

综上，人工智能背景下算法的可专利性具有法理基础，根据人权化知识产权理论应对智能社会的理论演进，可专利性在三性考察中并无特殊风险，在智力活动规则除外适用中，也有排除适用的理论依据。智能算法可专利性的制度确认，具有多方面的制度价值和实践必要性。因此专利法律应对智能算法保护需求，而进行规则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专利制度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一种回应。

## 四、智能算法专利保护的制度回应

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与技术发展具有密切地联系。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带来社会经济形态、商业模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因而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知识产权保护路径，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确认。<sup>[18]</sup>对于专利制度而言，更应当推动技术开发和专利保护的良性循环。因此，当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塑造出全新的智能社会形态，专利制度也应该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需求，进行理论演进、价值调整

和制度革新。<sup>[19]</sup>

### （一）确立智能算法创造者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的保护原则

我国《专利法》第一条将专利法的立法宗旨规定为：“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正在举行的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根据已经公布的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这一立法宗旨和目标得以完全保留，并未计划进行改动。从目前的目的设置来看，专利法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以广泛的授权保护来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立法目标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美洲人权利和义务宣言》，以及197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中设立的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三项人权，及其顺位相符合。意在将专利权人的利益作为“社会公众享受科技进步权益”实现的前提条件。

虽然专利法第五条将违反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排除在专利授权范围之外。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第十四条也明确禁止损害公共利益的专利权行使行为。但也仅仅将对公共利益具体地妨碍或损害，作为公众利益优先保护的条件。类似于算法技术带来的人工智能风险社会，这种宏观的、抽象的未来风险，却并不包含在公共利益优先于创造者或者专利权人的条件之列，甚至并未与创造者权利的保护审查同时考虑。

这一制度安排符合智能革命之前的非风险社会，坚持技术工具和技术中立主义的价值理论，却与智能革命带来的高度风险社会，所坚持的技术规制主义相去甚远。智能社会基于其风险社会的根本特征，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论应当做出一定的回应和调整。首要调整的就是在智能算法寻求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将表现为公正、平等、私权自治等抽象价值的社会风险防范，转化为公众权益保护的需求，与创造者权利保护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表现在制度层面就是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过程中，加入体现人工智能社会的专利条款，确立智能算法创造者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的保护原则，通过该原则的实施将创造者与社会公众利益，转化为同位阶调整的范

畴，而取消优先与顺位之分。

### （二）明确将智能算法纳入专利保护的客体范围

我国专利法第二条将专利保护的对象定义为“发明创造”，并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的对象包括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实用新型的对象仅包括产品，不包括方法；而外观设计的对象也仅限于产品。

在目前的专利审查过程中，只有将算法运算的抽象规则与具体的设备结合，以提出产品与方法结合的专利申请，才具有专利授权的可能性。那是由于智能算法的可专利性存在争议，而在实践中采取的变通措施。要推动智能技术、智能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我国智能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主导权，就需要通过专利客体制度的对应调整，以直接地、明确地将智能算法的核心内容纳入专利保护的范围。

以智能算法保护为目标进行专利客体范围的制度调整，首先应当在专利法的客体范围条款中明确将智能算法纳入专利保护；其次，应当明确，人工智能算法的技术方案属性优先。并且这一技术方案属于方法类技术方案，其技术特征围绕着抽象运算规则而展开。因此，纯粹智能算法的专利申请，应当通过发明专利中的方法专利来提出。最后，明确智能算法作为技术方案，虽然通过规则修改直接被纳入专利保护客体的范畴，但智能算法仍然与其他任何专利申请一样，应当符合专利三性的标准才能实质上具备可专利性。

### （三）设置“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的除外条件

我国现行专利法第二十五条中列举了六项专利授权的例外情况，其中第二项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在《专利审查指南》（2017）中，进一步对“智力活动”进行界定，并将既包括智力活动规则又包括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排除在“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除外规则之外。这也促成了现有智能算法通过结合产品技术特征或技术方案的方式来申请专利保护的现象。其第九章第二条还明确将仅包含计算机程序本身的权利要求归入“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排除了专利授权的可能性。

由于智能算法属于计算机程序，因而专利审查指南中对于计算机程序的审查规定，也同样适用于

智能算法专利。这就大大限制了智能算法专利的保护范围。根据智能算法的智力活动规则和技术方案双重属性的理论验证，算法因其决策、仿生等特点而以抽象计算构成其核心技术特征，也只有将算法认定为技术，才有可能推动智能革命的不断发展。因此在智能算法的专利审查过程中，应当强调智能算法的技术本质，而避免将其归入“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根据201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第四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情况来看，第二十五条在草案中并未加入过多修改意向。但在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的“疾病的诊疗和治疗方法”中，加入了“但涉及养殖动物的除外”的除外条件。这一修改思路打破了不与授权项目无除外条件的专利立法惯例，给智能算法提供了破除“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限制的思路。可以在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过程中，将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中加入智能算法的除外条件，修改为“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但涉及人工智能算法的除外”。

#### （四）确认权利要求中智能算法技术特征描述的特殊性

在《专利审查指南》（2017）第九章，“5.2权利要求书的撰写”中提到：“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可以写成一种方法权利要求，也可以写成一种产品权利要求，无论写成哪种形式的权利要求，都必须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并且都必须从整体上反映该发明的技术方案。”智能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发明，同时也是一种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要求，智能算法在申请专利保护的过程中，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必须从整体上反映智能算法完整的技术方案。

从制度目的来看，“5.2权利要求书的撰写”的规定，是在排除单纯计算机软件专利授权的情况下制定的，其中“涉及计算机程序”的指称方式，可以印证这一点，因此要求无论是通过产品发明还是通过方法发明的路径，来申请智能算法的专利保护，完整的技术方案是权利要求和审查是否授权的重要依据。

这就需要在明确智能算法具有技术方案属性

的同时，将智能算法定义为一种必然带有抽象运算规则和方法色彩的技术方案。因而智能算法技术方案的权利要求，在记载解决技术问题必要技术特征的同时，其核心技术特征主要呈现为智能算法的方法流程步骤，以及执行各项功能方式的描述，更多的呈现为抽象运算规则和达到智能效果以及决策方法的描述。因此，在《专利审查指南》目前正在修改征求意见的关键时期，应当建议将智能算法技术特征描述的特殊性明确，或者审查指南中明确允许智能算法技术方案，以抽象运算规则和决策方法的技术特征进行描述，并可以写入权利要求书当中，而不会因此在审查中被驳回授权。

综上，人工智能时代让社会大众感受到了技术进步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智能技术的法律保护障碍。算法技术给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智能算法的专利保护无论从理论、实践还是制度等层面，都需要进行体系化的时代协调，以回应智能算法技术的保护需求。

#### 参考文献

- [1] 孙伟平. 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J]. 哲学研究, 2017(10):120-126.
- [2] 刘鑫.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法规制——理论争议、实践难题与法律对策[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9(5):1-11.
- [3] 吴汉东. 试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法治观和发展观[J]. 知识产权, 2019(6):3-15.
- [4] 郑智航, 徐昭曦. 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法律实践为例[J]. 比较法研究, 2019(4):111-122.
- [5] 张凌寒. 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研究[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8(3):65-74.
- [6] 李本. 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人工智能: 问题与挑战[J]. 中国法律评论, 2018(2):54-56.
- [7] Davidow B. Welcome to Algorithmic Prison—the Use of Big Data to Profile Citizens Is Subtly, Silently Constraining Freedom[J]. The Atlantic, 2014(2):12-17.
- [8] Frank Pasquale.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9] 吴汉东. 知识产权多维度学理解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393.
- [10] 崔国斌. 专利法上的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计算机程序算法的客体属性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37-51.
- [11] 刘磊, 雷怡, 孙红要, 曹赞华. 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利主要统计数据报告[J]. 科学观察, 2019(1):43-57.
- [12] 刘铁光. 风险社会中技术规制基础的范式转换[J]. 现代法学, 2011(4):68-78.
- [13] 崔国斌. 专利法上的抽象思想与具体技术——计算机程序算法的客体属性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37-51.
- [14] 赵鹏. 搜索引擎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及其法律规制[J]. 比较法研究, 2018(4):188-200.
- [15] 杜鹃, 尹海霞. 涉及算法的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技巧[J]. 专利代理, 2017(3):60-65.
- [16] 汪亮. 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可行性探讨[J]. 科技管理研究, 2013(5):127-130+166.
- [17] 姜野. 算法的规训与规训的算法: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法律规制[J]. 河北法学, 2018(12):142-153.
- [18] 吴汉东. 政府公共政策与知识产权制度[J]. 中国版权, 2008(1):12-16.
- [19] 吴汉东, 张平, 张晓津. 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挑战[J]. 中国法律评论, 2018(2):1-24.

## The Legal Exploration of Patent Protection Method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i Lin

**Abstract:** With the tide of intelligent revolution sweeping the globe, as the intelligence basi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e algorithm technology has the advantages of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 function which make the decision rule play the role of the order specifications. Because of the high professionalism and opacity of the decision process, intelligent algorithm is in the blank reg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forms the algorithm black-box and algorithm conspire, b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lgorithm law to guidance of restriction and prevention. However, as the soul technology of the AI technology, algorithm fundamentally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also determines the discourse dominance and role definition in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s intelligent revolution. Thus, apart from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algorithm regulati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algorithm technology is also the important task for the rule of law responding to the issue of intelligent revolution. The ex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or copyright, commercial secrets, etc., provide limited protection to the algorithm. Patent law benefits from its institution function of “Open exchange protection”, can not only precaution the social risk of algorithm power, but also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lgorithm technology. Therefore, to study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gorithm patent, institutional confirmation of algorithm patentability object, legal support for the paten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of the existing patent law, and to propose institutional advic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gorithm patent,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lgorithm technology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intelligent societies.

**keywords:** algorithm; patent; intelligent revolution; legal system

# 征稿启事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军民融合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名家访谈等。

本刊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关于投稿，具体事项如下：

## 一、来稿要求

1. 来稿须为学术论文，结构完整，包括题名、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2.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籍贯（\*\*省\*\*市）、职称、所在单位及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等。
3. 获得基金资助的稿件，请注明立项单位、项目名称、时间、编号。
4. 参考文献格式请参考本刊已刊发文章。
5.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文责自负，本刊对采用稿件有权作文字删改，如不愿改动，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稿件的审理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理办法，将在1个月内回复初审结果。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7. 优稿优酬，嘉奖名篇。

## 二、投稿事宜

1. 来稿请发至shekexuebao@nwpu.edu.cn。
2. 本刊地址：西北工业大学老图书馆217室 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3140。

## 三、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域出版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包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将被视为同意上述声明。不同意网络传播者，请在来稿中注明。